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6 年 第3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主 任

冯绍雷 何建华 翟 崑

委 员

毕洪业	邓 浩	丁晓星	费海汀	封 帅
宫 楠	顾 炜	郭丽双	郭培清	胡 键
胡志丁	黄琪轩	江天骄	匡增军	李开盛
李自国	梁 强	刘军梅	刘 莹	鲁传颖
马 斌	马 强	庞大鹏	曲文轶	施 越
苏 畅	孙 超	孙德刚	汪诗明	杨攻研
殷之光	尹如玉	曾向红	张 建	张 昕
章永乐	赵可金	赵 隆	赵宁宁	郑春荣



目 录

习近平外交思想

- 4 高 飞 / 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治世
方案

国际秩序

- 16 孙壮志 / 中东战事对俄罗斯的影响
及俄罗斯的战略选择
29 李中海 / 俄罗斯与国际经济秩序重
构：制度替代抑或制度层叠
42 曾向红 / 世界失序阴影下的中亚秩
序及其变化

国别与区域研究

- 55 田德文 郭莎莎 / 悬置型欧洲化：外
高加索国家的彷徨与探索
95 宋黎磊 万志高 / 欧盟安全决策中
的波兰角色跃迁
124 伍雨荷 费海汀 / 观念、制度与实
践：苏联科学院体系下的海外
问题研究
149 俄文摘要
156 英文摘要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 肖辉忠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6 年 6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6 年第 3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Гао Фэй

Глобальные перемены столетия и подход Китая к управлению (4)

Сунь Чжуанчжи

Влияние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Россию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и (16)

Ли Чжунхай

Россия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амещение ил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наслоение..... (29)

Цзэн Сяньхун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ег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42)

Тянь Дэвэнь, Го Шаша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ная европеизация: колебания и поис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55)

Сун Лилэй, Вань Чжигао

Эволюция роли Польши в принятии решен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ЕС..... (95)

У Юйхэ, Фэй Хайтин

Идеи, институты и практика: изучение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в систем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24)

Аннотации..... (149)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6 年第 3 期 (双月刊)

Contents

Gao Fei

Global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China's Proposal for Global Governance..... (4)

Sun Zhuangzhi

The Impact of the Middle East War on Russia and Russia's Strategic Choices..... (16)

Li Zhonghai

Russi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stitutional Substitution or Institutional Layering (29)

Zeng Xianghong

Central Asian Order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Shadow of World Disorder..... (42)

Tian Dewen, Guo Shasha

Suspended Europeanization: Hesit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caucasia States..... (55)

Song Lilei, Wan Zhigao

Poland's Role Transformation in EU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95)

Wu Yuhe, Fei Haiting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 Research on Overseas Issues under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System..... (124)

Abstracts..... (156)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治世方案*

高 飞**

【内容提要】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体系秩序与全球治理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与多边合作两种趋势激烈碰撞，世界在深度融合与碎片化加剧的撕裂中前行。这一变局伴随着三场不同形态的“战争”。俄乌冲突已演变为撕裂全球共识的系统性冲突。2026 年爆发的美以伊战争造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能源供应中断，并进一步演变为冲击全球通胀与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危机。美国以“对等关税”为名发动的全球贸易战，则重创多边贸易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作为系统性应对方案：以全球发展倡议破解发展赤字，以全球安全倡议应对安全困境，以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文明互鉴，以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包容的“多极共治”转型，为变局中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公共产品。

【关键词】百年变局 全球治理 中国倡议 国际秩序转型

【中图分类号】D82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3-0004(12)

进入 21 世纪，全球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代，这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影响。^①这种变局既包括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

* 2026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论坛在中国上海举行。高飞教授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本文系作者根据演讲内容的修订和拓展。

** 高飞，外交学院院长、教授。

① 参见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24 年，第 13 页。

发展，也包含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的深刻演变。围绕这一变局，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特征、新表现。

一、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演进，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从 2026 年年初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到与以色列联手突袭伊朗，大变局变得更加可感可及。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但是如何去管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成熟的答案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自 1991 年苏联解体以来，汲取冷战对抗教训而形成的大国和平与以市场原则推进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曾长期定义这一时代。然而，后冷战时代的两大支柱性特征已同步动摇，预示着这一时代的终结。一方面，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四年，美国虽未直接派兵，却在经济、贸易、情报、认知等领域全面介入，大国“混合战争”已成事实；另一方面，自由市场原则遭受严重侵蚀，美国竖起“小院高墙”，以意识形态划线，推行“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并以“去风险”之名强化“去中国化”。2025 年 4 月，美国对全球 180 多个经济体施加“对等关税”，将自身关税水平从二战后所有大国当中最低的约 2.3%，推高至当前全球所有大国当中最高的约 17.3%，导致全球经济环流面临根本性重构。^①

从权力格局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金砖国家 2025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总和达 77 万亿美元，超过七国集团的 57 万亿美元，这标志着全球权力结构由“西方中心”向“多极世界”加速演进。

从治理格局看，联合国权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20—2026 年，

^①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测算，2025 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税率由年初的约 2.3% 升至 2025 年 5 月的约 17.3%。See M. Azzimonti, A. Wyckoff, “Tariff Update: Incorporating Recent Decisions and Deals”, *Economic Brief*, June 2025, No.25-23, https://www.richmondfed.org/publications/research/economic_brief/2025/eb_25-23?utm_source=chatgpt.com

美国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 9 次，其中 7 次针对巴以问题，^①并拖欠联合国会费约 46 亿美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 2025 年 10 月警告，若会员国不能按时缴费，2026 年年度预算将被迫削减 15.1%；人员编制将裁撤 2200 个，较 2025 年减少 18.8%。2026 年 1 月，美国又宣布退出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 66 个国际机制，使联合国在气候、人权等核心领域的治理能力遭到严重削弱。

从信任格局看，单边主义政策正催化全球性的信任危机。根据 2026 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的结果，70% 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或犹豫是否信任价值观、信息来源或文化背景不同的对象。^②信任赤字进一步推高企业供应链重构成本，抑制投资决策，削弱技术创新合作，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单边主义政策的广泛不满和对国际合作前景的担忧。这种信任危机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企业供应链重构成本上升、投资决策更趋保守、技术创新合作减少等非传统安全挑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二、世界出现两种不同的趋势

面对世界变局，各国的选择截然分化，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趋势主张继续推进全球化与多边合作，另一种趋势则力推单边主义与逆全球化。两者的并存与碰撞，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今世界走向分裂乃至对抗的思想根源。

一方面，全球化并非在倒退，而是在深度调整中显现出更强的韧性。《2026 年 DHL 全球连通性报告》显示，2025 年全球水平达到 25%，与 2022 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持平。^③全球贸易额预计首次超过 35 万亿美元，其中数字贸易达 7.23 万亿美元，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额达 4.18 万亿美元，贡献全球贸易增量的 42%；全球可再生能源

① 参见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统计数据（<https://main.un.org/securitycouncil/en/content/vetoes-since-1946>）。

② “2026 爱德曼信任度调查中国报告发布”，美通社，2026 年 4 月 16 日，<https://www.prnasia.com/story/529283-1.shtml>

③ S. A. Altman, C. R. Bastian, *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Report 2026*, Bonn, February 2026.

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50%，达到过去 20 年来的最高增速。区域一体化亦成为维护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全球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达 375 个，其中近三分之二的贸易便利化协定集中于亚太。

另一方面，这股力量正在发生激烈碰撞，世界呈现出深度融合与碎片化加剧并存的图景。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0 月，全球近五分之一（19.7%）的进口商品受到新关税等措施的影响，受影响的进口总额高达 2.64 万亿美元；各国出台的限制性“贸易及相关措施”总量达 272 项，为 2009 年有记录以来第二高，仅次于 2011 年；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管理的全球贸易份额已从 2026 年年初的约 80% 降至 72%。中美脱钩尤为显著，中国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 2017 年 22% 的峰值骤降至 2025 年前三季度的 9%，中美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也从 2016 年的 3.5% 降至 2024 年的 2.6%。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截至 2025 年，已有 46 个国家和经济体实施了数据本地存储要求（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较十年前接近翻倍；2014—2025 年，共有 44 个国家出台或大幅修改了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规则。^①

综合而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不是一场“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它们正以一种看似矛盾、实则并存的方式，深刻地重塑世界。

三、世界经历着三场不同形式的“战争”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变革往往与激烈的战争和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三十年的战争，1815 年的维也纳体系为拿破仑战争画上了句号，1919 年至 1921 年一战结束后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45 年二战结束后建立了雅尔塔体系。这些都充分说明，战争扮演了旧秩序终结者与新秩序奠基者的角色。进入 21 世纪，后冷战秩序松动，权力与规则双重失序，意识形态竞争回潮，“全球南方”觉醒与新兴力量崛起，这些正推动国际体系发生新的深刻变革，且伴生着新

^① OECD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2026, February 24, 2026,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oecd-services-trade-restrictiveness-index-2026_db87d74e-en/full-report/component-5.html

形态的“战争”。

（一）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的性质已发生异化，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冲突。其波及范围早已超出地区范畴，在外交阵营、经济网络与安全范式等多个维度撕裂了既有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冲突迫使国际社会陷入高强度的身份选择与站队，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了严重的功能性瘫痪。联合国大会就此多次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了谴责俄罗斯“侵略行为”、呼吁和平解决冲突的系列决议，投票结果反映出国际社会立场的深度分化（见表 1）。

表 1 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关键决议和投票记录

序号	决议编号	日期	主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结果
1	ES-11/1	2022 年 3 月 2 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要求立即撤军）	141	5	35	通过
2	ES-11/2	2022 年 3 月 24 日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	140	5	38	通过
3	ES-11/3	2022 年 4 月 7 日	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93	24	58	通过
4	ES-11/4	2022 年 10 月 12 日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捍卫《联合国宪章》原则（谴责非法公投）	143	5	35	通过
5	ES-11/5	2022 年 11 月 14 日	推进就侵略乌克兰行为提供补救和赔偿	94	14	73	通过
6	ES-11/6	2023 年 2 月 23 日	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原则	141	7	32	通过
7	A/ES-11/L.10	2025 年 2 月 24 日	重申对乌克兰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	93	18	65	通过
8	ES-11/8	2025 年 2 月 24 日	“和平之路”	93	8	73	通过
9	ES-11/10	2026 年 2 月 24 日	支持乌克兰持久和平（美国投弃权票）	107	12	51	通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数字图书馆的数据整理、制作。^①

① 参见联合国数字图书馆（https://digitallibrary.un.org/?ln=zh_CN）。

俄乌冲突也加速了全球地缘政治的重组。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数据，至少有 41 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政府间援助，其中 33 个国家直接提供了武器、弹药与军事装备，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数量则相对有限；^①芬兰与瑞典分别于 2023 年、2024 年相继加入北约，使北约成员国扩大至 32 个，欧洲安全版图显著重塑；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多采取中立立场，呼吁和谈，在联合国相关投票中多次选择弃权。

俄乌冲突的间接影响几乎波及全球所有国家。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合计供应全球约 30% 的小麦与大麦，20% 的玉米，以及超过 50% 的葵花籽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合计提供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化肥。供给侧的高度集中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突破历史极值，使分布于 107 个经济体的约 17 亿人口陷入粮价上涨、能源成本飙升与融资环境收紧的多重困境。^②

俄乌冲突已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剂。它不仅以惨烈的军事冲突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边界，更以隐性的机制博弈瓦解了全球共识。这场冲突造成的分裂已经成为定义 21 世纪 20 年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变量。

（二）美以伊战争

美以伊战争的爆发，将地区性军事打击迅速升级为撕裂全球地缘政治板块的系统性冲突。自 2026 年 2 月 28 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直接卷入军事冲突，战火已经波及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土耳其、黎巴嫩、也门等中东十余国。^③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等中东地区势力也作为战争代理人或准国家行为体相继参战，各国被迫在美以与伊朗轴心之间选边站。

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再次显示出全球政治的深度分裂。截至 2026 年 5 月 6 日，安理会就美以伊战争举行了 4 次正式表决，涉及 4 项决议草案（含

① 参见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乌克兰支持率追踪数据（<https://www.kielinstitut.de/publications/ukraine-support-tracker-data-6453>）。

② “Global Impact of war in Ukraine on food, energy and finance systems – Brief No.1”, April 2022,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global-impact-war-ukraine-food-energy-and-finance-systems-brief-no1>

③ “‘数’说美以伊战事 30 天”，新华网，2026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xinhuanet.com/20260329/55b4bfbf734f4acf86c34e4d9b47f9e5/c.html>

1 项待表决），其中仅有 1 项决议获得正式通过（见表 2）。

表 2 2026 年联合国安理会涉美以伊战争投票记录

日 期	决议/草案 编号	主 题	投票结果	最终结果
3 月 11 日	巴 林 提 出 的 S/RES/2817 决议	要求伊朗立即 停止对海湾国 家的攻击	13 票赞成，0 票反对，中 俄弃权	通过
3 月 11 日	俄 罗 斯 决 议草案（未 通过，无编 号）	呼吁中东各方 立即停火，不 点名任何国家	4 票赞成（俄罗斯、中国、 巴基斯坦、索马里赞成）， 2 票反对（美国、拉脱维 亚），9 票弃权（其余 9 个安理会成员）	未通过
4 月 7 日	由 巴 林 等 海 湾 国 家 提 出 的 S/2026/273 决议	敦促协调行动 保障霍尔木兹 海峡航行安全	11 票赞成（巴林、刚果民 主共和国、丹麦、法国、 希腊、拉脱维亚、利比里 亚、巴拿马、索马里、英 国、美国），2 票反对（中 国、俄罗斯），2 票弃权 （哥伦比亚、巴基斯坦）	中俄否决， 未通过
5 月 6 日	美国新决 议草案（待 表决，无编 号）	要求伊朗停止 攻击和布雷， 开放霍尔木兹 海峡	已于 2026 年 5 月 6 日提 交，投票待举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制作。

被间接卷入美以伊战争的国家也在增多。霍尔木兹海峡近乎瘫痪，导致海湾国家航运通行量断崖式下跌。^①海水淡化设施、发电设施、氦气生产链^②等民生设施面临供应中断。欧洲、亚洲多个能源进口国面临能源高价、物流

① 段跃初：“伊朗战争如何重塑能源格局”，2026 年 4 月 4 日，<https://cloud.kepuchina.cn/newSearch/imgText?id=7439646866421690368>

② “地缘紧张局势持续，海湾多国油气巨头面临严峻考验”，经济参考报，2026 年 3 月 17 日，<http://jjckb.xinhuanet.com/20260317/c7db09d96cf9441c96bf93d3a43a783d/c.html>

成本攀升与外部需求疲弱的多重挤压。世界银行 2026 年 4 月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因战争关闭，2026 年 3 月，全球石油供应平均每日减少约 1000 万桶，为“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石油供应冲击”^①。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 Birol）估算，本次中断量超过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与俄乌冲突中断量之总和。睿频能源咨询公司（Rapidan Energy）分析称，中断规模逾此前最高纪录（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两倍。^②布伦特原油价格从美以伊战争前约 73 美元/桶飙升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盘中最高的 126 美元/桶，达 2022 年以来最高位。^③2026 年全球能源价格预计大涨 24%，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价由 2025 年的 69 美元/桶升至 86 美元/桶，在战争延长情形下可能高达 115 美元/桶；^④2026 年 2 月至 3 月间，国际尿素价格单月飙升近 46%。^⑤氢气现货价格已上涨 40%至 50%，直接冲击全球芯片制造业。^⑥

美以伊战争已远超地区冲突范畴，演变为全面引爆全球通胀、能源危机与经济增长放缓的系统性冲击，成为牵动全球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

（三）全球贸易战

2025 年 4 月，美国以“解放日”的名义宣布对全球进口商品加征“对

① World Bank Group, *Commodity Markets Outlook*, April 2026, p.1.

② 陆如泉：“美以伊战争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创历史之最，国际油价却为何没有冲至历史新高？”，界面新闻，2026 年 5 月 6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6-05-06/doc-inhwxatap5894994.shtml>

③ “地缘冲突溢价反复拉锯，油气价格中枢何去何从”，上海证券报，2026 年 4 月 8 日，<https://www.cnstock.com/commonDetail/666438>；“中东冲突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国经济网，2026 年 5 月 7 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605/t20260507_2947711.shtml；陆如泉：“美以伊战争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创历史之最，国际油价却为何没有冲至历史新高？”，界面新闻，2026 年 5 月 6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6-05-06/doc-inhwxatap5894994.shtml>；“美伊和谈曙光突现：美元抹去战争溢价、油价断崖式下跌全球股市与黄金齐升”，智通财经，2026 年 5 月 6 日，<https://img2.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438677.html>

④ “受中东战事冲击，世行预测今年全球能源价格将大涨 24%”，新华网，2026 年 4 月 29 日，<https://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60429/6223708a8ab742bd9add51e81cfb276e/c.html>

⑤ 陆继霞：“中东冲突引发全球农业危机，如何应对”，环球网，2026 年 5 月 19 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RcTPRkLX3k>

⑥ “成本上升成定局，经济增长添变数”，经济参考报，2026 年 4 月 20 日，<https://www.jjckb.cn/20260420/5aa4fdb70cb47498debc658813a30ba/c.html>

等关税”，对几乎所有经济体适用 10% 的基准关税，并对 57 个被认定存在“非对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加征 11% 至 50% 不等的国别税率。这标志着其关税政策由 2018 年以来的定向关税施压进一步升级为面向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的普遍性、体系化关税攻势。

中国坚决回击美国的打压遏制，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为关税、出口管制与关键技术限制交织的复合型贸易战。2025 年 4 月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有效税率一度达到 145%，中国随后将对美进口商品关税提高至 125%。^①中国将部分稀土相关物项纳入出口管制，美国则延续并强化对华半导体设备、高端芯片及相关实体的出口限制。世界贸易组织 2025 年 10 月的预测显示，受前期抢进口效应消退、关税影响滞后显现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影响，2026 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速预计由此前的 1.8% 下调至 0.5%。^②

贸易战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已经远超关税层面。2026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在贸易壁垒抬升和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仍面临显著下行风险，地缘冲突延宕、地缘经济碎片化加深、贸易紧张再度升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均可能削弱全球增长前景。^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 2026 年 1 月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也显示，全球投资活动呈现明显分化。^④这表明，发达国家单边贸易行动不仅推高了交易成本，更通过供应链重组、投资延迟和风险外溢，将治理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深了南北发展失衡。

上述三场冲突的共同对立面都指向同一个国家——美国，这并非偶然。今日世界变局的深层动因，是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矛盾：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却选择以战争与对抗作为维护衰落霸权的手

① A. Bao, “China strikes back with 125% tariffs on U.S. goods as trade war intensifies”, April 11, 2025, <https://www.cnn.com/2025/04/11/china-strikes-back-with-125percent-tariffs-on-us-goods-starting-april-12.html?utm>

② “AI goods and frontloading lift world trade in 2025 but outlook dims for 2026”, October 7, 202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5_e/stat_07oct25_e.htm

③ “IMF 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中东战事冲击致不确定性加大”，新华网，2026 年 4 月 14 日，<https://www.news.cn/20260414/d46faa4588fd4d3ba0b19cf8d59b3c6a/c.html>

④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全球投资总量回升但分布失衡”，经济日报，2026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jingjibao.cn/static/detail.jsp?id=634548>

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是由单一霸权模式向更加多元、复杂的世界格局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与不确定性的漫长历史进程；国际秩序的最终形态，并非仅由硬实力决定，更取决于各国能否把握时代潮流，选择合作而非对抗，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新秩序。

四、应对全球挑战的四个中国方案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挑战，中国以系统性方案回应全球治理之问。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指向，以发展为基础，以安全为保障，以文明互鉴为底色，以治理变革为路径，共同构成了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的整体性方案。

第一，全球发展倡议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发展权的核心诉求。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六大理念，并围绕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推进合作。该倡议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要衔接点，既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发展赤字的制度性回应，也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发展领域的重要实践方向。自提出以来，倡议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作为倡议首倡方和行动派，中国通过机制建设、资源投入和项目合作，推动发展共识转化为务实成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发展仍是硬道理，唯有发展才是破解全球性挑战的基础路径，也是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包容的重要支撑。^①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核心，回

^①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倡议进展报告（2025）》，2025年9月24日。

应了国际社会对解决安全困境的迫切需求。2022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随后中方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明确重点合作方向与合作平台机制，为各国开展安全合作提供制度框架。该倡议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内政，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并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治理。在实践层面，中国围绕维和、反恐、气候变化、防灾减灾、数字治理、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持续推进合作，并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沙特与伊朗和解、缅甸局势、泰柬边境争端、朝鲜半岛及伊朗局势等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推动通过政治方式化解矛盾。全球安全倡议已得到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和赞赏，明确写入 140 多份中方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交往合作的双多边文件，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提供了重要公共产品。^①

第三，全球文明倡议以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回应了百年变局下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202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反对“文明优越论”，反对“文明冲突论”，反对意识形态对立，倡导共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实践中，中国积极搭建文明交流平台，推动政党对话、亚洲文明对话、文明古国论坛等机制建设，为破解文明隔阂、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方案。从文明视角审视当今世界，有助于跳出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与更包容的文化胸襟应对全球性问题，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深层精神力量。^②

第四，全球治理倡议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核心，回应了百年变局下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的时代课题。2025

① 吴晓丹：“全球安全倡议：照亮世界和平安宁的前行之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2026 年 4 月 22 日，https://cn.chinadiplomacy.org.cn/2026-04/22/content_118456943.shtml

② 刘志明：“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背景、实践探索和世界意义”，《人民论坛》，2025 年第 18 期，第 96-100 页。

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又一重要公共产品。该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基本原则，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平等参与全球事务，坚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统一适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排他性“小圈子”。在实践层面，中国通过推动设立“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国际日”、推动成立国际调解院、积极参与维和与热点问题劝和促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合作等方式，将治理理念转化为制度建设和务实行动。全球治理倡议不仅为破解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不足、规则失衡和执行低效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凝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撑。^①

展望未来，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前行，以四大全球倡议为载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国际秩序由“霸权稳定”向“多极共治”的深刻转型，把人类带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责任编辑 宋羽竹）

^① 高飞：“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与行动路径”，《国家治理》，2025年第24期，第71-75页。

国际秩序

中东战事对俄罗斯的影响及 俄罗斯的战略选择*

孙壮志**

【内容提要】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大国，在中东地区拥有传统影响力，奉行平衡、务实的政策，与伊朗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东战事的爆发，既给因俄乌冲突受到美国和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带来摆脱困境的机会，也使其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一方面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主动寻求与美国进行高层对话，争取对自身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实现外交上的重大突破。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对俄罗斯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能源出口收入的增加。在外交层面，俄罗斯也可能借机发挥独特作用。长期来看，由于这场战事的前景仍不明朗，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有可能被进一步压缩，其能源地位受到动摇，内外环境或更趋恶化，国内通胀进一步加剧。因此，俄罗斯首先需要利用中东战事引发的国际安全危机，促成俄乌冲突的局势朝着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发展。其次是强化与金砖伙伴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互动。再次是采取务实举措，巩固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中东局势 俄罗斯外交 俄美关系 美伊关系 美以关系 能源博弈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3-0016(13)

* 2026年4月17日至19日，第七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俄罗斯经济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孙壮志研究员以“中东战事升级对俄罗斯的影响及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为题作主题发言。本文系作者根据发言内容的修订与拓展。本文系新疆自治区重大需求人才项目“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可持续框架及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JRC-2025-ZZB-ZDXQ-003）的阶段性成果。

**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中东安全局势恶化。伊朗实施反击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局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双方军事对峙继续。尽管冲突进一步升级并外溢的可能性不大，但未来前景仍不明朗。俄罗斯是能源大国，在中东地区长期具有影响力。这场战事为因俄乌冲突而受到美国和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带来摆脱困境的机会，同时也使之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争取主动，俄罗斯一方面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美国对话，争取对自身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实现外交上的重大突破。

一、中东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近代以来，俄罗斯一直非常看重自己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影响，认为这关系到俄罗斯重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实力下降，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但俄罗斯没有放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存在，不断强化与一些传统伙伴的关系。2000年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对中东的政策又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调整：更加积极地介入中东事务，把中东作为对美欧外交的重要筹码。俄罗斯几乎参与了所有主要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全方位强化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不仅与埃及、叙利亚等国的传统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与沙特、约旦、阿联酋的关系也不断升温。俄罗斯还寻求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与伊朗商定开展核电站建设合作。

（一）中东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中东在地缘上是俄罗斯的邻近地区，与俄罗斯南部地区及中亚、南高加索的独联体国家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渊源。俄罗斯非常看重中东的战略地位。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受到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制裁，能源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工具，俄罗斯更加离不开与中东国家的密切合作。在俄罗斯看来，中东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东是俄罗斯南下的重要门户。在受到美国和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要打通“北-南”交通走廊，中东是最重要的出海通道之一。另外，

在通往德国的“北溪”管道被炸以后，通过土耳其的“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就成为维系俄罗斯与东南欧国家能源联系的唯一纽带。

其次，就俄罗斯维持地区影响而言，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不可或缺。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在俄罗斯的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俄罗斯在中东依托港口和机场建立了多个空军和海军基地，并将其视为巩固俄罗斯南方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即便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俄罗斯仍然要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基地。

再次，把中东国家视为重要的能源伙伴，与中东产油国协调能源政策，在国际市场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俄罗斯与沙特共同成为“欧佩克+”的核心成员，经常举行部长级会晤，建立了调控石油产量的有效机制。

最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积极拓展经济合作空间，采取平衡的政策。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对俄投资减少，俄罗斯更加重视发展与中东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关系，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国家维持正常交往。2022 年俄罗斯与阿联酋的贸易额达到 90 亿美元，与埃及在粮食和核电领域开展合作。

（二）俄罗斯在中东奉行务实和进取的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一度下降，外交政策出现摇摆，导致双方关系下滑。普京执政后，开始在中东推行全方位务实外交。2011 年中东发生政治变局后，俄罗斯的中东政策表现出更为积极进取的态势，持续提升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多年经营和在战场上的一显身手，俄罗斯一度在叙利亚问题上掌握主动，力图将叙利亚打造成自己在中东的战略支点，同时进一步巩固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关系，发展与土耳其、伊拉克等国的合作关系。借助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俄罗斯稳住了南部边境，强化了国际地位，外交声望攀升至苏联解体后的最高点。

在俄罗斯外交中，中东地区被视为突破西方围堵的“特殊地域”，比较容易找到反对西方的战略伙伴，通过加强与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大国的合作，能够有效消解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力。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拓展外交空间，摆脱孤立状态，俄罗斯加大了对中东的外交投入，使 2023 年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中东年”：9 月，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访问伊朗；12 月，伊朗总统莱西访问俄罗斯；12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阿联酋和沙

特，在沙特强调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①在俄罗斯的努力下，一些中东产油国没有按照美国的指令行事，拒绝向欧洲增加能源供应以替代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俄罗斯与土耳其的交往非常频繁，两国总统经常举行电话交谈。2023 年 9 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庞大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与普京在索契会晤，签署多项协议，土耳其还希望成为俄罗斯天然气运往欧洲的新枢纽。

（三）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更重视中东

由于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与美欧的对抗不断升级，中东作为“中间地带”更加受到重视。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签署命令，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其中阐明了俄罗斯对当前世界主要趋势和发展前景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明确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和优先方向等方面。并指出，俄罗斯奉行独立、多方向的外交政策，该政策建立在尊重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以及开展平等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同时强调，俄罗斯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态度，取决于对方的对俄政策是建设性的、中立的还是不友好的。为推动世界多极化，俄罗斯将致力于挖掘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潜力，增强它们的作用。

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提出，俄罗斯将优先发展同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叙利亚的关系。俄罗斯外交的优先任务是：消除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迫使其放弃新殖民主义和霸权野心。由于乌克兰战事仍需投入大量的军事与外交精力，俄罗斯在中东的投射力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收缩”。但在俄罗斯对欧洲能源脱钩后，特别是“北溪”管道被炸后，俄罗斯也对自身传统地缘政治杠杆被削弱感到焦虑。因此俄罗斯改变了过去在中东的“强势”政策，对土耳其等北约国家也表现出一定的“忍让”。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导致美欧互信下降，俄罗斯利用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的裂痕，在中东寻求新的

① “普京访问沙特，谈到 OPEC+ 合作与巴以冲突”，观察者网，2023 年 12 月 7 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3_12_07_718191.shtml

突破，希望能有效牵制和干扰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

二、俄罗斯与伊朗关系的最新发展

由于伊朗政权具有鲜明的反美色彩，俄罗斯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作出疏远伊朗的姿态，同意减少对伊朗的武器供应，也参与了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但美国方面一直指责俄罗斯支持伊朗的核计划。^①事实上，俄罗斯一直非常看重伊朗问题在俄美博弈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后，俄罗斯和伊朗都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在国际上相互支持，不断强化经济和安全关系。正是在俄罗斯的推动下，被西方孤立的伊朗先后成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外交空间得到扩展。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有了快速发展，不断强化各领域、各层面的合作。

（一）提升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度

俄罗斯与伊朗关系不断加强，更多体现在政治和安全层面，双方在战略上相互借重。由于两国经济结构相似，伊朗又受到国际制裁，经济关系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2021 年两国贸易额虽只有 33 亿美元，却已创历史新高。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开始把伊朗作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借助伊朗的地缘优势，争取打破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围堵。

2022 年 7 月 19 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总价值约 400 亿美元。这份协议达成的背景是普京总统访问伊朗，并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领导人就叙利亚冲突举行了峰会。俄罗斯与伊朗两国能源公司合作的项目包括伊朗南帕尔斯气田的增压，基什气田、北帕尔斯气田和六个油田的开发。此外，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还将参与建设伊朗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天然气出口管道。这是伊朗能源行业历史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协议之一，也是俄罗斯近年来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此前俄罗斯对伊朗石油行业的投资仅为 40 亿美元。普京总统专程访问伊朗，除加强

①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著：《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徐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372-374 页。

双方能源合作以外，还准备与伊朗加强运输合作，并且在结算中更多使用本币。两国商定，在贸易中逐步放弃使用美元，目的是应对美国和西方的极限制裁。

（二）双方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2025 年 1 月 17 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元首半年内的第三次见面，双方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及其他一系列重要合作文件。《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共有 47 项内容，涵盖国防、反恐、能源、金融、交通、工业、农业、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主要内容包括：在军事合作方面，俄罗斯向伊提供 S-500 防空系统，伊朗向俄罗斯转让无人机蜂群技术；在能源联动领域，共建“里海-波斯湾”石油管线，绕过西方制裁出口原油；在金融结算方面，扩大卢布-里亚尔本币交易，强调双边贸易中本币结算占比已达到 96%。《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有效期 20 年，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合作框架，重点是共同应对西方的经济制裁。

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特殊意义，普京强调，这是双边关系的重大突破。在特殊形势下两国要加强安全领域的互动，加大相互支持的力度。该条约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加强安全与防务领域合作的条款，但没有类似于与朝鲜签署文件中的“军事互助”内容。但两国同样重视发展军事技术合作，商定情报部门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①

（三）不断加强军事合作与交流

在外部安全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俄罗斯与伊朗都有加强国防和军事合作的现实需要。俄罗斯在无人机技术方面需要伊朗的支持，同时也向伊朗提供防空设备。2025 年 6 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双方冲突升级。在此之后，俄罗斯虽然表面上表示中立，但实际上进一步密切了与伊朗的军事交流。

2026 年 2 月，在波斯湾战云密布的阴影下，俄罗斯与伊朗举行联合海上演习，旨在加强双边合作，提升海上安全，并提高两国海军的作战协同能

^① Нефедова А. Пришли в полный Восток: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прорывным договор с Ираном. 18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iz.ru/1824184/alena-nefedova/prishli-v-polnyj-vostok-puttin-nazval-proryvnym-dogovor-s-iranom>

力。俄方特别强调，此次海上演习符合俄罗斯发展海洋外交、扩大对外军事互动和交流作战经验的目标。双方将继续在海上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联合军事演习区域位于阿曼海和印度洋北部海域。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此次演习体现了两国致力于加强海上合作，反对单边主义，维护该地区海上贸易安全的承诺。

三、美以军事行动对俄罗斯的影响与俄方应对

随着中东安全局势的迅速恶化，美国不断加强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大国博弈进一步升级，这一局势对俄罗斯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作为影响中东力量格局的重要外部力量，俄罗斯在此次危机中却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低调姿态，与 2015 年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表现截然不同。这既显示出深陷俄乌冲突之中的俄罗斯面临战略空间受限的窘境，也说明，俄罗斯在仔细评估得失以后，希望扮演“关键第三方”，进而争取更加有利的博弈空间。俄罗斯在外交上显得相对克制，主要是出于对伊朗局势变化可能冲击俄罗斯安全环境的顾虑。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认为，中东的冲突对俄罗斯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遭到破坏。^①

（一）对俄罗斯的积极影响

在俄乌冲突长期延宕的背景下，对面临经济和外交困境的俄罗斯来说，中东局势恶化能够带来一些积极影响。这一局势削弱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更看重以色列而不是乌克兰。全球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对俄罗斯有利：石油出口收入增加，缓解财政压力，有机会突破美欧制裁。据估算，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可能增加 400 亿美元，能够弥补赤字。2026 年 3 月，俄罗斯原油价格已从 2 月的 44.6 美元/桶回升至 77 美元/桶，4 月起随着滞后效应的出现有望改善财政状况。^②美以伊冲突分散了国际舆论对俄乌冲突的

① Силуанов рассказал 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ситуации в Ормузском проливе. 13 мая 2026 г. https://iz.ru/2096036/2026-05-13/siluanov-rasskazal-o-posledstviakh-situacii-v-ormuzskom-prolive?main_click

② Март убавил триллион. 9 апреля 2026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8573173>

关注，加剧了对本可能运往乌克兰的最先进美制武器的竞争性需求，欧洲能源危机和通胀压力加剧，可能减少 2026—2027 年援助乌克兰的财政资源。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导致的全球市场油气相对短缺，提升了伙伴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俄罗斯显然是此次中东动荡的直接获益者。在俄罗斯学者看来，这场冲突还能带来政治上的好处，美欧之间出现更多分歧，俄罗斯的外交压力减小，同时也为大国之间，特别是俄美之间开展对话创造了机会。^①这种变化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俄罗斯虽然可以获得更多的能源伙伴，不再受欧洲政策的牵制，使自己在外交上的“转向东方”走得更实，但俄罗斯经济的对外依赖依然会进一步加剧，自主创新能力持续下降，从而影响俄罗斯推进经济数智化转型的努力，削弱其未来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

（二）对俄罗斯的消极影响

比较而言，消极影响更多，而且是战略性的。俄罗斯既不能放弃伊朗，又要维持与美国的高层对话，两面下注，面临处理俄美关系、俄伊关系的双重考验，结果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均对俄罗斯不满。特朗普不愿再斡旋俄乌和谈，俄美互信进一步下降，俄罗斯可能丧失三方谈判已经形成的有利局面。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受到挑战，与阿拉伯国家的平衡关系难以维持。从长期来看，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前景更趋黯淡。伊朗担忧俄罗斯仅将自己视为与美国博弈的筹码，如果条件合适，俄罗斯可能会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而牺牲伊朗的利益。如果俄罗斯增加对伊朗的援助，则可能危及当前相当脆弱的俄美关系缓和势头。另外，油价上涨也很难成为长期趋势，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对抗一旦缓解，油价可能会迅速暴跌。

因此，俄罗斯学者认为，中东局势的恶化不可能显著改变俄乌冲突的态势，俄罗斯还可能失去伊朗的无人机援助，而欧洲却加强了与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合作，此消彼长，俄罗斯无法真正获得战场优势。而且，油价飙升不可能长期持续，影响全球市场，美国不会长期容忍油价高企带来的冲击，对

^① Бордачев Т. Кризис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стратегия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4 мая 2026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krisis-na-blizhnem-vostoke-i-strategiya>

俄罗斯来说，则面临叠加输入性通胀的经济风险。^①所以，俄罗斯学者进而提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长期持续，对俄罗斯来说“无利可图”，^②内外环境反而将进一步恶化，苦心经营的地缘战略空间支离破碎，国内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三）俄罗斯的应对策略

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普京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是“毫无理由的无端侵略”，俄罗斯外交部也公开表示谴责。同时，俄罗斯也公开表示，“如果有必要，如果有需要，俄罗斯愿意为美伊局势的解决做出贡献”。但俄方也承认，遗憾的是现在谈论需求并不合适，如果所有参与者都有要求，俄罗斯参与支持谈判进程才是有意义的。^③也就是说，至少目前，冲突各方实际上还不需要俄罗斯出面斡旋。乌克兰率先“站队”美以，甚至主动表示要提供无人机技术。俄乌冲突与中东战事的关联性增强，使俄罗斯面临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2026 年 4 月 12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时表示，俄方坚定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当前危机，愿继续为寻求冲突解决方案提供协助，并为中东公正、持久和平开展斡旋。除两国元首通电话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多次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寻求调停美以伊军事冲突。^④

尽管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在某些关键交易中缺席，无法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但普京手中依然握有足以部分改变局势的“底牌”。俄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在网络安全、电子干扰等方面的手段，依然能让美国和北约感到头疼。俄罗斯是否会向伊朗转让更先进的防空导弹或高超声速技术，始终是美方非常担心的问题。如果在中东战事升级后西方仍然把俄罗斯推向

① Тимофеев И. Н. Атака на Иран. Баланс результатов. 10 марта 2026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ataka-na-iran-balans-rezultatov>

②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俄罗斯是美伊战争最大受益者？事情没那么简单”，观察者网，2026 年 3 月 7 日，https://www.guancha.cn/andelie/2026_03_07_809098.shtml

③ Песков указал на готов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помочь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между США и Ираном. 30 апреля 2026 г. <https://iz.ru/2088988/2026-04-30/peskov-ukazal-na-gotovnost-rossii-pomoch-v-uregulirovanii-mezhdu-ssha-i-iranom>

④ Телефо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Ирана Масудом Пезешкианом. 12 апреля 2026 г. <http://kremlin.ru/catalog/countries/IR/events/79539>

敌对一方，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俄罗斯和西方都清楚这一点，俄罗斯也希望借此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四、新形势下俄罗斯可能做出的外交选择

面对复杂的局面，俄罗斯仍需积极作为，缓解俄乌冲突长期延宕给国内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压力。因为美国和西方的制裁与战时状态已经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民众的信心受到打击。由于 2026 年下半年要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普京也要继续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维持高支持率和社会团结，这就需要尽快实现外部环境的改善。俄罗斯虽是伊朗的重要伙伴，却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操作，例如借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或削弱西方，而不轻易全面卷入。

（一）为伊朗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

在外交与政治层面为伊朗提供帮助，这是最直接、成本最低的支持。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场合能够为伊朗提供重要的政治和舆论支持，也能借助在中东的影响力缓解伊朗与邻国的直接冲突。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过程中一直与俄罗斯保持信息沟通，俄罗斯也支持巴基斯坦发挥作用，已经多次强调通过巴基斯坦斡旋达成的停火必须严格遵守，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朗保留了外交空间，避免被彻底孤立。可以说，俄罗斯的外交背书为伊朗提供了在复杂局势中喘息的机会。

在经济与能源领域加强合作，俄罗斯与伊朗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在应对制裁的过程中努力抱团取暖。俄罗斯可协助伊朗通过陆路通道和俄罗斯港口出口部分石油，通过影子船队或与第三方联合采购缓解伊朗压力。同时，双方可建立更加灵活的石油换货和卢布-里亚尔结算机制。俄罗斯在核燃料供应上也可能提供必要支持，尤其是支持布什尔核电站的运行维护，有助于降低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崩溃的风险。然而，在美国封锁和欧洲制裁的重压下，俄伊经济和能源合作仍充满不确定性。

（二）利用中东危机改善外交处境

俄罗斯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军事伙伴，借伊朗取得的一系列“战果”巩

固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在与美国、以色列的军事对抗中，伊朗非常需要俄罗斯的军事与技术支持，包括无人机、情报共享及防空系统。西方认为普京可能承诺加快 S-400 防空导弹或苏-35 战机的交付，并提供卫星影像数据，以强化伊朗的精准打击能力。有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已在冲突中向伊朗提供俄制升级版沙赫德无人机及相关瞄准数据，作为对伊朗先前援助俄罗斯的回报。^①然而，俄罗斯不大可能提供大规模、直接的军事援助。因此，援助更可能停留在技术与后勤层面，以避免触发更严厉的西方制裁。

俄罗斯要利用伊朗危机促成俄乌局势朝着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转化。2026 年 3 月 21 日，普京在祝贺诺鲁孜节（伊朗新年）时强调，艰难时刻，俄罗斯始终是伊朗“忠实可靠的伙伴”，祝愿伊朗“有尊严地”克服考验。伊朗与俄罗斯保持密切沟通。2026 年 4 月 20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伊方表示将密切关注美方动向，并采取适当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确认将尽其所能确保俄罗斯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俄方重申，愿意协助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达成相互可接受的协议。阿拉格齐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抵达圣彼得堡，同俄罗斯高层进行深入磋商，议题涵盖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停火协议的维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2026 年 5 月 1 日，在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传递新的停火提议后，阿拉格齐再度致电拉夫罗夫，讨论了伊朗关于解决与美以冲突的相关立场。^②

（三）看重与美国的外交对话

俄方认为，中东局势的变化为俄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会，希望能够说服特朗普部分解除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制裁，并且准备借机与美方在双边层面达成更广泛的“交易”，借此突破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换取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进一步站在俄罗斯一边。但无论是普京与特朗普的两次通话，还是俄罗斯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访美，都没有达到目的。美方没有延长对俄罗斯海上运输石油的豁免措施，也没有实质性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

① T. Grove, M. Czerny, B. Faucon, “Russia Is Sharing Satellite Imagery and Drone Technology with Ir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7, 2026, <https://www.wsj.com/world/russia-is-sharing-satellite-imagery-and-drone-technology-with-iran-0dd95e49>

② Аракч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обсудил с Лавровым позицию Ирана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США. 1 мая 2026 г. <https://iz.ru/2089738/arakchi-sozvonilsia-s-lavrovym-i-obsudil-pozitciiu-irana-po-uregulirovaniu-s-sha-izi>

面对中东局势的突变，俄罗斯最主要的外交行动还是争取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进一步分化欧洲，改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处境。俄方强调，美国首先应当做出改变，并指出，2026年3月1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2026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该报告仍将俄罗斯与中国、伊朗、朝鲜和巴基斯坦一起视为主要国家威胁。2026年4月29日，普京主动与特朗普通电话，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一是中东局势不明朗，美国深陷其中，进退维谷，俄罗斯看到了美国面临的一些困境，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推动俄美对话；二是现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俄方希望与美国沟通协调，继续推动和谈；三是全球能源问题越来越突出，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希望美国能延长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豁免，这对俄罗斯缓解经济压力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四）巩固自身的外交空间

尽管谈判仍在进行，双方维持了脆弱的停火，但美以仍在积极准备对伊朗进行新一轮打击。国际社会对中东局势充满担忧，世界经济的发展遭遇严峻挑战。俄罗斯也积极强化与伙伴国家的战略互动，提前宣布普京年内将出访中国和印度，并强调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对俄罗斯经济意义重大。2026年4月13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商讨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与石油供应问题，并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表示，双方保持定期接触，凸显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质。双方最具前景的合作领域为能源、航天、农业、工业和制药。

中东局势恶化也冲击到后苏联空间，美、欧、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加大了对中亚国家、南高加索国家的外交力度。美国对哈萨克斯坦能源领域的投资已超过600亿美元，而且不断加强物流合作，共同开发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①特朗普还致信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邀请他参加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对此，俄罗斯采取积极措施，继续维护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俄罗斯作为集安组织2026年轮值主席国，确定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为成员国提供更多先进军事装备。同时，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

^① Объем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энергетику Казахстана превысил \$60 млрд. 24 марта 2026 г. <https://www.inform.kz/ru/obem-amerikanskih-investitsiy-venergetiku-kazahstan-a-previsil-60-mlrd-1b72cb>

一体化进程，为俄罗斯提供更为有力的战略支撑。2026 年 3 月 24 日，普京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通话，决定推进工业、能源、交通和其他战略领域的重大合作项目，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先后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旨在扩大和深化经贸合作。2026 年 4 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九届“中亚-俄罗斯”外长会议，就落实经济、能源、交通、卫生、文化、教育和生态领域联合行动计划的相关路线图达成一致。

五、结 语

中东战事升级给俄罗斯经济和外交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严峻考验。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有可能被进一步压缩，其能源大国地位受到动摇。俄罗斯一方面可以继续把能源作为有力战略工具，借以摆脱外交上的孤立，走出经济发展的颓势，另一方面也可能失去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讨价还价的机会。由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的关联性很强，都牵涉到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俄罗斯无论如何都要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关系到其国际地位甚至国内稳定。

面对中东地区局势，俄罗斯无法置身事外，必须维护自身的利益，给予地区重要伙伴伊朗有力的支持，但需要保持一种脆弱的平衡：在不激怒美国的前提下更倾向于借这场冲突谋取经济与战略利益，并且尽快在乌克兰方向实现自己的目标。由于局势的复杂变化和参与力量的多样性，俄罗斯很有可能陷入一个两难的处境。如果俄罗斯因此失去在中东的影响力，其损失甚至可能抵消四年多来在乌克兰取得的战果。当前，俄罗斯能做到的，不在于对伊朗承诺多少实质援助，而在于向美国释放明确信号：针对伊朗的单边主义行动将带来严重后果，也不可能成功，俄方将不遗余力维护自身及地区伙伴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责任编辑 杨 辉）

俄罗斯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 制度替代抑或制度层叠*

李中海**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深刻变化。俄罗斯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分析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战略目标、能力基础、行为模式及实际影响可以发现，俄罗斯并非谋求全面推翻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以谋求平等伙伴地位为统领，以货币多元化、替代性制度平台建设、战略资源政治化和短期制裁突围为路径，推动构建制度层叠的新秩序。支撑这一战略的，是俄罗斯在经济体量、资源不可替代性、“金砖+”制度容量、金融自主和地缘通道五个领域所具备的不对称能力。俄罗斯的行为已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还不足以全面替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 制度替代 制度层叠 竞争性多边主义 俄罗斯经济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3-0029(13)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

* 2026年4月17日至19日，第七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俄罗斯经济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李中海研究员以“俄罗斯与后全球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为题作主题发言。本文系作者根据发言内容的修订与拓展。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俄罗斯经济思想史”（项目编号：23AGJ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李中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执行主编。

的脆弱性，2022 年乌克兰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全面制裁和俄罗斯采取的反制措施，以及美国对全球许多国家威胁征收高关税，更是将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推向新高度，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严重紊乱。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国际经济秩序重构、非西方行为体在新秩序重构中扮演何种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俄罗斯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经济实力虽远逊于中美欧等经济体，但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重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面对美欧在金融、贸易与技术领域的系统性制裁，俄罗斯力图以能源、粮食和大宗商品为杠杆实施非对称反制，突破封锁，谋求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俄罗斯加速推进欧亚经济联盟、金砖支付体系等替代性制度建设，编织“友好国家”贸易网络，试图在既有秩序之外培育平行体系。

本文按战略目标、能力基础、行为逻辑与实际影响展开分析。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评述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战略目标，第二部分评估俄罗斯在制裁环境下影响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能力基础，第三部分考察俄罗斯的行为模式和外交策略，第四部分评估这些行为对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已经或可能产生的影响。结语部分提炼俄罗斯经验的理论启示。

一、概念和文献综述

本文使用的主要概念，首先是国际经济秩序。对国际经济秩序问题，历来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吉尔平（R. Gilpin）在《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解国际经济秩序》一书中对此作了分类，他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流派，各流派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其中，自由主义流派认为，秩序应服务于市场效率和互利交换，开放贸易和投资造福所有参与方，互相依赖促进和平。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工具，导致核心-边缘不平等，同时关注财富分配与体系的长期动态。现实主义流派认为，秩序反映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国家为安全与自主而竞争，市场逻辑必须服从国家逻辑。^①吉尔平

^① R.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6-31.

则将国际经济秩序理解为一套管理跨国经济活动的规则、制度与共同理解的集合，涵盖贸易、货币、金融、投资与发展等领域，认为它不是自发生成的市场结果，而是嵌入在更大的社会政治体系之中。^①本文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际经济秩序一词。

其次，本文使用“制度替代”和“制度层叠”概念，这两个概念来自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分类。西伦（K. Thelen）和马奥尼（K. Mahoney）将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分为几种类型，其中包括制度替代（Institutional Displacement）和制度层叠（Institutional Layering）。前者指旧规则被移除，新规则取而代之；后者则指新规则叠加于旧规则之上，旧制度保留但功能被逐渐替代，新制度与旧制度同时有效，只是在与旧制度并行的同时，多了一层新安排。^②这两个概念的引入有助于我们理解俄罗斯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目标和战略。

再次，朱莉娅·摩斯（J. C. Morse）和罗伯特·基欧汉（R. O. Keohane）提出的“竞争性多边主义”（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理论对理解俄罗斯的行为具有启发意义。该理论认为，平行制度建设是不满现状的国家在既有制度外部培育替代性平台的理性策略，^③国际制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由多个重叠制度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不满现状的国家既可以在既有制度内部推动议程改革（制度转换），也可以创建新的平行制度以施加外部压力（竞争性制度创建）。俄罗斯的行为显然更接近后者。

俄罗斯国内学界对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特点，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学

① R.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4, p.95.

② 需要说明的是，西伦和马奥尼采用上述两个概念，是用于讨论一国之内的制度变迁。在国际关系中，像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这样的国际机制，不可能因为某一成员国的不满就被“移除”。因此，本文所说的“制度替代”，不是指俄罗斯有能力废除这些旧机制，而是指俄罗斯试图建立平行的、功能重叠的新机制，用新机制来分流、稀释乃至架空旧机制的权威。See K. Thelen, J. Mahoney,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 Mahoney, K.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6.

③ J. C. Morse, R. O.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14, Vol.9, No.4, pp.385-412.

者对这一问题最为关注。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多极世界理论的奠基和研究，以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Е. Примаков）、亚历山大·登金（А. Дынкин）等人为代表；二是对反制裁联盟和金融自主的研究，以伊万·季莫费耶夫（И. Тимофеев）为代表的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群体对制裁的武器化逻辑、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和俄罗斯的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分析；三是对“大欧亚伙伴关系”等宏大叙事的研究；四是专门研究俄罗斯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机制关系的课题。俄国内学界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更多的是论证多极化的历史必然性和俄罗斯内外战略的正当性，侧重于为政府决策提供学术支撑。

二、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战略目标

判断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是侧重于制度替代还是制度层叠，首先要看它的目标。如果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彻底推翻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一套排他性的新秩序，那就是侧重制度替代。如果它的目标是在保留既有秩序、维持现有国际制度成员身份的同时，补充和备份一套新安排，那就是侧重于制度层叠。

俄罗斯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目标的演变经历了从融入到挑战的过程。2007 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下文简称“慕尼黑讲话”）是一个关键节点，标志着俄罗斯对外政策开始从融入西方向声索利益和地位转变。2007 年之前，俄罗斯尽管对北约东扩心存不满，但总体仍试图在西方主导的现有制度框架内争取更大话语权。普京 2000 年上台初期甚至表达过加入北约的意愿。但在慕尼黑讲话中，他罕见地以极其尖锐的措辞，直指美国“几乎毫无节制地过度使用武力”，认为“一个国家——当然首先是指美国——在各个方面都凌驾于别国之上，从经济角度讲，这不是什么好事；从安全角度讲，这令人反感”。^①此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2014 年乌克兰危机和 2022 年特别军事行动使对抗全面升级。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0 февраля 2007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并非谋求彻底推翻现行体系，而是试图在保持基本规则连续性的前提下，削弱美国及西方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垄断性主导权，使国际制度从西方中心转向多个权力中心并存的局面，在制度层叠中谋求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这一战略可归纳为五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其中前四项是对长远秩序的构想，第五项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第一，谋求平等伙伴地位。这是俄罗斯战略目标中的统领性诉求，其核心在于拒绝被西方制裁叙事矮化为“受排斥的次等国家”，要求各方承认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作为不可忽视之一极的地位。2024 年，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强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的 GDP 已跻身世界第四的位置”，尽管面临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非法制裁”，但仍是“世界贸易的关键参与者之一”。^①2025 年，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的视频讲话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继续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建立更公平、更民主、更符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②这种表态说明俄罗斯拒绝被矮化为受排斥的次等国家。

第二，创建替代性制度中心。俄罗斯认识到，仅靠金融自主不足以改变规则制定权的不对称格局，因此需要在七国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培育一个自身拥有制度性话语权的平行平台。金砖国家机制被明确界定为这一替代性权力的中心。普京总统多次强调，“金砖国家按经济指标已经数倍超越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其他联合体”^③。俄罗斯将金砖视为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制度支柱，并试图通过扩员和制度化，使金砖成为与西方主导机制平行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第三，建立本币结算体系，打破美元霸权。为获得平等地位，俄罗斯将金融主权视为优先突破口，其目标是通过降低对美元、欧元及西方清算体系的依赖性，摆脱极限制裁下的脆弱性。普京在 2022 年东方经济论坛上指出：

①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XXVII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7 июня 2024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74234>

②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об ускорении смены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6 июля 2025 г. <https://lent.a.ru/news/2025/07/06/putin-zayavil-ob-uskorenii-smeny-mirovogo-poryadka>

③ Там же.

“美元、欧元和英镑作为可结算、可储备、可计价资产的信用已经丧失……俄罗斯正一步步远离这些不可靠、自毁信誉的货币。”^①这一话语已转化为明确的政策目标：建立不依赖西方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支付通道，在贸易结算中逐步以本币替代美元和欧元。

第四，将战略资源转化为政治杠杆。货币与制度层面的秩序重构要以基础实力为后盾。俄罗斯认识到本国资源潜力巨大，足以将能源、粮食、关键矿产及物流通道从纯粹的商品转化为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中的施压工具。其目标是，如果西方无法在全球经济中绕开俄罗斯的关键资源供给，就必须在规则制定中给予俄罗斯相应的制度性话语权。

第五，打破制裁封锁，恢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上述四项目标均为俄罗斯的中长期秩序构想，而俄罗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突破西方在金融、贸易、物流和技术上的封锁，保障资本、商品、劳动力和技术在国际经济中的自由流动。2025 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新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美俄关系可能出现缓和迹象；另一方面，美国“极限施压”策略可能扩大化。因此，打破制裁封锁，恢复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正常联通，仍是其当前最优先的生存底线。

三、俄罗斯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基础

关于俄罗斯实力是否足以重建替代性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学界存在基本共识：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足以独立建立一个可与西方主导的秩序相匹敌的完整替代方案。约翰逊（J. Johnson）与克斯泰姆（S. Köstem）的核心判断是，俄罗斯有能力撼动现有国际秩序，但缺乏信誉、稳定性和经济影响力来领导创建一个新秩序。正是这种抱负与能力的落差导致俄罗斯日益转向反应性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②2022 年后的制裁效应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新证据：制裁确实重创了俄罗斯经济，但也催生了意外的适应机制，使俄罗斯

① 普京：США подорвали основы миро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7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radiosputnik.ru/20220907/putin-1815027118.html>

② J. Johnson, S. Köstem, “Frustrated Leadership: Russia’s Economic Alternative to the West”, *Global Policy*, 2016, Vol.7, No.2, pp.207-216.

在部分领域获得了不对称的讨价还价能力。

迪森（G. Diesen）对“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修正视角：俄罗斯意识到权力源自不对称经济依赖关系，而非单纯的经济总量或军事实力，因此正逐步以地缘经济思维取代传统地缘政治思维。^①戈茨（E. Götz）和梅伦（C. Merlen）的综述性研究揭示了学术界的立场分歧，对所谓“实力不足”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挑战目标的理解：如果俄罗斯的目标是建立全面替代西方秩序的平行体系，那确实力有不逮；但如果目标是在关键节点上形成不对称影响力，以撬动局部秩序重构，则其能力是相对充分的。^②综合理论文献与历史案例可以看出，俄罗斯虽不具备全面替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经济实力，但在五个关键领域拥有不对称的、足以撬动局部重构的有效能力。

一是制裁悖论与经济韧性。2022 年以来，在西方全面制裁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出现了与常规预期不符的“制裁悖论”现象。从宏观经济数据看，俄罗斯 GDP 并未出现预期中的崩溃。2022 年俄罗斯 GDP 仅温和下降 2.1%，随后在 2023 年强劲反弹，增长 4.1%，2024 年增长 4.3%，2025 年虽明显回落，但仍保持正增长。此前西方预测俄罗斯经济将出现两位数衰退的预言并未成真。俄罗斯经济表现出的韧性不仅得到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第三方机构的侧面印证。^③这种韧性的成因包括：进口替代的加速推进，能源价格的有力支撑，财政支出的持续刺激，以及与亚洲贸易伙伴关系的快速深化。

二是资源与商品的结构性权力。与经济总量相比，俄罗斯的能力核心更在于关键领域的不可替代性。作为全球主要能源、粮食、化肥和战略矿产出口国，俄罗斯掌握着世界经济中的“瓶颈性资源”。普京总统在 2024 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指出，尽管面临“非法制裁”，俄罗斯仍在积极扩展贸易的地理版图，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增长了 60%（2020—2023 年），

① G. Diesen, “The Geoeconomics of Russia’s Greater Eurasia Initiativ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2019, Vol.11, No.4, pp.566-585.

② E. Götz, C-R. Merlen, “Russia and the question of world order”,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8, Vol.20, No.2, pp.133-153.

③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5/april>）。

与中东国家的贸易翻了一番，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增长了 69%。^①这种资源权力的关键不在于俄罗斯能够“切断”全球供应，而在于短期内全球供应链难以找到规模相当的替代来源，从而赋予俄罗斯将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结构性杠杆。

三是替代性制度平台的实际运作能力。俄罗斯已不只是呼吁建立新平台，而是具备运作平行制度的基础设施。在金砖方面，俄罗斯在 2024 年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主办了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创设了“伙伴国”过渡机制，使金砖从五国论坛扩展为覆盖约半数全球人口的多层架构。在欧亚经济联盟方面，俄罗斯主导建立了一套具备超国家属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包括统一的关税同盟、共同的外部关税、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共同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制度平台的实际运作，证明俄罗斯已具备在既有秩序之外组织和维持多边合作机制的行政与制度能力。

四是金融突围与本币结算能力。俄罗斯在“去美元化”方面已经展现出将话语转化为制度安排的操作能力。俄罗斯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所谓“不友好国家”货币的份额已大幅下降，初步建立起以卢布、人民币等货币为主的跨境支付通道。截至 2026 年 5 月，俄罗斯国际储备已增长到 7710 亿美元。^②从国际储备方面看，俄罗斯央行持续减持美元和欧元资产，增持黄金、人民币和友好国家货币，外汇储备结构发生了显著调整。这些变化表明，俄罗斯已具备在局部范围内绕开西方金融基础设施的运作能力。

五是贸易流向和地缘通道的可行性。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不仅涉及制度和金融问题，还需要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俄罗斯在地理上占据了连接欧亚的关键枢纽位置。亚历山大·登金在分析中指出，俄罗斯是“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为欧亚伙伴关系提供“从北方海航路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基础设施支撑”。^③辽阔领土面积所赋予的地理禀赋，为俄罗斯重塑贸易版图提供

①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XXVII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7 июня 2024 г.

②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резервы РФ за неделю выросли на \$13,5 млрд. 15 мая 2026 г. https://tass.ru/ekonomika/27425665?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yandex.by%2f

③ Дынкин 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деология, технологии. 11 сентября 2024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transformatiya-mirovogo-poryadka-ekonomika-ideologiya-tekhnologii/>

了物理基础。在实践中，俄罗斯已开通面向亚洲的能源管道网络，并推动北方海航路成为连接欧洲与亚太地区物流的新通道，使俄罗斯能够在西方封锁下保持与亚洲市场的物理联通。

四、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行为逻辑

俄罗斯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中的行为逻辑与其战略目标和能力基础一脉相承，呈现四种相互关联的模式。

第一，反制性脱钩：重构跨境支付与金融通道。面对西方将美元清算体系、金融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武器化的制裁冲击，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行动，系统性降低对西方中心节点的暴露度。其逻辑在于：既然相互依赖关系已被网络中心国不对称地武器化，那么唯一理性的回应就是减少对该节点的单向依赖。在国际层面，俄罗斯建立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SPFS）作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替代，并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伊朗金融信息交换系统（SEPA）等对接，构建起一个绕开西方金融监控的平行支付网络。在双边层面，俄罗斯与中国、印度、阿联酋等国签署了本币结算协议。其中，俄罗斯对华贸易中本币结算比例已超过 99%。^①在区域层面，俄罗斯推动金砖国家内部建立共同的清算机制和支付平台，以减少对美元的集体依赖。在储备层面，俄罗斯央行大规模减持美元和欧元资产，增持黄金和友好国家货币，使外汇储备从“西方资产池”转变为“多币种安全垫”。相关数据显示，俄罗斯在金融领域的“去美元化”已从应急反应升级为结构性替代。^②

第二，建立平行制度：既不退群，也不盲从。俄罗斯在制度层面的核心行为逻辑是构建“竞争性多边主义”意义上的制度层叠：不退出既有国际机构，而是在其外部培育平行的议题网络和决策平台，以此增加与西方博弈的制度筹码。维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既有机构的成员身份，

① “俄财长：俄中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达 99%”，2026 年 5 月 13 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https://sputniknews.cn/20260513/1071238947.html>

② 从目前可查询到的数据来看，黄金储备在俄罗斯总储备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显著提高。See “International Reserv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nthly Value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Date”, *Bank of Russia*, https://www.cbr.ru/eng/hd_base/mrrf/mrrf_m/

使俄罗斯保留了在现有规则框架内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地位；通过金砖和欧亚经济联盟等平台，俄罗斯又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建立了以自身为关键节点的替代性制度网络。这种“不退群、另建群”的策略，使俄罗斯能够在两个轨道上同时运作：在既有秩序内争取规则解释空间，在平行秩序中积累制度性权力。

第三，贸易东转：重构对外经济合作版图。制裁切断了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和商品纽带，俄罗斯则以亚洲、中东和非洲为替代方向，重建出口物流网络。这一转向涉及能源管道、铁路网络、港口设施和海运通道的全方位基础设施重构。贸易东转使俄罗斯从传统的欧洲能源供应者转变为欧亚能源枢纽，使亚洲国家获得了稳定的能源供给来源，也使俄罗斯降低了对欧洲单一市场的依赖。这一转向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适应性选择，但它客观上强化了俄罗斯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结构性依赖关系，为俄罗斯在东方建立了新的经济腹地。

第四，资源武器化与区域一体化实践。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主权强化竞赛。俄罗斯强化主权的具体行为是：将能源出口方向从欧洲全面转向亚洲，使欧盟的能源“脱俄”进程成为俄罗斯对亚太地区增强影响力的动力；在粮食协议谈判中将粮食出口与西方制裁松绑挂钩；通过加强北极航线开发，规划新的替代性物流通道。资源武器化的核心机制在于争取获得“结构性的不可替代性”，即当全球市场在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来源时，资源供给国便获得了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能力。俄罗斯的资源武器化行为既是对西方制裁的直接反制，也是其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核心筹码。

五、俄罗斯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实际影响与局限

从近年发展动态看，俄罗斯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无论是在话语叙事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一）已产生的实际影响

第一，全球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趋势加快。俄罗斯的“去美元化”努力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对全球货币格局产生了实际的示范效应。美国和一些西方

国家的货币在俄罗斯贸易结算中所占比例已大幅下降，意味着一个大型经济体已实质性建立起绕过美元主导的平行结算通道。俄罗斯的实践表明，即使面对最严厉的金融制裁，一个资源型大国仍可通过本币结算、双边货币互换和替代性支付系统，维持基本的跨境金融联通。这为其他面临类似外部约束的国家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二，推动了国际经济治理的平台多元化。俄罗斯通过金砖扩容和欧亚经济联盟整合，使国际经济治理从西方中心向多中心并存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平台多元化的意义在于选择效应：当全球南方国家面临融资需求时，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还拥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替代选项。这种选项的存在本身就改变了借贷双方的议价关系。在融资层面，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批准约 350 亿美元的项目融资，^①其中相当比例投向了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第三，增强了俄罗斯经济应对制裁的能力，弱化了西方封锁的效果。贸易方向的东转和资源出口的重新定向，使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维持了基本的经济运转。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额呈现出大幅增长态势，亚洲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冲突前（2021 年）的约 40% 升至 2024 年的 72.6%，^②与印度、中国、土耳其、巴西和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增长最为显著，意味着美国及西方试图通过制裁将俄罗斯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的策略未能完全奏效。

（二）面临的结构性局限

第一，在经济体量上，俄罗斯与西方阵营存在着数量级差距。俄罗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GDP 虽位居世界第四，但按汇率核算，其经济规模与美国、欧盟或整个西方阵营相比仍不在同一量级。这种体量差距决定了俄罗斯无法凭一国之力支撑起一套全球性替代秩序，俄罗斯的目标只能在局部领域、特定区域和特定议题上实现，而非全面取代。俄罗斯经济的“重量轻、拳头硬”特征——总体量有限，但关键领域影响力集中——决定了其秩序重构策略必

① “南方潮起正扬帆——解码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成功之道”，新华网，2024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41026/a4afaebab426456eb2f08c5aa305eea2/c.html>

② “Russian trade surplus widens 7.8% to \$150.9 bln in 2024 – customs”, February 26, 2025,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110026>

须是“点穴式”的，而非“全面铺开式”的。

第二，俄罗斯替代平台的制度深度与凝聚力不足。金砖机制和欧亚经济联盟虽仍在正常运转，但其制度成熟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相比差距明显。金砖成员国之间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印度在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上持令人费解的独特立场，巴西、南非更关注发展融资而非地缘政治对抗，中东新成员国的加入虽扩大了代表性，却也稀释了组织行动的一致性。俄罗斯能够利用金砖作为论坛，但难以将其转化为一个规则完善的集团。替代平台的制度深度不足，意味着它们更多是议题倡导和融资工具，而非能够全面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制定机构。

第三，全球南方并非铁板一块，俄罗斯的话语感召力有限。俄罗斯将自身重塑秩序的行为包装为全球南方的集体诉求，但全球南方本身是一个高度分化的集合。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更优惠的融资条件和更大的制度话语权，而非与俄罗斯结成对抗西方的统一战线。当俄罗斯要求这些国家在西方制裁框架下选边站队时，许多国家选择同时维系与两边的关系。俄罗斯能够吸引部分国家参与本币结算或金砖合作，但难以构建一个以反西方为共同意识形态的制度化联盟。

第四，俄罗斯技术能力的结构性短板制约了自身的长期竞争力。资源权力和地理禀赋赋予俄罗斯短期内的不对称优势，但技术创新和高端制造能力的短板构成长期瓶颈。普京多次强调技术主权和数字化转型，并承认需要“额外拨款发展技术主权”和“结构性适应经济”。^①在西方国家收紧技术出口管制的背景下，俄罗斯的资源杠杆可以维持经济运转，但难以支撑其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技术标准制定权的能力。没有技术标准的支撑，俄罗斯在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中的角色将长期被锁定在“资源供应者”和“规则接受者”之间，难以升级为“规则制定者”。

总体而言，俄罗斯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行为已产生部分影响：削弱了美元垄断的绝对性，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选项，证明了极端制裁下的经济韧性。然而，其目标实现受制于四重结构性局限：经济体量的规模瓶颈，

^①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XXVII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7 июня 2024 г.

替代平台制度的浅层化，全球南方的利益分化，以及技术能力的结构性短板。这些局限共同决定了俄罗斯的影响边界：足以打破西方对秩序的垄断性主导，却不足以全面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秩序；足以在全球经济中维护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却不足以将资源权力转化为技术标准制定权。

六、结 论

本文考察了俄罗斯在受制裁状态下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战略目标、能力基础、行为模式与实际影响。俄罗斯的战略并非谋求全面推翻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制度的全面替代，而是试图搭建与既有秩序平行的轨道，建立一个西方无法单边垄断规则制定权的制度层叠模式。这一战略的核心特征是“不对称撬动”：俄罗斯并不具备在所有领域与西方匹敌的综合实力，但可以通过在关键节点（能源、粮食、金融和地缘通道）建立不可替代的平行体系，迫使既有秩序承认其制度性存在。从制度变迁的类型学来看，俄罗斯的行为更接近制度层叠，而非制度替代：它并未寻求推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既有机构，而是在其外部培育金砖、欧亚经济联盟等平行平台，以增加与美国及西方博弈的筹码。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未必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彻底胜利或完全替代，而更可能呈现为秩序内部的权力碎片化与制度平行化。对面临相似外部约束的国家而言，俄罗斯案例揭示了不对称能力撬动秩序局部重构的可能性：不需要在所有领域匹敌霸权国，只需在关键节点上建立不可替代的平行体系，即可迫使既有秩序承认其制度性存在。但这条路径的代价是，俄罗斯将长期被锁定在“资源供应者”和“规则接受者”的身份之间，难以凭借自身实力完成从“秩序挑战者”到“秩序共同塑造者”的全面转型。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世界失序阴影下的中亚秩序及其变化*

曾向红**

【内容提要】近年来,世界秩序面临失序压力,这种态势正在向中亚等地区传导。行为体之间稳定、可预测的互动模式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可从权力结构、互动规则、主要议题和行为策略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结构松动、互动规则承压、议题领域多元和外部竞争加剧等变化,虽然给中亚秩序的稳定带来压力,但尚未导致地区秩序失控。俄罗斯在中亚的优势地位有所削弱,但仍保有在关键领域的影响。域外行为体虽更加活跃地参与中亚事务,但主要集中于经贸、矿产、能源等具体领域。与此同时,中亚五国持续推进多元平衡外交和区域协调,避免被卷入阵营对抗。总体而言,中亚地区长期形成的“无声协调”与“错位竞争”模式仍在延续。当前中亚秩序的基本状态可概括为“承压中的延续”。至于中亚秩序能否长期保持稳定,既取决于外部竞争能否继续限制在可调适的范围内,也有赖于中亚国家维持多元平衡的能力。

【关键词】国际秩序 中亚地区秩序 中亚外交 俄乌冲突 大国竞争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3-0042(13)

近年来,全球格局深刻变动,国际秩序面临多重压力。俄乌冲突长期延宕,中东战火再起,印度与巴基斯坦军事摩擦时有发生,地区冲突频仍与大国竞争交织,严重冲击国际和平与稳定。在经济领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议题的政治化和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严重阻碍全球经济的正常运

* 2026年4月26日至27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论坛在中国上海举行,曾向红教授在会上作主题发言,本文系作者根据发言内容的修订和拓展。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西方意识形态攻势新动向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研究”(项目批准号:22YJCGJW010)的阶段性成果。

** 曾向红,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西南政法大学亚欧研究院研究员。

行，“美国优先”的长期化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动荡。^①与此同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也受到严重冲击。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行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肆意侵犯他国主权，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准则。^②区域冲突扩散、经济秩序混乱和全球治理失能共同作用，使世界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失序倾向。

在世界失序压力下，中亚秩序也受到多重因素的持续冲击。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使中亚从相对边缘的欧亚内陆区域重新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场域，中亚国家在处理对俄、对华、对美、对欧关系时面临更加复杂的平衡压力。关键矿产争夺升温，使中亚的资源价值被进一步战略化，能源、矿产和其他关键原材料不再只是经济发展议题，也被纳入大国供应链安全和产业竞争之中。^③交通运输通道竞争加剧，提升了中亚作为欧亚大陆连接节点的地位，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等线路安排，改变了地区国家的经济机会，也重塑了外部力量进入中亚的路径。^④与此同时，美国、欧盟、土耳其、印度、日本等域外行为体增加介入，既扩大了中亚国家的外交选择，也使地区权力关系更加复杂。“C5+1”、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欧盟-中亚合作等多重区域制度在中亚重叠运行，既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更多合作平台，也带来了制度竞争、议程交叉和规则协调压力。^⑤尽管如此，中亚五国总体上仍维

① 付舒：“‘美国优先’长期化：民粹主义外交的民意基础”，《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第66-91页；丑则静：“从转型到危机：‘美国优先’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第46-65页。

②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打击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26年1月4日第3版；“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26年3月3日第15版。

③ 赵会荣：“关键矿产地缘博弈：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布局、制约因素与影响分析”，《国际论坛》，2026年第2期，第28-44页；曲文轶、贾鹏悦：“中亚各国正将关键矿产竞争转化为发展杠杆”，《世界知识》，2026年第5期，第31-33页。

④ 参见庞卫华、曾向红：“欧亚‘中间走廊’计划的演进及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11期，第43-63页；焦一强、蒋存昊：“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动因、路径与实践”，《俄罗斯研究》，2025年第3期，第85-115页；蒿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的进展、挑战与思考”，《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5期，第24-42页。

⑤ 杨双梅：“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态势与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2期，第80-99页；周明、林宇晴：“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类型与前景研究”，《俄罗斯研究》，2025年第4期，第93-134页。

持了较高的政策自主性和地区稳定性，通过多元平衡外交、议题切换和区域协调，在外部竞争加剧的环境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

一、国际秩序的内涵

秩序意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①，其关键在于“可预测性”，体现着国际社会对和平与稳定的普遍追求。无论是地区秩序、国际秩序，还是全球秩序、世界秩序等概念，虽指涉的行为体与关涉的秩序范围有所不同，但共同关注的都是行为体之间能否形成可预期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能否降低不确定性，约束冲突烈度，维持稳定合作。

受限于理论立场与认知差异，不同学者对国际秩序的界定各有不同，但国家行为始终是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赫德利·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中对国际秩序的界定，对此后的国际秩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指的是一种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基本或主要目标的互动模式（pattern of activity）。^②许多学者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国际秩序的重点是如何塑造并维系国家间行为及其互动关系的模式。^③换言之，国际秩序可被视为行为体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所形成的稳定状态。^④

国际秩序是一个高度复合的概念，既包含规范和塑造行为的各种制度与规则，也蕴含着秩序的目标与价值观念，^⑤但其核心始终是“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形成的稳定、可预测的互动模式”。行为的可预测程度是衡量秩序稳定与否的关键指标。换言之，在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行为越符合普遍预期，互动的可预测性越高，国际秩序就越稳定；当行为频繁偏离预期，互动的不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691 页。

② H.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8.

③ M. Barnett,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1, Vol.14, No.1, p.4.

④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 年第 1 期，第 1 页；潘忠岐：“世界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9 页。

⑤ 曾向红、高伟通：“上海合作组织的秩序构建逻辑与国际秩序变革路径”，《外交评论》，2026 年第 3 期，第 82-85 页。

确定性持续上升,国际秩序便会呈现失序倾向。这种行为预期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并体现为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

从可预测性看,国际秩序是一个中性概念,有序与失序主要体现为稳定程度的差异,而不能简单等同为有秩序与无秩序的对立。与此同时,国际秩序并非静态,而是在长期互动中动态生成和演变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对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发挥着关键作用。即便处于无政府状态,行为体也可能通过持续互动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秩序。相反,即便处于等级制结构之中,一旦既有互动模式难以维系,行为预期发生偏离,秩序的可预测性也会随之下降,并进一步引发失序风险。

二、国际秩序的构成

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国家之间形成的互动模式,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实质上是对这一互动模式的生成机制进行分析。互动模式的形成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权力结构、互动规则、主要议题和行为策略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有理解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把握国际秩序的构成及其演变逻辑。

一是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及对比格局,决定着国际秩序的基本性质。^①新现实主义关于体系结构与国际关系稳定的讨论,正是从权力结构出发解释国家互动模式的形成。^②肯尼思·华尔兹关于两极结构较多极结构更为稳定的论断,^③实际是在讨论权力结构对行为预期和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与此同时,围绕单极稳定、霸权稳定和多极稳定的持续争论,也从侧面说明权力结构能够对互动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却难以直接决定秩序稳定与否。不同权力结构会塑造不同的战略环境和行为预期,但

① 赵可金:“从国际秩序到世界秩序转型中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2期,第38-39页。

② 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09-131页。

③ 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的第七章至第九章,从经济、军事与国际事务管理三个方面论述了两极结构在维护国际稳定上优于多极结构。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7-227页。

权力结构与秩序稳定之间并非简单的映射关系，权力结构仍需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才能转化为具体的秩序形态。

二是互动规则。互动规则指国家所共享的规则与制度，它为国家行为提供具体的约束与预期，塑造互动模式的基本边界。如上文所述，权力结构虽然能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塑造作用，但无法在特定环境或情势下预测国家的具体行为。互动规则既包括国际条约、国际法原则和公认准则等硬规则，也包括国家之间形成的惯例、默契和共识等“潜规则”。无论是硬性成文规则还是软性“潜规则”，其核心功能都在于增强行为预期的可预测性，使合作、竞争和冲突能够在一定边界内展开。需要指出的是，规则的内容与约束力并非既定的静态存在，而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动，在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变与调整。

三是主要议题。国家在特定时期围绕哪些问题展开互动，也会影响国家间的互动模式。不同议题所包含的利益敏感性、冲突风险和合作空间并不相同，因而会塑造不同的行为预期和互动模式。国家安全、领土主权等“高政治”议题，通常更容易强化国家的威胁感知，推高竞争烈度，并压缩妥协空间。而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低政治”议题，则更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预期，并推动国家长期维持互动关系。与此同时，议题性质并非固定不变。同一议题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政治语境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效应。随着经济议题被安全化，供应链、关键技术、能源和矿产等领域也可能成为竞争甚至对抗的领域。

四是行为策略。为实现自身利益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国家会采取差异化的行为方式。国家行为并非被动地承受结构与规则的影响，而会根据国家实力、地理位置、发展目标、政治文化和利益排序作出策略性选择。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制衡、追随、对冲等概念的讨论，都涉及国家如何在特定环境下选择行为策略。不同行为策略也会产生不同的互动结果，克制、协调和有限竞争有助于维持行为预期的稳定，而施压、冒进和破坏规则的行动则会削弱既有互动模式的可预测性，并增加失序风险。

在权力结构、互动规则、议题关注和行为策略的共同影响下，国家经过长期实践会逐渐摸索出一条较为稳定的与他国相处之道，从而实现对彼此行

为的可预测。而这四个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层次区分和转化关系。权力结构是国家开展互动的前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以何种身份与位置进入互动关系。互动规则提供了行为的框架与范围，使国际互动能够被制度化、规范化，并转化为较为稳定的行为预期。主要议题决定互动的具体场域，影响着国家之间利益冲突或合作空间的大小。行为策略则将结构、规则和议题等转化为现实行动。与此同时，行为策略并非单向受制于前三个因素，主要国家的自主行动也会反过来改变规则的有效性，推动议题领域发生变化，并在长期过程中影响权力结构的调整。因此，国际秩序的形成不是从权力结构直接推导出来的，也不是由规则或议题单独决定的，而是在多重因素相互嵌套、持续作用的过程中，逐渐稳定下来的互动模式。秩序稳定的关键在于这些因素能否形成相对协调的组合：权力结构是否能够被国家接受，规则边界是否仍具约束力，主要议题是否具有协调空间，行为策略是否维持在可预期范围内，只要这些条件大体成立，国际秩序就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反之，一旦这些因素之间发生错位，行为预期便会产生偏差，国际秩序也会滑向失序。

总的来看，国际秩序是一个体系层面上的现象，并且是一种“涌现”现象，其生成和维系由多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当然，根据观察对象的不同，也可将秩序定位在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多个层面。各个层面的秩序并非简单的“整体-部分”关系，它们相互嵌套，相互塑造。具体来看，一方面，地区秩序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国际秩序的稳定不仅受大国关系和全球性制度的影响，也取决于各个地区的秩序。另一方面，国际秩序的变化也会深刻影响地区秩序。尤其是在大国力量投入较多、地缘位置重要、资源价值突出的地区，全球层面的权力竞争往往会更直接地介入地区政治过程，推动地区秩序的变化与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之间既相互影响，彼此之间也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国际秩序的稳定需要以各地区秩序的稳定为前提，但也可以在特定地区秩序失序的情况下维持体系层面上的稳定。因而，可以分别就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开展研究。

三、当前中亚地区秩序的变化

近年来，国际秩序的失序压力不断上升，并通过风险外溢、经济波动、

制度竞争等影响着中亚地区秩序。俄乌冲突长期延宕，不仅重塑了欧亚大陆的安全格局，也深刻影响着中亚国家的内政外交。与此同时，最近发生的美以伊冲突进一步增加了周边安全的不确定性，使中亚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毗邻区域的动荡已经给中亚国家的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物价上涨，通道遇阻，就业机会减少，安全形势恶化等。在全球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亚的地缘位置、资源价值等被进一步重视，域外行为体通过经济、外交等手段更加积极地介入地区事务。由此，中亚秩序面临的压力既来源于周边地区动荡的溢出效应，也受到了全球层面的权力竞争和制度调整的影响。在内外形势明显恶化的背景下，需要仔细考察影响中亚地区秩序的构成因素的特点及其变动状态，以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中亚地区秩序变化的前景。

（一）中亚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该地区的权力结构长期呈现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准单极”特征。这种结构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能够支配中亚国家的内外政策，而是指俄罗斯在军事安全、劳务流动、能源网络和精英联系等方面，具有其他域外大国难以替代的综合影响力。中亚国家虽持续推进多元外交，但在安全危机处置、地区稳定维护和重大对外关系协调中，仍需充分考虑俄罗斯的立场与反应。由此形成的力量格局，为地区行为体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权力背景，也使外部力量进入中亚时通常会顾及俄罗斯的特殊地位。

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这一“准单极”结构出现松动。俄罗斯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入乌克兰方向，经济帮扶能力、外交协调能力和安全供给能力受到不同程度削弱。俄乌冲突也改变了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实力和行为方式的判断。^①中亚国家仍需维持同俄罗斯在安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密切联系，同时更加重视降低过度依赖，主动拓展与中国、美国、欧盟、土耳其、印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空间。域外力量也借此加大对中亚的投入，通过领导人峰会、经贸合作、能源开发、关键矿产、互联互通和安全合作等方式提升影响力。由此，中亚权力结构开始由“俄罗斯优势主导”向“俄罗斯仍具

① 杨进：“俄乌冲突以来中亚安全格局新动向——基于区域安全复合理论的考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6 年第 1 期，第 120-121 页。

关键影响、多方力量并行进入”的状态转变。

不过，中亚尚未形成成熟的多极结构。俄罗斯在军事安全、经贸往来和制度合作方面仍有深厚基础，其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以及双边安全合作中的地位难以被迅速替代。^①中国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发展议程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和土耳其等行为体也在不同议题上扩大介入，但这些影响大多具有议题性和功能性，尚不足以全面重塑地区权力格局。更准确地说，当前中亚权力结构是“准单极结构的松动”与“有限多极化的推进”并存。

这种变化扩大了中亚国家的战略回旋空间，也增加了地区竞争的复杂性。俄罗斯优势地位的相对下降，使中亚国家能够更灵活地推进多元平衡外交。但外部力量的集中进入，则使关键矿产、交通通道、能源合作和安全议题更容易成为竞争焦点。尽管如此，当前权力结构变化尚未导致地区互动模式发生根本性断裂。俄罗斯仍积极发挥地缘、安全、文化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强化对中亚外交，^②其他外部力量则主要在特定议题和功能领域扩大存在。中亚国家也普遍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因此，中亚地区正在从单中心色彩较强的结构转向更加复杂的多种力量并存状态，但这种变化仍未明显削弱地区秩序的基本可预测性。

（二）中亚地区互动规则的变化

中亚秩序的稳定不仅受到权力结构的影响，也依托主要行为体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规则边界。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与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外部行为体在反复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互动规则。这套规则既包括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际法准则，也包括一些未公开或成文的，却在地区实践中发挥约束作用的“潜规则”。具体而言，各方承认中亚国家的主权地位，避免公开否定中亚国家在外交上的自主选择。兼顾俄罗斯在中亚安全、政治和历史联系中的特殊影响。接受中亚国家在大国之间保持多元平衡的外交方式，并在总体上将维护地区稳定

^① A. Kazantsev, S. Medvedeva, I. Safranchuk,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Central Asia in Greater Eura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21, Vol.12, No.1, pp.59-61.

^② 许昌志：“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变’和‘不变’”，《俄罗斯研究》，2025年第4期，第85-88页。

视为共同目标。^①各行为体共同遵循这些规则，并不意味着彼此利益一致，而是为竞争划定了基本边界，使外部力量在介入中亚时保持必要的克制。这套互动规则的关键作用在于，把在中亚的大国竞争限制在相对可控的范围之内。中亚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竞争的影响，也难以完全排除外部力量的介入。但长期以来，各方竞争大体围绕具体的合作领域展开，很少演变为直接或公开的对抗。其原因就在于，主要行为体在实践中形成了某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预期。正是这些明规则和“潜规则”的结合，使中亚地区内部、外部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

当前，中亚地区互动规则面临新的压力。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关于俄罗斯特殊地位的政治默契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俄罗斯因俄乌冲突承受战略消耗和国际压力，西方国家也更加积极地通过“C5+1”、欧盟-中亚合作等方式扩大在中亚的存在。这些行动虽不直接破坏中亚秩序，但弱化了尊重俄罗斯地区特殊地位的政治默契，使俄罗斯更加敏感地看待西方在中亚的介入。由此，中亚地区的规则压力并不主要表现为国际法原则的全面失效，而表现为“潜规则”中的关键部分发生松动。外部行为体承认中亚国家主权，仍以维护地区稳定为公开目标，但围绕俄罗斯特殊地位的竞争正在增多。

不过，这种变化尚未导致中亚互动规则的整体破裂。中亚五国仍坚持主权独立和多元平衡外交，避免在俄罗斯与美国、西方的对立中作出排他性选边。中国、俄罗斯、美国以及其他外部行为体在扩大地区影响时，也大多以经济合作、互联互通、资源开发和制度对话为主要方式，并未公开推动中亚地区形成对抗性阵营。换言之，中亚互动规则正在承受压力，但其基本框架仍在延续。当前中亚规则秩序的关键在于，俄罗斯特殊地位的松动是否会进一步激化外部竞争，并压缩中亚国家维持多元平衡的空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中亚地区各行为体的政治默契可能随之削弱，地区秩序的稳定也会受到更大冲击。

（三）中亚与大国主要关注议题

主要议题决定行为体互动的性质和烈度。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域外行

① 曾向红：“‘无声的协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0 期，第 47-58 页。

为体对中亚的关注重点经历了明显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亚国家相继独立，域外国家主要关注该地区的核武器遗留、国家承认、外交关系建立和能源开发等问题。这一时期的议题重心在于管控苏联解体后的安全风险，并将中亚国家纳入国际体系。地区竞争虽然已经存在，但主要集中在外交布局和资源开发层面，尚未形成持续化的大国对抗。^①

“9·11”事件后，中亚议题明显安全化。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中亚被纳入反恐战争和军事后勤体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边境安全、政权稳定成为主要议题。2003 年至 2005 年，后苏联空间发生“颜色革命”，进一步激化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政权安全的敏感性，并刺激俄罗斯与其他外部力量围绕政治改革、民主输出和政权稳定展开更具对抗性的互动。^②政权安全等议题具有较强零和性，直接关系中亚国家国内稳定和俄罗斯周边安全判断，因此这一阶段的大国互动更具攻防色彩，地区秩序的稳定性的也更加脆弱。

近年来，中亚议题再次发生调整。俄乌冲突、供应链重组和大国竞争加剧，使中亚的地位从传统安全空间进一步扩展为资源空间、通道空间和制度合作空间。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土耳其等行为体更加重视同中亚国家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C5+1”、欧盟-中亚合作等机制更加活跃。与此同时，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提升了中亚在欧亚交通体系中的地位，能源、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也被纳入供应链安全和产业竞争议程。由此，中亚议题由单一安全逻辑转向安全、资源、通道和制度等层面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复合模式。

这种议题变化使中亚竞争重新升温，但并未达到使地区失序的程度。关键矿产、能源通道和机制合作具有战略属性，容易被外部行为体纳入大国竞争框架。但在这些议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协调空间，可以通过联合开发、项目合作、外交协商展开互动。与政权安全、军事基地和阵营对抗相比，资源

① R. Menon,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Survival*, 2003, Vol.45, No.2, pp.187-189.

② 参见赵华胜：“‘颜色革命’后欧亚地区形势的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11 期，第 28-33 页；冯绍雷：“‘颜色革命’：大国间的博弈与独联体的前景”，《俄罗斯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7-16 页；陈玉荣：“‘颜色革命’与美俄角逐独联体”，《国际问题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15-19 页；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国际观察》，2005 年第 3 期，第 1-8 页。

开发、交通建设和机制合作的零和性相对较低，也为中亚国家保留了多元平衡的操作空间。因此，当前中亚地区秩序面临的议题压力主要来自经济议题的战略竞争。只要这些议题没有进一步转化为政权安全对抗、军事集团竞争或排他性阵营建构，中亚地区互动模式的基本可预测性仍能维持。

（四）行为体的主要行动策略

分析中亚地区秩序，不能只看大国政策和外部竞争，也要看中亚五国自身的外交选择。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俄罗斯在安全、经济、劳务流动、交通网络和制度联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各国在对外政策中普遍需要优先处理对俄关系。随着国家建构的推进和主权意识的增强，中亚国家逐渐减少了对单一方向的依赖，形成以多元平衡为核心的外交取向，不断提升自身的战略自主性。^①土库曼斯坦的永久中立政策突出了自身的外交独立性。乌兹别克斯坦则长期通过灵活调整对俄、对美关系，维持政策自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在不同条件下发展出多向外交。虽然中亚五国国家实力、地缘位置和安全需求各不相同，但避免过度依附单一外部力量已经成为中亚国家处理大国关系的共同原则。

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国家进一步强化多元平衡策略。^②俄罗斯仍是地区安全、劳务流动和部分经济联系中的关键行为体，但俄乌冲突削弱了俄罗斯作为单一依靠对象的稳定性，也使中亚国家更加重视分散风险。中亚五国一方面维持同俄罗斯的必要合作，避免冲击既有安全和经济联系，另一方面扩大同中国、欧盟、美国、土耳其、印度、日本及海湾国家的合作空间。其政策目标并非用某一外部力量替代俄罗斯，而是通过多方向合作扩大自己的选择余地，提高面对大国时的议价能力。同时，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协调有所增强。这有助于提升中亚整体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中亚国家领导人协商机制持续推进，水资源、边界、交通、能源和安全等议题上的对话增多。^③虽然中亚尚未形成高度制度化的一体化机制，但五国正尝试以地区主体身份参

① 许涛：“中亚国家战略自主意识增强：动因、目标与困境”，《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4 期，第 42-63 页。

② E. Dzhuraev, “Central Asian Stances on the Ukraine Crisis: Treading a Fine Line?” *Connections*, 2015, Vol.14, No.4, pp.7-8.

③ 杨进：“俄乌冲突以来中亚安全格局新动向——基于区域安全复合理论的考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6 年第 1 期，第 130-135 页。

与外部互动，避免被卷入不同大国的阵营对抗之中。

从秩序稳定看，多元平衡外交限制了外部竞争向阵营对抗的转化。虽然五国在具体政策上难以对各大国保持完全等距，不同国家的安全依赖和经济侧重也存在差异，但它们普遍避免将自身绑定于某一排他性集团。只要这一策略延续，中亚地区的大国竞争就更可能表现为整体可控，而不会发展为公开的集团对抗。由此来看，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和区域协调，是地区互动模式仍能保持基本可预测性的重要原因。

（五）中亚地区行为体互动模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中亚形成了“无声协调”和“错位竞争”的互动模式。^①各主要行为体在尊重中亚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展开竞争，但优势领域相对分离，冲突主要集中在各自重点议题上。俄罗斯依托安全、政治、劳务流动和历史联系保持影响，中国通过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合作，西方国家聚焦能源、制度和部分安全议题，土耳其、印度、日本等行为体则在更为具体的项目上发挥作用。由于各方优势不完全重叠，竞争虽长期存在，但并未转化为各行为体之间的激烈对抗。

随着俄罗斯在中亚的相对优势逐渐削弱，外部行为体更加积极地介入中亚地区，加上关键矿产、油气资源、交通运输的战略价值上升，导致“错位竞争”出现部分重叠。当前，外部力量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持续加剧，但仍普遍把地区稳定作为约束，并未要求中亚国家排他性选边。因此，中亚互动模式的基本特征仍在延续，“无声协调”维持最低限度的稳定默契，“错位竞争”仍是主要竞争形态。

总的来看，当前中亚地区秩序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竞争条件的改变，而非互动模式的断裂。俄罗斯优势地位有所松动，外部力量进入更加积极，关键矿产、交通通道和机制合作等议题的战略属性上升，使地区竞争的密度和重叠程度明显增加。但这些变化尚未从根本上动摇大国与中亚国家在该地区形成的基本互动模式。事实上，中亚地区的权力结构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动，且各主要大国仍主要通过议题合作、机制对话等方式扩大影响，中亚国家也继

^① 参见曾向红、王子寒：“‘错位的竞争’：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新态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6期，第23-48页。

续通过多元平衡外交和区域协调维持自主空间。因此，中亚秩序当前呈现出“结构松动、规则承压、议题升温、策略调适”的复合状态。其结果不是地区秩序失控，而是既有“无声协调”和“错位竞争”模式在更高压力下继续运行。

四、结 语

当前国际秩序的失序压力正逐渐向中亚传导。中亚的地缘位置、资源禀赋和连接作用正被重新赋予战略意义，域外力量围绕机制合作、关键矿产、交通要道的投入明显增加。因此，中亚地区已难以置身于世界秩序变动之外，其秩序稳定面临更复杂的挑战。然而，中亚地区秩序能保持相对稳定，其根本原因在于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仍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俄罗斯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关键领域依旧保有优势。域外力量更加活跃地参与中亚事务，但仍主要集中在资源、通道、经贸等领域。与此同时，中亚国家持续强化多元平衡外交，在扩大外部合作的同时避免“选边站”。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中亚地区的大国竞争向阵营对抗和安全冲突转化的倾向。

当前中亚秩序的变化可以概括为“承压中的延续”。一方面，地区秩序承受着更强的战略竞争压力，原有的默契正在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无声协调”和“错位竞争”的互动模式仍未破裂。各方虽然竞争加剧，但仍大体承认中亚国家的主权和外交自主，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这使中亚地区在欧亚大陆多处冲突外溢的背景下，仍能保持较高程度的秩序可预测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亚秩序不会陷入动荡。如果关键矿产、通道建设或安全合作进一步被纳入排他性阵营逻辑，或者外部行为体迫使中亚国家在大国之间明确选边，现有互动模式的可预测性就可能下降，中亚地区秩序的稳定将难以保证。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国别与区域研究

悬置型欧洲化： 外高加索国家的彷徨与探索

田德文 郭莎莎*

【内容提要】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外高加索国家的对欧关系呈现出既未完成制度融合、又难以摆脱欧盟规范与市场牵引的结构性状态，可将其描述为“悬置型欧洲化”，其内涵包括政治绑定性、经济依附性和战略工具性三个维度。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建构“宏观整合失序-中观大国博弈-微观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可以提出，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地区经济空间的碎片化与替代性整合机制不足，使该地区出现制度真空；多元外部力量竞争性介入与相互牵制进一步强化了三国的对俄离心趋势；治理能力、认同结构和资源禀赋差异限定了外高加索三国的政策选择空间。这三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使三国的欧洲化悬置状态逐渐固化为具有自我再生产能力的稳态结构。比较研究表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分别呈“被动悬置”、“策略性悬置”和“主动悬置”形态，外部结构约束决定悬置的共同特征，国内能动逻辑塑造悬置的形态差异。破解悬置困局需要外高加索国家立足本国发展条件突破单一地缘依附，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多边国际合作体系，借助“一带一路”等平台拓展多元均衡国际合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该分析框架也可以为理解西巴尔干地区欧洲化困境及“全球南方”国家融入世界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悬置型欧洲化 外高加索 欧盟东扩 经济主权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2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3-0055(40)

* 田德文，宁波工程学院中国中东欧创新合作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郭莎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国家地处欧亚地缘枢纽，是连接欧洲、中东与中亚的战略通道，历来是大国博弈的焦点。2020 年以来，纳卡冲突落幕、俄乌冲突外溢与欧盟影响力渗透推动三国对欧关系走向分化。亚美尼亚议会于 2025 年正式通过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首次以国内立法形式将加入欧盟的目标制度化。^①格鲁吉亚于 2022 年提交入盟申请并于 2023 年获得候选国地位，但长期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于 2024 年 11 月宣布，在 2028 年年底之前不会将开启入盟谈判一事提上议程，入欧进程陷入停滞。^②阿塞拜疆虽未启动入欧进程，但与欧盟在能源、贸易、交通等重点领域保持密切的功能性合作。^③三国路径不同，共同问题在于欧洲化进程均已深度嵌入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和外交选择，却始终无法转化为可预期的入盟前景。这使得它们陷入相似的困境，既无法在欧洲化进程中实现与欧盟的实质性制度融合，又难以脱离对欧洲的政治经济绑定，长期处于入盟前景与制度停滞并存的中间状态，从而陷入政治受欧盟规范约束、经济趋于依附欧洲、外交被欧盟工具化的被动局面，自主发展空间被持续压缩。

后苏联空间经济与安全的加速碎片化是推动上述困境形成的起始因素。苏联解体后，独联体经济纽带持续松弛，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制裁进一步撕裂原有的整合框架，外高加索三国加快对俄罗斯经济的脱嵌，对域外市场的依赖日益增强。旧框架解体与新机制缺位共同造成长期的“转型空档”，使外高加索三国经济空心化风险持续累积。

多元外部力量的竞争性介入加剧了外高加索国家的战略困局。欧盟仍以规范条件推动欧洲化，但受“扩张疲劳症”和成员国扩员共识不足的制约，其激励效力明显下降。^④2020 年纳卡战争以来，尤其是阿塞拜疆 2023 年重

① “Joint statement on the adoption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Armenia of the law on the initiation of the process of accession of Armenia to the EU”, *European Parliament*, March 26 2025,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elegations/en/joint-statement-on-the-adoption-by-the-n/product-details/20250326DPU39920>

② “Georgia”,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countries/georgia_en

③ “Azerbaijan”,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azerbaijan>

④ F. Schimmelfennig, “EU political accession conditionality after the 2004 enlargement: consistency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8, Vol.15, No.6, pp.918-937.

新控制纳卡、俄罗斯维和部队于 2024 年撤出后，^①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安全主导地位明显下降，仅凭借能源供应、军事存在、侨民网络和未决安全议题保留一定影响力，地区力量格局随之加速重组。欧盟、土耳其和美国等外部力量同步介入，持续向三国施加“选边站队”的压力，使其难以在多元合作中保持平衡。因此，外高加索的欧洲化困局，本质是旧经济空间趋于解体、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融入新经济空间受阻与多元地缘拉扯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外学界围绕外高加索欧洲化问题的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欧盟“邻国政策”中的条件性机制研究。这类研究揭示入盟激励弱化对规范传导效应的侵蚀，^②却较少解释多重外部力量竞争中欧盟条件性机制何以被削弱。二是以欧盟与俄罗斯两极博弈为核心的外部竞争解释。托鲁普（J. Tolstrup）的“守门人精英”框架强调，外部压力对国家制度选择的影响以国内精英对外部联系网络的主动开启、限制与重塑为中介。^③该框架有助于解释欧盟与俄罗斯竞争背景下后苏联国家制度路径的差异，但其分析重心仍主要集中于欧俄两极互动，对土耳其、美国等第三方力量所造成的多中心竞争格局解释不足。三是国别案例分析。重点讨论外高国家在技术性治理、政策文本和部门合作层面能够较快采纳欧盟规则，但在涉及国家安全、对外战略和核心权力重组的关键领域却难以完成相应转型，从而形成表层靠近欧洲、深层停滞不前的欧洲化困局。^④总的看来，相关研究尚未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概念，也未能进一步说明这种悬置状态何以能够持续自我再生产。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外高加索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类议题。一是从

① “Ceasefire monitoring centre in Nagorno-Karabakh shuts as Russian peacekeepers withdraw”, *Reuters*, April 26,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easefire-monitoring-centre-nagorno-karabakh-shuts-russian-peacekeepers-withdraw-2024-04-26/>.

② See F. Schimmelfennig, U. Sedelmeier, “Governance by Conditionality: EU Rule Transfer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4, Vol.11, No.4, pp.661-679.

③ J. Tolstrup, *Russia vs. the EU: The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in Post-Soviet Stat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4.

④ See L. Delcour, K. Wolczuk, “The EU’s Unexpected ‘Ideal Neighbour’? The Perplexing Case of Armenia’s Europeanis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015, Vol.37, No.4, pp.491-507.

后苏联空间秩序重组的角度讨论外高加索安全格局与大国竞争的关系。如杨进比较了中国、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不同的外交路径,^①王栋等分析美国、俄罗斯对后苏联国家制度变化的干预逻辑。^②二是围绕“一带一路”、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讨论地区互联互通与经贸合作潜力。如于琴以中亚实践为例,探讨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民众获得感的生成机制,^③焦一强等分析了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的动因、路径与实践,说明该通道已成为欧亚大陆运输格局调整的重要变量。^④三是围绕纳卡冲突、亚美尼亚西向调整、格鲁吉亚入盟受阻和阿塞拜疆能源外交等话题展开国别政策研究。这些成果为理解外高加索国家的安全困境和外交选择作出了贡献,但总体偏重政策过程、地缘态势和国别事实梳理,较少把制度吸纳、经济依附和大国博弈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基于此,本文提出“悬置型欧洲化”(Suspended Europeanization)概念,用以解释外高加索三国在对欧关系中既无法实现充分的经济融合,也无法脱离政治经济绑定的长期停滞状态。本文认为,这一困局是后苏联经济空间碎片化、多元大国博弈与中小国家结构性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破解路径在于突破地缘依附,以多元均衡的国际合作重塑经济主权与发展自主性。这种逻辑线路对于解释西巴尔干国家欧洲化困局,乃至“全球南方”国家融入世界体系过程中的结构性困境也具有理论意义。

本文拟分四部分展开论述:一是界定悬置型欧洲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搭建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二是通过对外高加索三国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悬置困局的差异化路径与形态;三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分析悬置化风险的结构成因;四是探讨破解悬置困局的可行路径及其理论的延伸意义。

① 杨进:“中俄与南高加索三国外交关系模式比较及辨析”,《俄罗斯学刊》,2020 年第 10 期,第 89-104 页。

② 王栋、王耀正:“美俄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度变化的行动与态度——制度扩散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国际展望》,2022 年第 6 期,第 51-72 页。

③ 于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获得感构建路径研究——以中亚实践为例”,《欧亚经济》,2026 年第 3 期,第 17-32 页。

④ 焦一强、蒋存昊:“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动因、路径与实践”,《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85-115 页。

一、悬置型欧洲化：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经典欧洲化理论基于欧盟正式候选国的转型实践，其核心前提是欧盟提供明确可信的入盟前景以驱动“候选国”持续改革（图 1 与表 1 分别总结了加入欧盟的流程与谈判章节的主题）。一旦这一前提失效，理论的解释力便显著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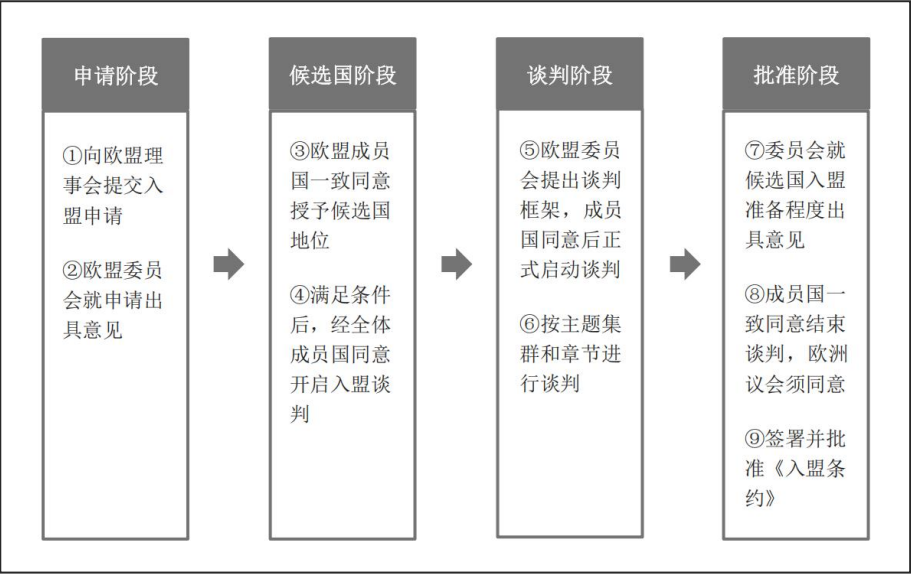


图 1 加入欧盟的流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的入盟进程：分步说明》的内容绘制。^①

外高加索三国恰恰呈现出这种形态：欧盟规范已传导到这些国家，政治上已被绑定，但入盟承诺虚化；经济上已发生转型，资源加速流向欧洲，但三国仍难以有效融入欧盟经济框架，无法充分享受经济欧洲化的红利。这种悬置状态是一种独立的结构类型，在西巴尔干和外高加索地区具有普遍性。本部分将从欧洲化理论演进的视角，界定悬置型欧洲化概念，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ccession process: step by step*, October 2022.

表 1 谈判章节的六大主题集群

基础事项	内部市场	竞争力与包容性增长
经济标准 民主制度运行 公共行政改革 23 司法与基本权利 24 正义、自由与安全 5 公共采购 18 统计 32 财政控制	1 货物自由流动 2 劳工自由流动 3 开业权与服务提供自由 4 资本自由流动 6 公司法 7 知识产权法 8 竞争政策 9 金融服务 28 消费者与健康保护	10 信息社会与媒体 16 税收 17 经济与货币政策 19 社会政策与就业 20 企业与产业政策 25 科学研究 26 教育与文化 29 关税同盟
绿色议程与可持续互联互通	资源、农业与凝聚政策	对外关系
14 交通政策 15 能源 21 泛欧网络 27 环境与气候变化	11 农业与农村发展 12 食品安全、兽医与植物检疫政策 13 渔业 22 区域政策与结构工具协调 33 财政与预算规定	30 对外关系 31 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的入盟进程：分步说明》的内容绘制。^①

（一）欧洲化理论的演进与局限

欧洲化（Europeanization）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成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欧盟深化与扩大并进的背景下。拉达埃利（C. M. Radaelli）的经典定义强调，欧洲化是欧盟决策过程中形成并巩固的正式与非正式规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ccession process: step by step*, October 2022; 欧盟在 2020 年 2 月修订入盟谈判方法后，谈判章节被划分为六个主题集群。每个集群在满足开启基准后整体开启，各章节的单独处理被临时关闭。基础集群最先开启，最后关闭，其改革进展决定整体谈判速度。表格中的项目编号系谈判章节中对应的项目编号。

则、程序、政策范式、行为方式以及共同信念和规范，经过建构、扩散和制度化，被逐步纳入候选国国内话语、认同、政治结构和公共政策逻辑的进程。^①基于这一定义，早期研究聚焦欧盟规范与制度向中东欧候选国传导的过程，认为其规则扩散的有效性取决于“欧盟条件性的可信度”和“候选国采纳规则的国内成本”这两个关键变量。^②这一模式在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实践中较为有效，由此成为欧洲化研究的主流范式。

21 世纪初，随着欧盟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的推出，欧洲化理论随之拓展。拉夫妮克斯（S. Lavenex）将其概括为欧盟“外部治理”，即欧盟内部治理框架向成员国之外的制度化延伸。^③萨斯（G. Sasse）等学者提出，邻国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欧盟本想通过复刻东扩模式，推动其制度规范的外部社会化，却有意虚化了入盟前景，结果让怀有入盟愿望的参与国陷入程序推进与结果缺失的困境。^④作为理论修正，博策尔（T. Börzel）与里瑟（T. Risse）指出，欧盟规则向外扩散并不仅依赖条件性施压，还可能通过说服、学习、模仿等社会化机制发挥作用，但其效果也受到国内精英认同、制度能力和政治机会结构等条件制约。^⑤高里奇（A. Gawrich）等人的比较研究进一步表明，欧盟外部规范的作用效果会因对象国政治结构、国家能力与精英选择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欧洲化本质上是外部推动与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⑥

俄语学界对欧洲化理论的批判性解读为理解外高加索问题提供了完全

① C. M. Radaelli,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2000, Vol.4, No.8.

② F. Schimmelfennig, U. Sedelmeier, “Governance by Conditionality: EU Rule Transfer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4, Vol.11, No.4, pp.661-679.

③ S. Lavenex, “A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Integration beyond Conditional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8, Vol.15, No.6, pp.938-955.

④ G. Sasse,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Conditionality Revisited for the EU’s Eastern Neighbours”,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2, pp.295-316.

⑤ T. A. Börzel, T. Risse, “From Europeanisation to Diffusion: Introduc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2, Vol.35, No.1, pp.1-19.

⑥ A. Gawrich, I. Melnykovska, R. Schweickert, “Neighbourhood Europeanization through ENP: The Case of Ukrain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0, Vol.48, No.5, pp.1209-1235.

不同的视角。卡维什尼科夫（Н. Ю. Кавешников）提出，随着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与乌克兰申请入盟，欧盟扩张政策由规范投射逻辑转为地缘政治工具，未来欧盟与候选国之间的关系可能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分阶段融入”、“部分参与”和“外部差异化一体化”，而非传统意义上单一路径的正式入盟。^①阿尔巴托娃（Н. К. Арбатова）的研究揭示，外高加索地区面临内部族群撕裂、后苏联空间失序与大国博弈介入三个相互缠绕的安全困局，并将这种安全困局归为后苏联的“冻结冲突”（заморож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之列。^②她进一步指出，俄国围绕后苏联空间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区域秩序逻辑之间的系统性冲突，这使得欧盟规范转移的努力在该地区长期面临结构性阻力。^③上述俄罗斯学者的视角，对不对称权力关系运作机制的研究与本文提出的悬置型欧洲化概念有一定的内在契合度，区别在于悬置型欧洲化关注的重点仍在对象国欧洲化进程的模式变化。

既有研究为理解欧洲化的动力机制、传导条件和差异化结果提供了基础，然而，当入盟激励减弱、大国博弈拉扯、国内改革乏力等三重因素共同作用时，欧洲化既无法推动已有入盟意向的国家实现深度制度融合，也不会使这些国家完全疏离欧洲，而是陷入一种长期悬置。这既不同于候选国改革进程中的短期延宕，也不同于单纯的政策执行不足。它表现为对象国持续进入欧盟规则评价体系，却无法获得稳定的制度接纳和发展前景。正是这一理论缺口，构成本文悬置型欧洲化概念的意义所在。

（二）悬置型欧洲化概念的界定

本文所述悬置型欧洲化指的是处于欧盟扩张边界地带的中小国家，明确具有入盟意愿，对欧洲产生功能性依赖，在经历规范传导、制度吸纳与经济政策调适之后，却因多重地缘政治约束与内部结构性制约，长期停滞在政治绑定与制度融合的中间状态。其特征是既无法完成与欧盟的制度整合，又无法脱离欧盟规范体系的政治经济牵引，面临政治绑定性、经济依附性和战略

① Кавешников Н. Ю. Заявка Украины на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ЕС как импульс для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политики расшир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Европа. 2022. №6. С.18-34.

② Арбатова Н. К. Три измерен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заморож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9. Т.63. №5. С.88-100.

③ Арбатова Н. К.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отложен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21. Т.65. №5. С.14-27.

工具性相互叠加的困局。这一概念在“融合成功”与“融合失败”两种状态之间提供一种解释长期未决状态的分析视角，为目前处于欧盟扩张边界地带、入盟前景持续不确定的中小国家提供一个精准的描述性概念。需要说明的是，“悬置”作为核心隐喻，兼具过程与状态两重含义。在初始阶段，悬置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即多重约束导致欧洲化进程悬而不决；但当宏观整合受阻、中观博弈制衡与微观路径依赖三重机制形成正反馈环路后，悬置便从过程固化为一种具有自我再生产能力的恶性循环。悬置与停滞不同，停滞意味着单一线性进程受阻，只要外部激励或国内改革恢复，制度整合仍可继续推进；而悬置则是一种带有稳定性的均衡状态，具有长期性、锁定性与自我再生产能力。

悬置型欧洲化包含三种特征。一是政治绑定性，指相关国家为推进与欧盟的合作，在政治层面按照欧盟的要求，将民主、法治、人权等规范性承诺，嵌入国内立法与制度话语，推进难以轻易逆转的政治转型。然而，受制于欧盟内部的扩张疲劳与成员国政治意愿分化，政治转型却并非入盟乃至获得候选国资格的充分条件。例如，2025年3月亚美尼亚议会通过有关入盟进程的法案，并于4月经总统签署生效，然而，在2025年12月的欧盟-亚美尼亚伙伴关系理事会联合声明中，对此仅表示“予以关注”（took good note），并称其体现了亚美尼亚对共同欧洲价值和深化对欧融合的承诺，却未进一步给出关于入盟前景或开启入盟谈判的明确承诺。^①这正是欧盟政治绑定操作的具体呈现。二是经济依附性，即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嵌入欧洲自由贸易区，贸易结构和经济资源向欧盟单向倾斜，产业政策与国际合作的自主性受到限制，进而形成对欧盟的结构性依附。三是战略工具性，在欧盟、俄罗斯及域外力量多方博弈下，入盟前景的不确定性限制了相关国家在安全保障、能源供给与经贸合作方面的政策自主空间，形成战略选择受限的结构性困境。以上三个维度相互强化：政治绑定产生对欧规范性路径依赖，经济依附抑制政策转圜空间，战略选择压力则进一步锁定小国的结构性国际弱势地位。

① “Joint Press Statement Following the 6th Meeting of the EU-Armenia Partnership Council”,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cember 3, 20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5/12/03/joint-press-statement-following-the-6th-meeting-of-the-eu-armenia-partnership-council>

悬置型欧洲化概念的外延可以通过三组相邻概念辨析予以明确。首先，悬置型欧洲化不同于“浅层欧洲化”（Shallow Europeanization），后者强调相关国家在形式上采纳欧盟制度、法律与治理框架，但国内行为体的认知、能力、合作文化与权力关系未发生实质性变革。^①悬置型欧洲化强调的不是欧洲化停留于表层或深层转型不足，而是强调这种有限接近被制度化地维持在一种任意延宕的状态之中。其次，它区别于“差异化一体化”，后者主要讨论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化及其整合，具体可划分为时间维度上的“多速欧洲”，模式维度上的“可变几何欧洲”^②以及事项维度上的“菜单式欧洲”。^③悬置型欧洲化描述的则是相关国家的入盟前景或候选国身份尚未确定，处于欧盟域外合作方位置，却以成员身份深度介入欧洲一体化。再次，需要重点说明悬置型欧洲化与“无成员资格的趋同”（convergence without membership）^④的关系。“无成员资格的趋同”主要解释欧盟规则如何在缺乏成员资格承诺的条件下向邻国扩散，探讨趋同能否发生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发生。而悬置型欧洲化则解释，当趋同已经发生，但成员国资格、经济承接和战略自主均无法同步形成时，这种悬置状态为何会长期稳定。其理论增量在于把规范趋同、经济依附和地缘工具化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解释外高加索三国为何既无法完成欧洲化目标，也难以主动退出的困局。

（三）分析框架：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

外高加索国家的悬置型欧洲化并非只是欧盟东扩的结果，而是后苏联空间秩序变动、大国竞争和国内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宏观整合失序为三国转向欧盟提供了现实动因，中观多强博弈使欧洲化进程难以转化为制度融合，微观路径依赖则塑造了三国不同的悬置形态。基于此，本文从地缘政治经济

① M. Czernielewska, C. J. Paraskevopoulos, J. Szlachta, “The Regionalization Process in Poland: An Example of ‘Shallow’ Europeanization?”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2004, Vol.14, No.3, pp.461-495.

② 可变几何欧洲（Variable Geometry Europe）指的是欧盟差异化整合模式，即允许成员国按意愿与能力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深度、速度推进一体化。

③ A. C-G. Stubb, “A Categorization of Differentiate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996, Vol.34, No.2, pp.283-295.

④ See J. Langbein, K. Wolczuk, “Convergence without membership?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neighbourhood: evidence from Ukrain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2, Vol.19, No.6, pp.863-881.

学视角出发，将解释逻辑扩展为“权力结构-制度选择-发展路径”的复合因果关系。本文将“政治绑定性-经济依附性-战略工具性”视为悬置型欧洲化的结果属性，将“宏观整合失序-中观多强博弈-微观路径依赖”视为解释其生成与稳定化的层次变量。结果属性受多层变量共同塑造，而层次变量也会同时作用于多个属性维度（见表2）。

表2 悬置型欧洲化的属性与解释矩阵

层次变量与结果属性	政治绑定性	经济依附性	战略工具性
宏观整合失序	入盟前景不确定，政治承诺先于制度接纳	旧市场脱嵌快，新市场对接难，形成经济空档	制度真空为外部力量竞争性介入提供空间
中观多强博弈	欧盟规范约束强、成员资格激励弱，承诺难以兑现	俄罗斯、欧盟、土耳其等力量分割市场、能源与通道选择	悬置状态被外部力量和本国精英转化为谈判筹码
微观路径依赖	治理能力不足与精英意愿有限，导致选择性合规	产业基础薄弱、资源结构单一，限制对欧价值链嵌入	认同边界和资源禀赋差异塑造对冲、拖延和有限骑墙策略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而言，宏观整合失序可以解释悬置状态的结构背景。后苏联空间经济碎片化、欧亚经济联盟吸纳能力有限以及欧盟自由贸易区门槛较高，使外高加索国家既难以留在俄罗斯的经济整合框架，也难以顺利进入欧盟的新制度空间。中观多强博弈能够解释悬置状态的外部锁定。欧盟、俄罗斯、土耳其、美国等力量在安全、能源、交通和规范议题上的交叉介入，使任何单向制度靠拢都要付出高昂的外部成本。微观路径依赖可以解释悬置状态的国内差异。精英结构、民族认同、制度能力和资源禀赋的差别，决定三国在相似结构压力下形成被动悬置、策略性悬置和主动悬置的不同形态。上述三层变量通过反馈环路发挥作用：宏观整合失序放大外部竞争，多强博弈强化国内

精英的对冲偏好，微观路径依赖又反向削弱深层制度改革能力，最终使政治绑定性、经济依附性和战略工具性形成难以破解的逻辑闭环。

二、悬置困局：外高加索三国的欧洲化路径

悬置型欧洲化在外高加索三国中具有共同性，但并不表现为同一种路径。为增强可比性，本文统一从政治绑定性、经济依附性和战略工具性三个维度展开案例分析。政治绑定性说明对象国被纳入欧盟规范和身份框架。经济依附性说明它们难以在制度上对欧脱嵌，又无法完成对欧融入。战略工具性则揭示悬置状态如何被外部力量和国内精英转化为博弈资源。概括而言，亚美尼亚呈现安全危机驱动下的被动悬置，格鲁吉亚呈现国内政治极化中的策略性悬置，阿塞拜疆则呈现能源杠杆支撑下的主动悬置。三者共同勾勒出外高加索国家“融而未化、脱而不离”的共同困境。

（一）亚美尼亚：安全依附与被动悬置

外高加索三国中转向西方节奏最为急促的是亚美尼亚，直接触发原因是：2020 年亚美尼亚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惨败，2023 年 9 月阿塞拜疆对纳卡发起军事行动后，亚美尼亚裔居民大规模撤离。两次事件从根本上瓦解了亚美尼亚对俄罗斯安全保障的信任。2025 年，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律。^①自此，“入欧”在立法层面被确立为亚美尼亚国家战略方向。然而，入盟前景的不确定性使亚美尼亚随即进入悬置状态。

1. 政治绑定性：安全危机推动的单向锁定。2025 年 1 月，亚美尼亚政府批准并向议会提交《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共和国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该法案源于公民倡议，在收集超过 6 万名公民签名后进入立法程序。2025 年 3 月 26 日，亚美尼亚国民议会二读以 64 票赞成、7 票反对通过该法案。^②2025

① See *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Law on Launching the Process of Acce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to the European Union*, March 26, 2025,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elegations/en/joint-statement-on-the-adoption-by-the-n/product-details/20250326DPU39920>

② See “Armenia’s parliament approves bill on country’s EU accession”, *Georgia Today*, March 26, 2025, <https://georgiatoday.ge/armenias-parliament-approves-bill-on-countrys-eu-accession>

年4月4日，经总统瓦哈格恩·哈恰图良签署，该法案正式生效。^①这项法案的生效并不意味着亚美尼亚正式申请入盟，只是明确了向欧盟靠拢的法律意向。欧盟对亚美尼亚入盟的决心“表示欢迎”，但也强调，“加入欧盟是一个复杂、长期且基于实绩的过程”^②。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在欧洲议会表示：“我们的任务是在欧洲伙伴的支持下继续推进改革，以真正达到入盟标准。”^③

在双边关系层面，欧盟与亚美尼亚关系开始由一般伙伴关系转向更密集的政治协调。2025年12月通过的《欧盟-亚美尼亚伙伴关系战略议程》取代2017年确立的伙伴关系优先事项，成为双方合作的新框架。议程重点推进安全与防务合作、部门合作和关键领域规则对接，并将签证自由化、危机管理、混合威胁应对、网络韧性和地区和平等议题纳入合作范围。这种政治靠拢在2026年5月4日首届欧盟-亚美尼亚峰会中进一步制度化。欧盟官方将该峰会称为双方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会议重点讨论深化双边关系，议题涵盖经济、能源、交通、数字合作、人员往来以及外高加索和平、安全与互联互通等方面。这表明亚美尼亚与欧盟之间逐步形成覆盖改革、治理、安全、人员流动和地区秩序的综合性政治议程。这些安排将亚美尼亚的国内改革、经济发展与政策制定完全纳入欧盟评价体系，使其在尚未获得候选国资格的情况下先行承担制度趋同的压力。由此来看，亚美尼亚的欧洲化呈现出典型的悬置特征，即政治上不断向欧盟靠近，制度上持续接受欧盟标准和评估，但身份上仍未获得稳定的制度归属。

2. 经济依附性：脱嵌旧体系却未能嵌入新体系。在经济层面，亚美尼亚试图在对接欧盟经济体系的同时，降低对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依赖，

① See “Armenia adopts law to launch EU accession process”, *Reuters*, April 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armenia-adopts-law-launch-eu-accession-process-2025-04-04>

② “Joint statement on the adoption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Armenia of the law on the initiation of the process of accession of Armenia to the EU”, *European Parliament*, March 26 2025,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elegations/en/joint-statement-on-the-adoption-by-the-n/product-details/20250326DPU39920>

③ “Armenia’s Prime Minister Nikol Pashinyan addresses MEPs on peace efforts with Azerbaijan”, *European Parliament*, March 11, 2026,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60306IPR37529/prime-minister-nikol-pashinyan-addresses-meps-on-peace-efforts-with-azerbaijan>

但短期内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转型。2025 年的《欧盟-亚美尼亚伙伴关系战略议程》将安全与防务合作、部门合作和关键领域规则对接、“全球门户”框架下的投资合作列为重点；欧盟还推出 2024—2027 年总额 2.7 亿欧元的“韧性增长计划”，其中包括 2 亿欧元赠款援助和 7000 万欧元投资赠款，并试图撬动“全球门户”框架下最高约 25 亿欧元的相关投资。^①这些合作共同推动了亚美尼亚在互联互通、营商环境和社会韧性等方面向欧盟靠拢。亚美尼亚对俄贸易规模持续收缩，2025 年降至 76.6 亿美元，同比下降 38.3%。虽然俄罗斯仍是亚美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两国经济绑定强度已显著弱化。^②

然而，疏离欧亚经济联盟并未换来欧盟价值链的实质性嵌入，亚美尼亚经济增长只得转而依附外部环境的偶发红利。2024 年和 2025 年，亚美尼亚经济增速分别达到 5.9% 和 7.2%，但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俄乌冲突后俄罗斯资本、人员与转口贸易形成的偶发红利，随着西方监管的收紧与俄罗斯政策的调整，通过亚美尼亚的转口贸易规模断崖式缩减。^③2025 年，欧盟仅占亚美尼亚货物贸易总额的 11.3%，出口贸易总额的 7.9%。亚美尼亚尚未形成能够稳定嵌入欧盟市场和供应链的产业支撑，^④其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占比有限。^⑤因此，亚美尼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体系提供市场、能源、资金、规则和通道条件。亚美尼亚经济的依附性过去主要指向俄罗斯

① “European Union and Armenia Adopt New Strategic Agenda to Deepen Partnership”, December 3, 2025,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news/european-union-and-armenia-adopt-new-strategic-agenda-deepen-partnership-2025-12-02_en; “Armenia”,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nlargement and Eastern Neighbourhood*,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countries/armenia_en; “Joint Press Release: EU and Armenia Reaffirm and Advance Their Partnership During a Leaders’ Meeting”, *European Commission*, July 14, 2025,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news/joint-press-release-eu-and-armenia-reaffirm-and-advance-their-partnership-during-leaders-meeting-2025-07-14_en

② “2025 年亚美尼亚对外贸易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6 年 2 月 12 日，https://am.mofcom.gov.cn/jmxw/art/2026/art_8bc8a33fe9f04fbf9a58b8a149568f19.html

③ “Armenia’s GDP grows 7.2% in 2025, inflation accelerates”, *Interfax*, February 20, 2026,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116268>; “Armenia’s foreign trade drops 29% in 2025”, *Armenpress*, February 11, 2026, <https://armenpress.am/en/article/1241851>

④ “EU Trade Relations with Armenia”,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armenia_en

⑤ Se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Structure of Value Added”, *World Bank Group*, 2024, <https://wdi.worldbank.org/table/4.2>

和欧亚经济联盟，现在欧盟承诺通过资金、规则和互联互通项目提供新的发展牵引，但尚不足以替代旧有依附，由此，亚美尼亚经济可能陷入一种双重依附格局。

3. 战略工具性：入欧姿态被嵌入欧俄竞争。在欧盟与俄罗斯的战略竞争格局中，亚美尼亚的入欧进程更多服务于欧盟外高加索战略的外部目标，亚美尼亚入盟前景只是欧盟的政策工具而已。欧盟则抓住亚美尼亚急于脱离后苏联空间的机会，将接纳亚美尼亚的姿态嵌入自己制衡俄罗斯的布局之中。亚美尼亚的回报是以“断腕”姿态向欧盟示好，不仅暂停参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活动，还要求俄罗斯撤回自亚美尼亚独立以来就驻守其国际机场的俄罗斯边防警察。^①对欧盟来说，亚美尼亚的价值主要在于消除俄罗斯对外高加索影响力的战略支点。因此，欧盟为亚美尼亚提供的替代性安全安排明显具有工具化特征，优先服务于欧盟提高规范性影响力的目标。2023 年 1 月，欧盟决定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边境部署负责观察并报告边境安全局势的欧盟驻亚美尼亚特派团，声称旨在促进边境地区安全稳定。^②然而，2023 年 9 月，在阿塞拜疆对纳卡发起军事行动并完成对纳卡实际控制的过程中，当地约 10 万亚美尼亚裔居民被迫大规模撤离，欧盟特派团的选择却是袖手旁观。因此，这种“安全援助”只是以“规范性在场”向外界展示欧盟对外高加索的影响力，而非有价值的安全承诺。

（二）格鲁吉亚：双向投机与策略悬置

格鲁吉亚的欧洲化进程在外高加索三国中启动最早，其社会与国家已形成对欧盟规范的强政治绑定，在经济上陷入对欧盟与俄罗斯的双重依附结构，而执政精英对这种中间状态的策略性利用甚至有意维持，使悬置型欧洲化不再是简单的被动困境，而成为牟取政治利益的主动选择。与亚美尼亚不

^① See “Armenia freezes participation in Russia-led security bloc – Prime Minister”, *Reuters*, February 23,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armenia-freezes-participation-russia-led-security-bloc-prime-minister-2024-02-23/>; “Armenia orders Russian border guards out of Yerevan Airport”, *OC Media*, March 7, 2024, <https://oc-media.org/armenia-orders-russian-border-guards-out-of-yerevan-airport/>

^② “Armenia: EU launches a civilian mission to contribute to stability in border areas”,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20,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2/20/armenia-eu-launches-a-civilian-mission-to-contribute-to-stability-in-border-areas>

同，格鲁吉亚的悬置并非主要由外部安全危机导致，而是由亲欧社会基础、执政精英利益和欧俄双重牵制共同塑造。

1. 政治绑定性：亲欧社会共识与执政精英回摆。格鲁吉亚对欧政治绑定的根源是稳定而深厚的亲欧社会基础。受 2008 年俄格战争和南奥塞梯、阿布哈兹问题的影响，加入欧盟和北约在格鲁吉亚国内普遍被视为保障国家安全、明确国家定位的重要选择。2022 年 3 月，格鲁吉亚正式提交入盟申请，2022 年 12 月获得了候选国地位，但与此同时附加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9 项改革措施，涉及公民社会空间、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去寡头化和民主治理等。^①近年民调显示，格鲁吉亚公众始终对欧盟保持强烈好感，2024 年有 81% 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欧盟，2025 年有 74% 的受访者表示若举行公投将支持加入欧盟。^②但这些改革要求与亲欧民意并不能阻止格鲁吉亚欧洲化进程陷入悬置状态。

2024 年 5 月，格鲁吉亚“亲俄”的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推动通过《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要求接受境外资金超过 20% 的组织登记为“外国影响代理人”，承担严格的披露义务。反对派和欧美方面批评其带有俄罗斯威权色彩，^③欧盟强调该法违背格鲁吉亚候选国改革方向，双方关系走向低谷。欧盟随后冻结了欧洲和平基金框架下原定划拨给格鲁吉亚国防部的 3000 万欧元援助，取消了原本用于国家预算支持以及技术援助的 1.21 亿欧元，这部分资金或将转用于民间社会与人权等领域。^④在 2024 年 10 月的议

① “Georgia”,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countries/georgia_en

② See CRRC Georgia, *Unmasking Vulnerability: Understanding Disinformation in Samtskhe-Javakheti*, March 2024; “More Georgians than ever trust the EU, according to latest opinion poll”, *EU Neighbours East*, November 11, 2024, <https://euneighbourseast.eu/news/opinion-polls/more-georgians-than-ever-trust-the-eu-according-to-latest-opinion-poll>; “Most Georgians support EU membership, according to latest opinion poll”, *EU Neighbours East*, September 2, 2025, <https://euneighbourseast.eu/news/opinion-polls/most-georgians-support-eu-membership-according-to-latest-opinion-poll>

③ F. Light, “Georgian parliament passes ‘foreign agent’ bill, prompting US anger, new protests”, *Reuters*, May 15,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georgian-lawmakers-brawl-parliament-set-pass-foreign-agent-bill-2024-05-14>

④ See “EU freezes 30 million euros in aid for Georgian army”, *Reuters*, July 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eu-freezes-30-million-euros-aid-georgian-army-2024-07-09>; See “Financial Assistance Lost as a Result of Democratic Backsliding”, *EU for Georgia*, 2024, <https://eu4georgia.eu/financial-assistance-lost-as-a-result-of-democratic-backsliding>

会选举中，“格鲁吉亚梦想”党以 53.92% 的得票率获胜，但反对派和总统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欧盟则要求调查买票、恐吓、行政资源滥用及其他程序性违规问题。^①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及多地随后爆发了大规模亲欧街头抗议，民众的诉求由废除《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逐渐扩展到要求重新进行选举及回归欧洲化道路上。执政党采取强硬的回应姿态，最终形成执政精英与国内亲欧势力及欧盟立场全面对峙的政治僵局。格鲁吉亚的欧洲化进程面临多方面的掣肘，社会层面持续要求欧洲化，执政精英层面则选择性利用欧洲化话语，抵制可能触动权力基础的深化改革，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悬置型欧洲化危机。

2. 经济依附性：对欧制度性嵌入与对俄功能性依赖并存。在经济维度，格鲁吉亚同样呈现出对欧盟与俄罗斯的双重依附结构，这是其悬置型欧洲化得以长期维持的物质基础。2014 年，格鲁吉亚与欧盟签署的《深度全面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推动其对外贸易逐步走向多元化，欧盟成为格鲁吉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格鲁吉亚在贸易规则、标准体系、市场准入等方面形成了制度性对欧依附。

但与此同时，格鲁吉亚并未真正脱离俄罗斯主导的经济空间，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反而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对俄罗斯的功能性依赖，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和再出口联系明显增强。“透明国际格鲁吉亚”援引官方统计指出，2023 年格鲁吉亚通过侨汇、旅游和商品出口等渠道从俄罗斯获得约 31 亿美元收入，规模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0.3%。与此同时，汽车再出口也格外突出，2023 年和 2024 年汽车连续成为格鲁吉亚第一大出口商品，2024 年出口额达 24.27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37.0%，被外界怀疑经第三国转运至俄罗斯。^②此外，2023 年赴格鲁吉亚的俄罗斯访客约为 1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从俄罗斯汇往格鲁吉亚的资金高达 15 亿美元，比俄乌冲突爆发前的 2021 年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8 November 2024 on Georgia's worsening democratic crisis and the recent alleged electoral irregularities*, [2024/2933(RSP)] https://www.europa.eu/doceo/document/TA-10-2024-0054_EN.html

^② See “Georgia’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Russia: Summary of 202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Georgia*, February 16, 2024, <https://transparency.ge/en/blog/georgias-economic-dependence-russia-summary-2023>; “Georgia and Kyrgyzstan suspected of being auto suppliers for Russia, trade data indicates”, *Eurasianet*, January 31, 2025, <https://eurasianet.org/georgia-and-kyrgyzstan-suspected-of-being-auto-suppliers-for-russia-trade-data-indicates>

增长了 3.7 倍。^①总体而言，格鲁吉亚的产业结构仍基本停留在苏联时期的形态，以葡萄酒、农产品、铜矿石等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在建立可深度嵌入欧盟供应链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进展缓慢。因此，尽管格鲁吉亚需要欧盟市场与制度身份来维持国家发展叙事，却无法与俄罗斯经济脱钩，最终陷入经济上既无法完全融入欧洲，也无法完全脱离俄罗斯的悬置状态。

3. 战略工具性：执政精英对悬置状态的策略性利用。在战略层面，格鲁吉亚执政精英主动将悬置工具化，通过在欧俄之间有限度的“骑墙”来谋求双重收益。与亚美尼亚被动陷入悬置状态不同，对“格鲁吉亚梦想”党而言，若彻底倒向欧盟，落实司法独立与去寡头化改革，将侵蚀自身权力基础；但若公开靠拢俄罗斯，则会违背国内压倒性的亲欧民意，丧失执政合法性并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对精英而言，合理的选择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有限“骑墙”策略：对外持续宣示亲欧立场，对内则以“避免沦为下一个乌克兰”叙事，抵制欧盟对格鲁吉亚政治改革的压力，同时维持对俄过境贸易、旅游与侨汇收益，由此在欧俄之间两头吸纳红利。

然而，这种平衡策略当然也蕴含着双重风险。对欧盟而言，格鲁吉亚拖延改革导致自己的入盟进程冻结、援助被暂停，入盟前景更加渺茫。同时，格鲁吉亚政府仅将对俄关系视为利益工具，自然也无从获得俄方长期战略投入。在格鲁吉亚国内，政治上的摇摆性加剧了民众与精英、亲欧与保守力量的分裂，使国家长期陷入合法性损耗与政治内耗。正如米切尔（L. Mitchell）对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研究所表明，地缘政治因素在格鲁吉亚并非单纯作为外部约束发挥作用，而是与国内政治精英的权力竞争、反腐动员和合法性重塑相互嵌套。^②由于格鲁吉亚政治长期深陷严重极化，国家发展方向、制度改革和对外政策往往被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零和竞争所裹挟，^③其欧

① See “Georgia’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Russia: Summary of 2023”,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Georgia*, February 16, 2024, <https://eurasianet.org/georgia-and-kyrgyzstan-suspected-of-being-auto-suppliers-for-russia-trade-data-indicates>.

② See L. Mitchell, *The Color Revolu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p.45-90

③ See Thomas de Waal, “Divided Georgia: A Hostage to Polariz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ecember 8, 2021.

洲化进程在不同政治周期中反复出现推进与回摆的波动特征。因此，格鲁吉亚入欧进程的悬置既是地区地缘政治约束使然，也与国内执政精英的策略性选择密切相关。

（三）阿塞拜疆：能源自主与主动悬置

与亚美尼亚被动卷入悬置、格鲁吉亚主动操控悬置不同，阿塞拜疆凭借能源硬实力走出了一条“主动悬置”的特殊路径。

1. 政治绑定性：从价值趋同到主动解绑。1991 年阿塞拜疆独立后，“向西转”既是该国独立于俄罗斯的政治需要，也是其争取欧洲市场与技术支持的经济路径。在海达尔·阿利耶夫执政期间，阿塞拜疆积极推进与欧美的制度性联系。1994 年签署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文件，1996 年与欧盟签署至今仍为双边关系法律基础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2001 年加入欧洲委员会。^①

2003 年伊尔哈姆·阿利耶夫继任后，阿塞拜疆的对欧合作却逐渐“菜单化”。一方面，阿塞拜疆与欧盟在经济与能源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2006 年签署《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备忘录》，2009 年被欧盟纳入东部伙伴关系框架，2014 年双方签证便利化协定生效，2018 年完成伙伴关系优先事项谈判。另一方面，在民主与人权等价值观议题上，阿塞拜疆采取靠拢与抵制并行的策略，通过举办欧洲歌唱大赛、首届欧洲运动会等赛事塑造亲欧形象，同时以“鱼子酱外交”游说西方政客，为自己的“民主进步”背书。^②双方由此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妥协。阿塞拜疆精英层表面认可欧盟价值观话语，在技术层面积极靠拢，欧盟则出于能源安全考量，对阿塞拜疆国内治理中的“威权”倾向保持较高容忍度乃至共谋性的沉默。

然而，这种平衡自 2023 年纳卡冲突后趋于瓦解。根据阿利耶夫的说法，

^① 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并非欧盟机构，而是 1949 年成立的泛欧洲国际组织，宗旨是维护人权、民主和法治，核心制度文件为《欧洲人权公约》，通过欧洲人权法院对成员国进行司法监督。阿塞拜疆于 2001 年 1 月 25 日加入欧洲委员会，2002 年 4 月 15 日批准《欧洲人权公约》。See “Azerbaijan”, *Council of Europe*, <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azerbaijan>;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zerbaijan”, January 2026,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d/echr/CP_Azerbaijan_ENG

^② “Caviar Diplomacy: How Azerbaijan Silenced the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 May 24, 2012, <https://esiweb.org/publications/caviar-diplomacy-how-azerbaijan-silenced-council-europe>

2021 年至 2026 年，欧洲议会通过 14 项涉及阿塞拜疆的批评性决议。^①2026 年 4 月 30 日，欧洲议会以跨党派多数通过“支持亚美尼亚民主韧性”决议，涉及支持亚美尼亚族居民回归纳卡等条款。2025 年 5 月 1 日，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宣布与欧洲议会中止一切合作。^②这一姿态虽在很大程度上是向欧盟施压来换取政治转圜的策略手段，但也清晰表明，阿塞拜疆与欧盟的政治绑定始终是有条件的。一旦价值观话语触及领土主权与政权合法性等核心利益，阿塞拜疆便可能选择主动解绑。

2. 经济依附性：能源杠杆与市场锁定并存。阿塞拜疆对欧政治议价能力的根基在于油气资源。1994 年，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牵头的国际财团签署开采阿泽里-奇拉格-深水居内什利油田群的协议，^③标志着该国全面融入西方能源市场。2006 年，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的投运，使里海原油绕过俄罗斯直达地中海。2020 年年底，起自阿塞拜疆、止于意大利、全长约 3200 公里的南部天然气走廊全线贯通，使阿塞拜疆天然气首次直达欧盟国家。^④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急寻替代气源，阿塞拜疆战略价值骤升。2022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亲赴巴库，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共同签署《能源领域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 2027 年前将南部天然气走廊输气量翻倍至年均 200 亿立方米。至 2025 年，阿塞拜疆天

① “Azerbaijan’s President Accuses European Parliament of Sabotaging Peace Process with Armenia”, *Anadolu Agency*, May 4, 2026, <https://www.aa.com.tr/en/eurasia/azerbaijan-s-president-accuses-european-parliament-of-sabotaging-peace-process-with-armenia/3926391>

② “Joint Motion for A Resolution on Supporting Democratic Resilience in Armenia”, *European Parliament*, April 30, 2026,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RC-10-2026-0195_EN.html; “Azerbaijan’s Parliament Suspends Ties with European Parliament over ‘Anti-Azerbaijani Activities’” *Xinhua Net*, May 1, 2026, <https://english.news.cn/20260501/e60e611da03a4f7491d259544d6103d5/c.html>

③ 阿泽里-奇拉格-深水居内什利油田群（Azeri-Chirag-Deepwater Gunashli）位于里海阿塞拜疆海域。1994 年 9 月 20 日，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与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在内的外国石油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签署了有关该油田群的开发和产量分成协议。该协议因规模巨大、参与方众多，标志着独立后的阿塞拜疆正式向西方资本开放里海油气资源，被称为“世纪合同”。See “History of ACG: The Contract of the Century”, *BP Azerbaijan*, https://www.bp.com/en_az/azerbaijan/home/who-we-are/operations/projects/acg2/History-of-ACG.html

④ “Diversification of Gas Supply Sources and Routes: The Southern Gas Corridor”,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energy-security/diversification-gas-supply-sources-and-routes_en

然气出口约 252 亿立方米，其中近一半输往欧洲。^①

然而，阿塞拜疆与欧盟博弈的底气面临双重困境。一是高度依赖能源合作，油气占出口约 90%，占财政收入一半以上。^②二是主力油田进入递减周期，阿泽里-奇拉格-深水居内什利油田群在 2010 年前后达到产量高峰，随后持续下行。^③资源递减使绿色转型成为理性选择，如果阿塞拜疆选择绿色转向，那么在技术标准、碳交易体系与氢能出口通道等方面深度嵌入欧盟制度框架，可能造成该国对欧盟的进一步经济依附。因此，短期内油气供给赋予阿塞拜疆对欧谈判优势；中长期看，经济转型需求则可能使其对欧盟的技术与市场依附持续加深。

3. 战略工具性：土耳其支撑、突厥替代与主动悬置的边界。阿塞拜疆同时被多方视为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杠杆，而正是这些工具化需求之间的竞争与制衡，赋予该国超出其国家体量的能动空间。阿塞拜疆对欧盟最大的工具性意义是“去俄罗斯化”战略在能源供应、欧亚物流与外高加索地缘平衡三个维度上的交汇点。南部天然气走廊是里海方向唯一绕过俄罗斯的对欧管道气体体系，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是绕过俄罗斯连接中亚的物流通道，而阿塞拜疆本身则是欧盟制衡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影响力的重要锚点。三者共同指向欧盟降低对俄依赖的战略逻辑。此外，土耳其将阿塞拜疆视为“突厥世界”整合与区域力量的前沿。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南部天然气走廊、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等基础设施，均以土耳其为过境国。2020 年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的军事支持既是同盟义务的兑现，也是其向外高加索投射影响力的战略行动。同时，以色列也把阿塞拜疆作为遏制伊朗的北部屏障，两国维持深度的“安全伙伴关系”。2016—2020 年，阿塞拜疆约 70% 的武器

① “EU and Azerbaijan Enhance Bilateral Relations, Including Energy Cooper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July 18,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4550; “Last Year, 27.7 million Tons of Oil and 51.5 bcm of Natural Gas Were Produced,” *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January 12, 2026, <https://minenergy.gov.az/en/xeberler-arxivi/00710>

② The World Bank, *Azerbaijan: Systematic Country Diagnostic Update*, 2022,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79421656601259317/pdf/Azerbaijan-Systematic-Country-Diagnostic-Update.pdf>

③ “BP Plans to Explore for New Oil in Azeri Caspian Sea”, *Reuters*, March 13,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bp-plans-explore-new-oil-azeri-caspian-sea-2025-03-13>

采购来自以色列。^①同时，俄罗斯仍将阿塞拜疆视为传统势力范围，亦需与之保持良性关系，防止外高加索地区完全倒向西方。

不难看出，阿塞拜疆的地缘能动性本质上是一种“被需要的自主”，它并非来自巴库方面的外交技巧，而是取决于多个大国工具化需求之间形成的动态均势。这种多重工具化的交叉与制衡，使阿塞拜疆得以在欧盟的价值观压力面前拥有以退为进的筹码。欧洲议会可以通过措辞尖锐的决议，但欧盟委员会无法承受将阿塞拜疆推向其他大国怀抱的代价。

（四）共同的结构约束与差异化的能动路径

外高加索三国的欧洲化实践共同呈现出悬置态势。三国均未实现与欧盟的制度化融合，也未彻底脱离欧洲化进程，而是长期处于部分嵌入、部分疏离的中间状态，构成典型的悬置型欧洲化状态（见表 3）。

表 3 三国悬置型欧洲化路径的比较

国 家	政治绑定性	经济依附性	战略工具性	悬置类型
亚美尼亚	安全危机后急速西转，先行接受欧盟规范与改革程序	对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脱嵌加速，但对欧盟的产业嵌入不足	入盟姿态被欧盟制衡俄罗斯战略和地区战略利用	被动悬置
格鲁吉亚	亲欧社会共识强，执政精英选择性回避改革	对欧制度嵌入与对俄贸易、旅游、侨汇依赖并存	悬置状态被执政精英转化为双向博弈资源	策略性悬置
阿塞拜疆	不寻求入盟，但需要欧盟合法性与规范场	能源出口提升议价能力，同时形成市场与通道依赖	借助土耳其和突厥国家组织对冲欧盟与俄罗斯的压力	主动悬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P. D. Wezeman, “Arms Transfers to Conflict Zones: The Case of Nagorno-Karabakh”,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30, 2021,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under/2021/arms-transfers-conflict-zones-case-nagorno-karabakh>

在此共性背景下，三国基于国内政治逻辑、资源禀赋与安全处境选择了差异化的能动策略。亚美尼亚在安全危机驱动下急速西转，但其改革意愿超出了制度与安全的承载力，因而陷入急速西转下的被动悬置。格鲁吉亚借助多元外部联系开展双向博弈，将维持与欧盟的悬置关系作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工具，呈现双向投机的策略性悬置。阿塞拜疆则凭借能源禀赋和地缘优势保持对欧盟的政治独立，以经济功能性嵌入替代制度合规，进而在欧盟、俄罗斯、土耳其之间推行均衡外交，但其主动构建的中立格局仍受到大国牵制与市场依赖的影响，最终呈现能源杠杆下从主动悬置向被动锁定转化的特征。

三、悬置风险的结构成因

悬置型欧洲化已经成为外高加索三国在外部结构约束与国家能动选择共同塑造下地区性常态，但其背后的生成逻辑仍待解析。第一，哪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三国欧洲化进程，并最终催生悬置困局？第二，为什么悬置状态具有稳定性？为避免将概念属性与解释层次混同，本文将宏观整合失序、中观多强博弈和微观路径依赖作为三组关键变量，集中阐释三层因果关系的互动叠加机制，由此解析边缘国家欧洲化的结构性困境。

（一）宏观整合失序：后苏联空间解体与新机制缺位

1. 旧整合框架的碎片化。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三国原本依托的统一经济体系瓦解。2011 年《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曾被视为区域经济联动的重要突破，但协议中大量例外条款与长期存在的非关税壁垒削弱了其制度执行力，使得以独联体为载体的后苏联经济整合未能充分发挥功能性区域经济合作作用

为挽救后苏联空间整合的颓势，2015 年俄罗斯主导成立欧亚经济联盟，在货物自由流动、关税统一等基础领域取得一些进展，成为后苏联空间最具潜力的整合平台。但这一机制并未实现地区全覆盖。格鲁吉亚因 2008 年俄格冲突拒绝参与任何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机制。阿塞拜疆秉持能源自主与多边平衡外交，亦不寻求加入关税同盟，仅与俄罗斯维持双边经贸关系。亚美尼亚作为外高加索唯一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受制于关税同盟的排他性规

则，无法同时与欧盟签署《深度全面自由贸易区协定》，只得转而与欧盟签署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全面强化伙伴关系协定》（CEPA）。^①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2023 年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货物贸易总额下降 10.7%；但 2022 年联盟内部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15.9%，2023 年增长 6.7%。^②尽管内部贸易结算的卢布化程度有所提高，但这只是成员国对俄罗斯金融体系的被动依附，而非经济的深化融合。

2. 俄乌冲突加速脱嵌但无法完成对接。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客观上成为外高加索国家对俄经济脱嵌的“加速器”。后苏联经济空间转型的突出特征是旧有经济联系的断裂快于新型合作关系的形成，从而使许多转轨国家长期处于脆弱和不稳定状态。与此同时，加入欧盟《深度全面自由贸易区协定》并非易事。该框架不仅要求伙伴国推进贸易自由化，更要求其在技术标准、竞争规则、海关监管、公共采购等高密度规范领域大规模采纳欧盟规则；而作为其所嵌入的《联合国协定》的一部分，这一路径通常还伴随着民主、法治与人权等政治条件性要求。^③对制度与行政资源有限的外高加索小国而言，这构成了高昂的转制成本。

此外，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虽为整合真空提供了局部替代，但其规模与深度均有限。2022 年之后，欧亚大陆北方陆路通道受阻，该通道货运量快速上升，2023 年达到 270 万吨以上，较 2022 年增长 86%，^④但其贸易核心以过境物流为主，并未带动三国产业升级，更无法填补后苏联经济框架解体的制度空缺。互联互通项目能够缓解运输瓶颈，却不能自动转化为区域经济整合。通道价值若缺乏产业配套、标准协调或金融支撑，仍可能停留在过境收益层面。

① “Comprehensive and Enhanced Partnership Agreement with Armenia”, *European Parliament Think Tank*, June 27, 2018,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t/EPRS_ATA%282018%29623565

②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2024. С.334-336. https://eec.eaeunion.org/upload/files/dep_stat/econstat/statpub/Stat_Yearbook_2024.pdf

③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Associ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EU and Moldova, Georgia and Ukraine: European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Brussels: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④ “Appendix 1: 2023 Updates on Routes”, *CAREC Corrid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https://cpmm.carecprogram.org/2023-report/appendix-1-2023-updates-on-routes/>

由此可见，对外高加索国家而言，宏观经济层面的核心矛盾并非单纯的“向东”或“向西”选择，而是旧空间脱嵌与新空间对接之间的时间差、能力差和制度差。后苏联经济空间碎片化与欧盟规范吸纳的制约，共同造就了“脱嵌易、嵌入难”的困境。这种困境为俄罗斯与欧盟等外部力量的竞争性介入提供了机会窗口，无需付出高成本即可影响三国经济整合选择，这就进一步固化了外高加索三国欧洲化悬置的基础。

（二）中观博弈制衡：大国竞争的多向牵制

1. 欧盟：规范扩张与激励缺位的结构性失衡。欧盟对外高加索战略的基本政策逻辑是依靠规范传导、条件激励和制度趋同，推动对象国进行政治、法治与市场改革，最终目标是强化地区性亲欧疏俄的格局。因此，至少在短期内，欧盟既希望“拉住”外高加索国家，又不愿将这些国家“拉入”欧盟体系。

自 2004 年邻国政策实施以来，欧盟始终将其界定为不提供成员资格前景的周边政策框架。^①尽管俄乌冲突后欧盟在外高加索方向做出一定政治姿态，但给予格鲁吉亚候选国地位带有明显的危机驱动和强条件性，不足以被视为入盟条件整体松动的信号。欧盟内部长期存在的“扩张疲劳症”并未改变。《2023 年欧盟扩大政策沟通文件》重申：“入盟现在并将继续是一个以实绩为基础的进程，完全取决于每个扩大伙伴所取得的客观进展。”^②在此结构下，欧盟的影响力呈现“强约束、弱激励”的特征。它可以通过改革清单、援助条件、候选国评估、民主与法治话语约束对象国，却难以为其提供与这些约束相匹配的制度回报。这种不对称结构正是政治绑定性形成的中观机制：对象国先被纳入欧盟规范评价体系，却无法获得明确、可信、可兑现的入盟前景。

2. 俄罗斯：衰退中的残余牵制。俄乌冲突与纳卡战争的双重冲击削弱了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影响力，使其在后苏联空间的角色已从主导性存在转向竞争性存在。2023 年 9 月阿塞拜疆完成对纳卡的军事控制时，约 2000 名

^①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 – Fact Sheet”,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19, 201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3_236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Communication on EU Enlargement Policy*, November 8, 2023, p.2.

俄罗斯维和人员并未对局势变化形成实质性阻止作用。2024 年 4 月，在超过 10 万名亚美尼亚族居民撤离的背景下，俄方开始撤军。^①这一事件几乎宣告了俄罗斯外高加索安全保障者角色的终结。在俄罗斯主导的旧安全秩序出现松动的同时，土耳其、伊朗、欧盟和美国等行为体加快介入，由此形成“权力真空”与“多方争夺”并存的新格局。^②

然而，俄罗斯仍保有若干残余约束工具。第一，它仍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非产油国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断供风险直接关系到民生与经济稳定，构成难以摆脱的经济杠杆。第二，大规模旅俄亚美尼亚侨民的生计与权益深度绑定俄亚双边关系，形成强烈的社会心理联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告称，根据俄罗斯 2020 年人口普查，俄境内的亚美尼亚人为 94.6 万，若将流动劳工等群体纳入估算，实际规模可能高达 250 万。作为参照，截至 2025 年 10 月 1 日，亚美尼亚本国常住人口仅有 309 万。^③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的侨民汇款长期构成亚美尼亚重要的社会经济支撑，使政府在处理对俄关系时不得不顾及相关民意与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第三，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的“事实独立”状态，始终是俄罗斯手中的“地缘王牌”，一旦格鲁吉亚采取彻底亲西方的激进政策，俄罗斯便可通过强化对地区分离势力的支持，激活该国分裂风险，牵制其转向进程。

因此，俄罗斯对三国的战略选择形成直接掣肘，它们的每一步亲西方动作都需权衡能源安全、侨民利益、领土完整等方面的风险。俄罗斯的残余约束，与欧盟“拉住而不拉入”的策略形成双向制衡，让外高加索国家既无法彻底脱离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也难以完全融入欧洲体系，将其锁定在进退维谷的悬置状态。

3. 美国、土耳其与其他力量：多元博弈与悬置固化。美国对外高加索

① “Russian peacekeepers start withdrawing from Azerbaijan’s Karabakh region”, *Reuters*, April 17,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n-peacekeepers-have-begun-withdrawing-azerbaijans-karabakh-says-kremlin-2024-04-17>

② Агазаде М. М.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Южном Кавказе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карабахской войн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3. Т.6. №4. С.401-411.

③ “Armenia Navigates a Path Away from Rus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11, 202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7/armenia-navigates-a-path-away-from-russia>; “Armenia’s Permanent Population Increases by 14,300 in 2025”, *Armenpress*, November 11, 2025, <https://armenpress.am/en/article/1234715>

的战略关注经历了从选择性人道主义投入向主导性地缘塑造的显著变化，这一转变也是强化外高加索三国悬置型欧洲化的重要外部变量。自 2020 年以来，美国针对纳卡危机的人道主义援助已经累计接近 2800 万美元。在 2023 年 9 月阿塞拜疆对纳卡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通过国际开发署宣布追加超过 410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用于救助逃至亚美尼亚境内的纳卡难民和流离失所者。^①2025 年 1 月 1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在华盛顿正式签署《美国与亚美尼亚战略伙伴关系宪章》，设立战略伙伴关系委员会。战略伙伴关系委员会为两国拓展双边合作提供了框架，涉及经济与商业、安全与防务、民主与司法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按美国官方口径，截至该宪章签署时，美国自 1991 年亚美尼亚独立以来已向其提供约 33 亿美元援助，其中自 2021 年以来约 3.4 亿美元。^②

更具结构性意义的变化发生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2025 年 8 月 8 日，在特朗普主持下，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美国白宫签署《华盛顿联合宣言》，宣布建设“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这是一条经由亚美尼亚南部、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飞地的多式联运通道，美国获得该通道 99 年的开发经营权。^③原本由俄罗斯主导的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调解机制被进一步边缘化，美国在短时间内取代俄罗斯成为该地区首要的外部调解力量。2026 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米尔佐扬公布了《“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执行框架》，将双方的诉求和收益清单化。美国以对亚美尼亚的财政支持为筹码，换取“强化对地区的战略影响力与规则主

①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s More Than \$4 Million in Addi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People Affected by the Situation in Nagorno-Karabakh”, November 21, 202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armenia/united-states-announces-more-4-million-additional-humanitarian-assistance-people-affected-situation-nagorno-karabakh>

② “Charter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U.S. Embassy in Armenia, January 15, 2025, <https://am.usembassy.gov/charter-on-strategic-partnership-betwee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the-republic-of-armenia>

③ See “Armenia-Azerbaijan Joint Declaration, signed at the White House”,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August 8, 2025, <https://www.primeminister.am/en/press-release/item/2025/08/09/Nikol-Pashinyan-visit-US-declaration>; “A Month After Historic Armenia-Azerbaijan Summit: Has Trump Secured a Lasting Peac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11,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5/09/azerbaijan-armenia-trump-deal>; “Trump’s Road TRIPP Delivers a Deal”, *CEPA*, August 13, 2025, <https://cepa.org/article/trumps-road-tripp-delivers-a-peace-deal>

导权”。^①这一转变对外高加索三国的欧洲化进程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在短期内为亚美尼亚提供了摆脱俄罗斯安全依附的替代性方案，强化了其与西方体系的对接。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以交易性地缘安排而非规范性趋同为核心逻辑，在欧盟规范性吸引之外引入了另一套以基础设施与安全换取地缘利益让渡的地缘博弈逻辑。

2020 年第二次纳卡冲突以后，土耳其对外高加索的塑造作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冲突期间，土耳其通过政治支持、军事合作和装备供给强化阿塞拜疆的作战能力，在帮助阿塞拜疆取得胜利和重塑地区力量平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②随后，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关系持续升温。2021 年 6 月，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签署《舒沙宣言》，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盟友级战略伙伴关系”，明确“兄弟情谊关系”和“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等认同叙事。^③2021 年 11 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④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合作机制化进程显著加速。

突厥国家组织对外高加索三国欧洲化的影响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它为阿塞拜疆提供了一个独立于欧俄之外的多边制度性归属，在“东进欧亚经济联盟”与“西向欧盟”两条路径之外获得了第三条国际合作路径，显著削弱了欧盟规范对其单向拉动的效力。第二，随着突厥国家组织从文化合作平台向安全与互联互通合作平台转型，在外高加索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土耳其借由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战略与“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在区域联通目标上的部分重叠，与美国在区域联通议题上加强合作，借此保持对亚美尼亚的战略压力，迫使其在对土耳其关系正常化与深化对欧合作之间保持克制和平衡。

大国的多元介入并未打破外高加索三国欧洲化的悬置状态，在机制层面有两重原因。第一，方向对冲。欧盟主要依靠规范性吸引推动三国制度安排

① “The TRIPP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TIF)” January 2026,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6/01/TRIPP-Implementation-Framework.pdf>

② M. Koçak, “Potential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romis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sight Turkey*, 2023, Vol.25, No.4, pp.115-138.

③ *Shusha Declaration on Alli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nd the Republic of Turkey*, June 16, 2021, <https://president.az/en/articles/view/52122>

④ “Türkiye celebrates 15th anniversary of 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 *TRT World*, October 3, 2024, <https://www.trtworld.com/article/18215673>

向西方规则体系趋同，俄罗斯则通过能源供给、安全庇护、军事存在和反西方安全叙事维系其传统影响，对三国的西向选择形成反向牵引。美国以通道开发与安全保障嵌入横向议程，土耳其则以突厥身份框架提供替代性认同。任何方向的深度突破都会触发其他方向的反制。第二，博弈强化。当外部存在多个均具备资源投放能力的竞争性行为体时，各国精英面临的最优策略是通过维持多向选择性来保留政治生存空间。在这种竞争格局下，欧洲化所要求的一揽子规范性改革恰恰是削弱精英对冲空间的制度约束，因此在微观动机层面被系统性规避。两重机制叠加，使悬置成为外高加索三国在欧洲化进程中应对多向博弈、维持对冲均衡的一种状态。

（三）微观路径依赖：能力、认同与资源的三重束缚

1. 治理能力与精英意愿的内生梗阻。欧洲化的制度嵌入既取决于行政与司法机器的执行能力，也取决于执政精英推进改革的意愿。在外高加索三国，这两方面均存在不足，并由此形成了能力制约与意愿不足两条相对独立的梗阻机制。

从治理能力方面来看，按照西方标准衡量，外高加索三国在政府效能、法治与腐败控制等维度上与欧盟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按世界银行治理指标估计值，长期处于全球中等偏下水平，与欧盟均值形成显著差距。^①《深度全面自由贸易区协定》要求统一关税征管、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合规等，这些规则对税务、海关与司法机关的专业化程度均有较高要求，而外高加索三国在司法独立性、行政专业化等指标上持续低于欧盟门槛，规则转化能力也有限。亚美尼亚在《2017年欧盟-亚美尼亚全面强化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承诺推进的营商与监管改革进展迟缓，格鲁吉亚围绕《欧盟-格鲁吉亚联系协定》开展的多轮司法改革也受到欧盟评估报告的多次批评，反映的正是这种执行能力上的结构性缺陷。

从精英意愿方面来看，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三国政治体制的共性在于精英联盟依靠资源分配与人身忠诚网络维系，而非以制度化规则运行。这与黑尔（H. E. Hale）所称的“庇护性政治”特征高度契合，这种政治体系往

①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interactive-data-access>

往法治薄弱，由非正式网络主导，精英则通过庇护网络争夺资源。^①同时，外高加索三国在这一共性之下存在一定差异。2018 年“颜色革命”后，亚美尼亚的精英结构发生部分重组，但庇护网络并未根本解体。格鲁吉亚呈现出庇护性政治与选举竞争并存的混合形态。阿塞拜疆则维持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三者面临的共同困局是，欧洲化所要求的司法独立、政党竞争与公民社会自治都会削弱既有精英分配资源和维系支配地位的能力，因此改革内生动力明显不足。能力不足使规则“嵌入不了”，意愿不足使规则“推不动”，二者共同将欧洲化锁定在承诺多于落实的低水平均衡状态。

2. 文化认同作为外交调整的历史性边界。文化认同在欧洲化路径中并非主动的推力，而是约束精英政策选择的历史性边界。对欧洲文化的亲近与疏离决定了地缘转向在国内政治中所能获得的合法性空间，任何越过这一边界的调整都会抬高政治成本，限制欧洲化的速度与幅度。

亚美尼亚文化认同以基督教传统和大屠杀记忆为基础，与欧洲具有天然亲近性，但苏联时期形成的安全依赖与社会层面的对俄联结同样深厚。两种取向在认同结构内部形成张力，使帕希尼扬政府的急速西转缺乏稳固的社会经济支撑，政策不稳定性因此具有结构性根源。格鲁吉亚的文化认同由亲欧文化与反俄记忆共同塑造，社会层面的亲欧共识为改革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但这种民意与部分执政精英的利益驱动之间形成持续张力，改革节奏受制于精英层博弈。阿塞拜疆文化认同以突厥民族主义为底色，与欧盟建构的欧洲认同框架在文化取向上存在明显疏离，加上能源禀赋带来的外交议价能力，阿塞拜疆对欧洲化规范压力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外高加索三国的文化认同结构兼具开放与封闭双重特性，既为外交调整提供弹性，也对单向突破构成文化约束。

3. 资源禀赋与外交能动空间的差异。在相近的结构约束下，资源禀赋的差异塑造了三国不同的能动空间，是三种悬置形态分化的物质基础。

亚美尼亚缺乏具有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经济规模有限，国际议价能力较弱，外交选择高度依赖外部安全保障与发展援助，对结构压力的缓冲能力

^① H. E. Hale, *Patronal Politics: Eurasian Regime Dynam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较弱。格鲁吉亚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其区域过境枢纽地位与旅游业，但二者都对周边地缘环境和地区稳定具有较高敏感性。与此同时，外资更多流向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性部门，制造业吸收外资的占比相对有限，仅为11.7%。^①由于产业升级空间受限，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政策的方向性而非经济自主性上。油气资源使阿塞拜疆成为外高加索三国中拥有最大外交议价空间的国家，其油气出口约占总出口九成，油气相关收入占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②一旦国际能源价格显著下行或可再生能源转型持续加速，现有资金结构所支撑的外交自主性将面临再平衡的压力。资源禀赋既在短期内放大或收缩了三国的能动空间，也在中长期内决定了它们面对欧洲化规范压力时的可持续抵御或吸收能力。

综合上述三项约束可见，治理能力、认同结构与资源禀赋共同构成外高加索三国在微观层的能动性天花板，其共性是均无法在结构约束下完成单向的地缘靠拢，差异则体现为外交自主空间的大小分野，前者决定了悬置作为共同结果的必然性，后者则解释了三种悬置形态的差异性，从而与前文宏观层与中观层的分析形成跨层级的逻辑闭环。

（四）三层因果的叠加机制：悬置困局的结构性延续

三个层次通过具体的传导机制相互强化，使悬置形态获得跨层级的结构稳定性。从宏观到中观，后苏联经济空间的碎片化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组相互叠加，为外部力量的竞争性介入留出了制度真空。而多元博弈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反向压制任何新型区域整合机制的生成，使得宏观层面的整合赤字得以延续。从中观到微观，外部多元博弈的持续压力放大了目标国精英的对冲偏好，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改革话语中原本有限的欧洲化改革意愿。精英庇护结构与治理能力赤字又反过来抬高了规则嵌入的交易成本，为外部各方继续介入提供了持续的空间与理由。从微观到宏观，小国有限的物质与制度能动性使其在秩序重组中只能承受既定压力，无法自下而上地塑造欧洲化的整合框架。这三条传导形成一种典型的正反馈机制，每一层次的约束都会在延

①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Georgia, “FDI in 2024 (Adjusted)” August 15, 2025, <https://www.geostat.ge/media/72580/FDI-in-2024---%28Adjusted%29.pdf>

② Bertelsmann Stiftung, *BTI 2024 Country Report – Azerbaijan*, Gütersloh: Bertelsmann Stiftung, 2024, p.3.

伸至相邻层次的过程中被进一步放大,不断提高欧洲化的制度成本。由此形成的跨层级锁定效应,正是皮尔逊(P. Pierson)所谓的“递增收益”与“路径依赖”逻辑在外部竞争、国内政治和政策适配之间的具体体现。^①

这种叠加机制决定了目标国的行为模式呈现出与西巴尔干国家不同的特征。努特切娃(G. Noutcheva)将候选国对欧盟条件性的回应区分为“假合规”、“部分合规”与“强加合规”。^②其中,“强加合规”以成员资格这一硬性杠杆为前提,而外高加索三国短期内并无入盟前景,欧盟所能动用的条件性工具也相应弱化。国外学者关于欧盟“外部激励模型”以及欧盟规则扩散的研究表明,欧盟规则转移的有效性取决于奖励规模、条件清晰度、承诺可信度和国内采纳成本等方面。^③因此,当成员资格前景缺失,外部激励弱化,替代性伙伴可得时,目标国既缺乏足够激励实现实质合规,又不足以彻底拒绝欧盟的规范压力,往往会选择在形式合规、选择性采纳与策略性规避之间动态摇摆,主动或被动地陷入欧洲化的悬置均衡状态。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在正反馈机制已经锁定的条件下,任何单一层次的变量变化都不足以改变悬置形态。只有当宏观秩序结构、中观博弈格局与微观能动性三者同时发生方向一致的变动时,悬置均衡才具备被打破的结构条件。因此,悬置并非一种偶然或过渡状态,而是在现有跨层级约束组合下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均衡结果。这既是本文因果分析的主要结论,也构成后文对其演化可能性进行讨论的逻辑起点。

四、破解悬置困局：三层约束的协同突破

破解外高加索三国欧洲化悬置困局的关键是突破既有路径的结构性价

① P.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Vol.94, No.2, pp.251-267.

② G. Noutcheva, “Fake, Partial and Imposed Compliance: The Limits of the EU’s Normative Power in the Western Balka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9, Vol.16, No.7, pp.1065-1084.

③ See F. Schimmelfennig, U. Sedelmeier, “Governance by Conditionality: EU Rule Transfer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and Outsider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4, Vol.11, No.4, pp.661-679; T. A. Börzel, T. Risse, “From Europeanisation to Diffusion: Introduc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2, Vol.35, No.1, pp.1-19.

束。下文先评估三类现有路径的局限性，再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次区域合作两个方面提出可行的突破方向，进而阐释“一带一路”对外高加索格局变化的战略价值，最后归纳悬置型欧洲化的理论意义。

（一）现有路径的局限性

亚美尼亚呈现出加速向西调整的路径取向。帕希尼扬政府通过暂停参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相关活动，扩大与法国、印度等国的安全合作，并接受欧盟驻亚美尼亚特派团在亚阿边境开展民事观察任务，推动政治方向的明显向西调整。

亚美尼亚选择加速向西调整，该路径的短期逻辑是，以对外重新定位换取欧盟与其他西方伙伴在安全与经济议题上的更高承诺。然而，这一路径面临“三重错位”的结构约束。一是政治方向调整快于安全替代机制的形成，即亚美尼亚虽试图降低对俄罗斯的安全依赖，但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尚未提供可替代俄罗斯安全角色的制度化安排。二是对欧经济靠拢快于行政和监管能力积累，相关改革仍缺乏与深度市场整合相匹配的执行基础。三是外交路线变化快于国内共识和社会经济支撑的形成，导致西转政策的国内基础仍不稳固。亚美尼亚西转路径能否持续，取决于两组条件：第一，欧盟能否将规范合作提升为具有实质承诺的制度安排；第二，俄罗斯-阿塞拜疆-土耳其三角关系是否出现结构性松动。在两者均未明朗之前，亚美尼亚加速西转所能获得的，可能更多是欧盟形式化的外交支持，而非深度嵌入欧盟体系的战略机遇。

格鲁吉亚呈现出维持现状的路径取向。2023年12月，欧洲理事会授予格鲁吉亚欧盟候选国地位，同时要求格方落实欧委会覆盖民主、法治与基本权利等领域的九项改革要求。2024年6月，欧盟因格鲁吉亚执政党推动通过《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而认定其入盟进程已“事实上暂停”；^①2024年10月，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在争议中结束，执政党于11月宣布，将入盟谈判推迟至2028年，并拒绝欧盟预算支持。该路径的短期逻辑在于，回避结构性改革的政治成本，维系现有经济与治理安排的稳定，并为执政精英保留更大的政策弹性。其结构约束主要有两项。第一，据估计，格鲁吉亚社会层面

^① “Georgia”,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countries/georgia_en

有超过 70% 的民众支持入盟，而执政精英则可从推迟入盟进程中获利，二者之间形成持续冲突。第二，欧盟以冻结援助向格鲁吉亚施压，促使格方推进改革，俄罗斯则凭借自身在贸易、侨汇与能源领域的既有份额进行反向牵制，格鲁吉亚缺乏同时满足欧盟与俄罗斯的政策空间。

阿塞拜疆呈现出“主动悬置管理”的路径取向，即主动维持多向平衡，不向任何一方单向靠拢。借助油气租金^①、与土耳其的战略协作以及夺回纳卡地区塑造的地缘位势，阿塞拜疆获得了外高加索三国中最大的对外政策自主空间。同时以“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与欧盟在能源议题上保持选择性合作，其结构约束在于议价能力对油气租金的严重依赖。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下行与欧盟能源转型的加速，可能在中长期内逐步压缩这一杠杆的有效性。而经济结构多元化相对滞后，也会限制其外部议价能力向内生发展能力的转化。阿塞拜疆与欧盟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阿塞拜疆国内能源转型进度与外部能源市场结构的变动节奏，这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了“主动悬置”状态能否长期持续下去。

上述三条路径的局限共同印证，外高加索三国的悬置型欧洲化困局源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约束的叠加，单一层级的突破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该结构。有效的破解路径需要协同发力，以全球价值链嵌入填补宏观整合真空，以次区域合作与制度性对冲削弱中观多向锁定，以精英认知重构突破微观路径依赖。

（二）协同突破路径的可能性

1. 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与互联互通网络。外高加索三国宏观结构性困境的根源，在于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地缘枢纽地位长期受制于大国博弈，未能转化为自主发展资源。理论上，将地缘区位禀赋转化为外交议价资产，需以深度嵌入跨区域价值链与互联互通网络为中介。在这方面，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从运量来看，近年来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货运量已呈现爆发式增长态

^① “油气租金”指按地区价格计算的原油、天然气产值与总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See “Oil rents”, *World Bank Group*,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metadataglossary/adjusted-net-savings/series/NY.GDP.PETR.RT.ZS>; “Natural gas rents”, *World Bank Group*,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metadataglossary/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series/NY.GDP.NGAS.RT.ZS>

势。2023 年增长 86%，达到 276.4 万吨，2024 年前 11 个月直冲 447.2 万吨，相比 2023 年近乎翻倍。^①阿塞拜疆巴库港与格鲁吉亚波季港、巴统港构成的枢纽节点群已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物流网络的关键枢纽。外高加索三国在一定程度上绕开被动接受大国条件性压力的传统模式，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运输能力、枢纽辐射范围等核心价值转化为多边谈判筹码，通过与欧亚各国协商货运定价机制、跨境物流合作分红模式等，依托通道的不可替代性，有效增强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动权。

需要强调的是，协同突破路径的前置条件是三国基础设施互操作标准的协调统一。当前区域内港口的装卸规范、货运的通关流程、铁路轨道的规格等，均存在不一致的问题，这已成为制约枢纽价值释放的关键瓶颈。唯有通过建立次区域标准化协调机制，实现跨境物流各环节的无缝衔接，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通道竞争力，使地缘枢纽优势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议价能力与自主发展动能。

2. 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激活与制度性对冲。次区域合作是在中观多向锁定格局中重建集体能动性的关键路径。中观锁定之所以成立，根本机制在于各大国以双边条件性压力对外高加索三国实施“各个击破”。因此，若三国能在特定功能性领域形成哪怕最低限度的协调安排，便可将单一国家对单一大国的议价结构，置换为次区域对外的集体议价结构，从而在不直接触碰敌对性历史议题的前提下，局部改写博弈的力量对比。

在议题分布上，能源出口、互联互通、跨境环境治理共同构成三国利益交集最显著的功能性领域。其中，黑海海底电缆项目可作为典型案例。黑海海底电缆项目由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四国政府于 2022 年年底正式启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签署仪式。^②该项目拟建设海底电力电缆总长度 1195 公里，总容量 1000 兆瓦至 1500 兆瓦，旨在将外

① “The Trans-Caspia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 and Other Promising Corridors in Central Asia”, January 2025, https://index1520.com/upload/medialibrary/c1a/h914jj1ibcbwxh7n7a9iix89eilcb8ta/en310125_TITR.pdf

② “Statement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ack Sea Energy submarine cable”,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17, 2022,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news/statement-president-von-der-leyen-signing-ceremony-memorandum-understanding-development-black-sea-2022-12-17_en

高加索可再生能源输送至欧盟市场。^①随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与匈牙利的输电系统运营商合资成立绿色能源走廊电力公司，该公司作为项目实施平台，推进后续建设。^②

黑海海底电缆项目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外高加索与欧盟电力互联的基础设施工程，也与欧盟能源转型和能源来源多元化目标相契合。欧盟 2023 年第三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指令》，至少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目标提高到 42.5%、力争达到 45%，^③来自外高加索和里海地区的绿色电力输送，可能成为欧盟扩大可再生能源供给、分散能源进口的新外部通道。在黑海海底电缆项目中，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承担不同分工。阿塞拜疆依托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试图从传统油气出口国转向绿色电力供给国。格鲁吉亚则凭借其地理位置和跨境输电网络，承担外高加索电力接入黑海通道的登陆端和过境枢纽功能。

这种功能分工使两国有望在对欧关系中获得一定的制度性对冲空间。欧盟虽然仍会在民主、法治和人权等议题上维持规范压力，但当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被纳入其能源转型和互联互通战略后，能源合作、通道安全与项目稳定性的机会成本也会制约欧盟条件性压力的施加。

但是，这种对冲的能力受制于次区域政治的底层约束。历史积怨与现实利益分歧构成次区域合作的主要障碍，这意味着功能性合作的推进必须与解决历史政治遗留问题同步进行，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平进程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正向互动循环，是这条路径能否持续的根本前提。

3. 制度性对冲的国内影响。在次区域合作机制之外，三国自身的国内战略选择构成对冲大国锁定的另一支柱。从理论上说，中小国家的国际议价能力并不取决于其在某一阵营内忠诚度的提升，而是源自其在多重制度框架间维持弹性参与、拒绝排他性承诺的结构性位置。

① “Black Sea Submarine Cable (BSSC) Project Profile”, *Submarine Networks*, <https://www.submarinenetworks.com/en/systems/asia-europe-africa/bssc>

② “Joint Venture Established by Four Countries within the Black Sea Submarine Cable Project”,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eorgia*,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economy.ge/?lang=en&nw=2658&page=news&s=shavi-zgvis-wyalqvesha-kabeli-s-proeqtis-farglebshi-otxi-qveynis-mier-ertoblivi-sawarmo-dafudznda&utm>

③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renewable-energy/renewable-energy-directive-targets-and-rules/renewable-energy-directive_en

在对欧关系维度，外高加索三国宜聚焦贸易、能源、数字经济等低政治敏感性、高边际收益的功能领域，避免一次性承担治理改革等高条件性议程，始终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保留可逆空间。在多边融资维度，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开发银行为主的多边融资组合可在条件性透明化与多方共担风险两个层面同时降低对单一大国财政工具的依赖。在发展合作来源维度，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建设，可为外高加索三国提供基础设施融资与产业能力建设的结构性替代来源。其功能并非取代欧盟或俄罗斯的市场接入，而是为三国增加一种新的合作选项，减少其对任何单一国家的依赖。同时，将中国项目纳入世界银行集团、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方参与的联合融资框架，也有助于提高项目透明度，避免“以新依附替代旧依附”。若区域国家能够在国内层面将策略性模糊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组合，包括议题分工，融资多元化和规则嵌入等，前述各项宏观与中观路径方可避免沦为停留在纸面上的蓝图。

（三）“一带一路”框架的参与路径与战略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为三国提供的并非普通合作渠道，其结构性意义在于，以跨大陆互联互通打破既有地缘分割，为中间地带国家引入超越阵营对立的第三方发展选项。^①在外高加索三国中，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于2015年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阿塞拜疆随后也与中国建立“一带一路”共建关系。尽管同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主体，但受地缘区位、外交战略、经济结构与区域安全格局影响，三国对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合作领域广度与项目落地程度存在显著差别。其中，格鲁吉亚在外高加索地区与中国的对接最为全面深入，在基础备忘录之外，两国已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中格自贸协定也已正式生效，^②推动格鲁吉亚依托自身黑海沿岸区位优势，深度融入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在跨境物流、商品贸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形成常态化、机制化合作格局。亚美尼亚作为内陆国家，受边界封闭、交通通道有限和地区安全格局不稳定影响，其参与“一

① 田德文：“‘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多极化”，《人民论坛》，2023年第20期，第36-39页。

② 参见“中国同格鲁吉亚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6年3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476/sbgx_676480

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早期，中国与亚美尼亚的合作主要集中于经贸、人文、民生援助和交通便利化等务实领域。2025 年 7 月，中国与亚美尼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倡议对接，显示两国务实合作与政治互信层级显著提升。但是，这种合作能否形成区域互联互通效应，仍受制于外高加索通道开放、安全环境和项目执行能力。^①阿塞拜疆依托丰富能源资源与里海地缘优势，长期奉行多元平衡的对外交往方针，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保持审慎、选择性的合作节奏，重点聚焦能源协作、跨境运输、区域联通等契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板块，虽后续完善了双边共建合作的顶层设计，但始终避免全方位深度绑定。

总体来看，宏观上提升外高加索三国对“一带一路”合作的主动管理能力与微观上推动精英认知重构是同一个历史任务的两面。“一带一路”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推进主要面临三重挑战：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基础设施合作的不足，融资模式的单一。将项目合规、融资透明与多边机构联合融资作为谈判前提，是规避合作风险、将“一带一路”转化为制度性对冲资产而非新型依附来源的关键所在。中国外交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结伴不结盟原则，以经济合作为主轴的政策定位，为外高加索国家提供了一种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共同发展选项。但这种选项的战略价值能否实现，还取决于三国能否将合作红利转化为自主的产业能力与发展主权。已经有国外学者指出，主权经济能力的建构是维系外交自主性的根本前提。从这一意义上看，“一带一路”框架则可以成为外高加索三国破解悬置型欧洲化困局的有效外部杠杆。

五、结 论

本文以悬置型欧洲化为核心概念，通过对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三国欧洲化进程的比较分析，讨论了外高加索地区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三国均未实现与欧盟的制度化融合，也未脱离欧洲化进程，而是长期停留于政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5 年 8 月 31 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508/t20250831_11699056.shtml

治绑定与制度整合停滞并存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单纯的过渡阶段，而是宏观整合失序、中观多强博弈与微观路径依赖三重约束叠加作用下的稳定悬置状态。从概念层面看，悬置型欧洲化为既有欧洲化理论在“融合成功”与“彻底失败”之间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欧洲化过程中的规则扩散、制度趋同及条件性机制，并提出“无成员资格的趋同”、“无终结目标的欧洲化”等概念，以解释欧盟候选国或邻近国家在缺乏明确入盟前景时仍然发生的部分制度适应。与此相比，本文的重点在于解释欧洲化进程中的停滞机制，从宏观整合失序、中观多强博弈与微观路径依赖三重结构中，揭示悬置状态的形成、延续及其自我再生产逻辑。由此，本文为理解欧盟周边地区欧洲化进程的长期悬置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

从比较案例层面看，外高加索三国差异化的悬置形态印证了一个规律，即外部结构约束决定悬置的基本形态，国内能动逻辑决定悬置的形态差异。亚美尼亚急速西转，以超出制度与安全承载力的速度推进政策调整，陷入安全真空与经济依附双重困境。格鲁吉亚执政精英主动操控悬置，以双向博弈换取短期收益，代价是政治信任加速消耗，国内政局不稳。阿塞拜疆依托能源禀赋构建主动悬置格局，议价弹性最强，但其策略有效性受制于能源市场与外部博弈格局，一旦欧盟绿色转型加速或地区力量对比重组，这种弹性将面临系统性侵蚀。三者的共同处境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在三重结构约束叠加的条件下，单向突破均难以实现。显然，外高加索三国欧洲化悬置困局的出路不可能来自任何单一层次上的局部调适。只有将地缘枢纽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议价能力，以次区域合作机制打破被大国各个击破的施压格局，以多元均衡合作替代单一地缘依附，才有可能破解这一困境。缺少任何一个维度，其他两个维度都难以为继。经济主权的重塑应先于外交选择的拓宽，这是比制度安排更根本的历史任务。中小国家唯有将外部合作红利转化为内生的产业能力才能真正摆脱工具化命运，在大国博弈格局中确立不可替代的自主位置。

外高加索三国欧洲化的困局，折射出后冷战国际秩序局部解体与多极化新秩序尚未成型这一历史过渡期的内在复杂性。欧盟东扩逻辑的内在矛盾在于，它以西方规范传导为手段，以地缘整合为目标，却无法承担经济整合的

政治成本，由此将大量边缘国家锁定在被规范化但不被接纳的尴尬位置，进而通过人才外流、资本介入和资源控制等手段，在经济上不断强化这些国家的依附性。这种制度性矛盾并非外高加索独有，而是整个欧盟东扩边界地带的普遍现象。从这一视角看，悬置型欧洲化描述的不只是外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困境，而是欧洲一体化扩张模式在历史极限处暴露出的内在缺陷。

从更深层次来看，外高加索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即在大国竞争格局趋于多极化的时代，中小国家的发展主权不能依赖任何单一外部体系的庇护，而必须建立在多元嵌入与自主能力提高的双重基础之上。如果说地缘位置是各国的禀赋，那么将禀赋转化为战略资产的关键就在于各国能否突破被动依附的惯性逻辑，以国家发展为核心重构对外合作的战略位势。这是外高加索三国尚未完成的历史课题，也是所有处于大国博弈夹缝中的中小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在融入世界体系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最重要选择。

（责任编辑 宋羽竹）

欧盟安全决策中的波兰角色跃迁*

宋黎磊 万志高**

【内容提要】作为中东欧地区的关键中等强国，波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展现出的政策能动性，挑战了欧盟传统大国主导的安全决策模式。通过梳理波兰东方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波兰逐渐形成了以安全输出为核心的战略定位。波兰通过推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强化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支柱地位，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对抗性政策，实现了从欧盟安全政策消费者到议程生产者的角色跃迁。在这一过程中，波兰不仅成功地将国家安全议程嵌入欧盟的对外政策，还重塑了欧盟东部政策的地缘重心，并阻碍了欧盟与俄罗斯构建欧洲安全架构的可能性。这一角色跃迁既源于冷战结束后波兰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战略文化的复兴，也展现了关键中等强国在危机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同时暴露出欧盟决策机制中成员国偏好竞争的内在张力。研究波兰在欧盟安全决策中的角色跃迁，为理解以波兰为代表的中等强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制度性杠杆作用提供了新案例，对修正欧洲外交政策的“大国中心论”及理解欧盟多层治理中的次区域行为体的作为具有理论意义。

【关键词】关键中等强国 波兰外交 安全输出 东部政策 欧洲安全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4**【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3-0095(29)

波兰是近年来欧盟成员国中的活跃力量，是欧盟外交的积极参与者。安全输出的战略定位是波兰外交政策的核心。波兰安全输出战略有两个基本支柱：一是加强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二是加强自身在欧洲一体化中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外交变局与中美全球战略博弈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万志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影响力。波兰贯彻安全输出战略的重要政策抓手就是其东方政策（Eastern Policy）。^①波兰位于欧洲心脏地带，处于西欧与东欧的过渡区域，同时连通北欧与中欧，地缘位置至关重要。东方政策贯穿了波兰的过去与现在、经济与安全、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自波兰成为欧盟成员国以来，通过推动东方政策的欧盟化，波兰的关键中等强国地位得到了集中体现。^②

波兰安全驱动的政策偏好对欧洲的安全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挑战了欧盟“大国主导”的传统安全决策模式。特别是自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部分议题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所提高。^③2023 年，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就任波兰总理后，波兰调整内外政策，重返亲欧主义方略。随着 2024 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法国和德国的国内政治出现变动，作为中东欧地区强国的波兰试图在欧盟的对外政策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25 年上半年，波兰第二次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与第一次接任时相比，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此次波兰提出的议程更为聚焦，欧洲安全成为议程的核心，波兰提出了以“安全欧洲”（Bezpieczeństwo, Europo!）为主题的任期规划。这也成为影响 2025 年欧盟对外政策的重要变量。^④

在议题层面，波兰提出了直接关系外部安全领域的七个子议题。在国防和安全方面，要支持欧洲国防工业，支持“东方之盾”计划和波罗的海防线等关键国防和双重用途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补充北约的努力”。^⑤2025 年 8 月，当选波兰总统的卡罗尔·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宣誓就职。

① See “Eastern polic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Poland*, <https://www.gov.pl/web/diplomacy/eastern-policy#:~:text=Poland%20has%20been%20supporting%20the%EF%BC%8Cof%20development%20in%20the%20future>

② 一些地区国家对波兰的地区主导地位持不同观点。See C. Reeves, “The Jagiellonian Idea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 Historical Echoes in Today’s Approach”,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52-160; M. Ehl,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through Czech Eyes: Unconvinced by Their Neighbour’s Plans”,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Iss.2, pp.76-81; H. Grala, “Was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a Colonial State?”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Iss.4, pp.125-150.

③ 刘作奎、贺之杲：“欧洲政治生态的‘中东欧化’：内涵、机制和前景”，《国际政治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38-59 页。

④ “Bezpieczeństwo, Europo!” <https://wayback.archive-it.org/12710/20260226091151/https://polish-presidency.consilium.europa.eu/pl/program/priorytety-prezydencji/>

⑤ A. Švrčinová, B. Krempaská, “Polish EU Council Presidency: A Turning Point for Europe?”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January 22, 2025, <https://www.freiheit.org/central-europe-and-baltic-states/polish-eu-council-presidency-turning-point-europe>

由于其疑欧立场，有评论认为波兰可能再度成为欧盟内部的“搅局者”，使波兰与欧盟的关系面临挑战，影响波兰在欧盟内作为新欧洲国家的“领导地位”。^①与此同时，2025年，波兰通过高频次、高层级的对美外交互动，确保美军在波兰的持续存在，并力图影响美国在乌克兰及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走向。波兰凭借自己在北约框架下的“模范”表现以及与美国紧密伙伴关系，得以在欧美之间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从而在欧洲内部的安全与政策博弈中增强自己的谈判筹码与战略影响力。

本文认为，波兰外交的安全输出偏好符合国际关系研究中关键中等强国的逻辑。关键中等强国多占据地缘政治支轴位置，往往面临敏感地理位置带来的安全脆弱性挑战。为化解这一困境，其外交政策普遍贯穿着关于安全输出的考虑：通过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向区域提供安全保障，以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介于体系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关键节点，这类国家不仅具备联结地区与国际议程的枢纽功能，更能娴熟运用多边制度杠杆发挥“桥接”效应，在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的同时，引导地区秩序走向。

因此，本文应用关键中等强国的理论框架，考察作为关键中等强国的波兰在外交政策中贯彻安全输出考虑的路径与可行性。波兰案例为理解关键中等强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制度性杠杆作用提供了新视角。这一发现对修正欧洲外交政策的“大国中心论”，分析欧盟多层治理中次区域行为体的作为，具有理论意义。

一、关键中等强国：波兰的安全定位

作为区域中枢的关键中等强国，是连接体系大国与地区行为体的结构性节点。它们通过发挥“桥接”（bridging）作用，撬动多边制度杠杆，将自身安全关切上升为区域议程，从而在缓解地缘困境的过程中实现对地区秩序的主动塑造。波兰作为典型的关键中等强国，其外交政策始终贯穿着有关安全输出的考虑，尤其体现在推动东方政策欧盟化的进程中。该政策不仅贯穿

^① “Razor-Thin and Deeply Divided: The Polish Election Shock”, *Carnegie Europe*, June 3,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ope/strategic-europe/2025/06/razor-thin-and-deeply-divided-the-polish-election-shock?lang=en>

了波兰的历史与现实,安全与经济,也嵌入了该国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加入欧盟后,波兰通过将东方议题嵌入欧盟议程,显著提升了自身在区域安全格局中的影响力,并且在塑造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安全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凸显了其作为关键中等强国的角色与行动能力。

(一) 作为关键中等强国的波兰

作为一种国家类型,“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的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溯源到 1947 年。乔治·格雷兹布鲁克(G. Glazebrook)将其界定为“一个方便的术语,可以避免将国家不切实际地简单划分为‘大国’和‘小国’……在大国和小国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国家,它们虽然不追求大国的头衔,但已经展示出小国所不具备的力量和影响力。这些国家就是中等强国”^①。从理论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多聚焦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和大国,强调其对国际体系的控局能力。中等强国的概念则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施动者-结构辩论”(Agent-Structure Debate)增加了新意:尽管中等强国由于实力相对有限,无法改变国际体系,但它们也不仅仅只是“价格接受者”,中等强国的国家地位会使它们在国际结构的限制下仍然有较强的能动性,并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国际体系产生重要影响。^②从历史上看,在中等强国这一概念出现的早期,亦即冷战时期,其具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所指的主要范围也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西方集团内部的中层国家。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中等强国被塑造成国际社会的“良好公民”,它们被认为倾向于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并在国际争端中采取妥协立场。^③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南非、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一批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尤其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新兴中等强国”日益受到重视。^④这在一定

① G. D. Glazebrook, “The Middle Power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47, Vol.1, No.2, p.307.

② D. Mares, “Middle Powers under Regional Hegemony: To Challenge or Acquiesce in Hegemonic Enforce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8, Vol.32, No.4, pp.455-457.

③ A. F. Cooper,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p.6.

④ A. F. Cooper, E. P. Dal, “Positioning the third wave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Institutional elevation, practice limit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6, Vol.71, No.4, pp.518-524.

程度上稀释了“中等强国”概念最初具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①上述学理讨论扩大了中等强国概念的包容性，也推动了对中等强国概念边界的深入讨论。有研究试图重新强调中等强国的规范特征，^②另有研究则尝试引入“实践”等社会学概念界定中等强国。^③近年来，一方面，中等强国之间的分化加剧，国家间能力指标的差异较为显著，另一方面，中等强国在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可见度和能动性显著提高。属于这一层次的国家具有总体上相似的经济体量特征，在对外政策上展现出较强的灵活性，聚焦特定议题领域的“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④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国际体系中霸权国霸权衰退的宏观背景下，中等强国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表现出差异化的态度与倾向，中等强国外交政策中显著的“战略自主”与“机会主义”双重特征也日益受到关注。^⑤

中等强国概念更关注国家的实力层级和国际行为特征，而“关键国家”（Pivotal States）更强调地缘政治的意涵。关键国家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麦金德（H. Mackinder）的地缘政治理论。^⑥而后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对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Geopolitical Pivots）的论述深化了这一理论。布热津斯基认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⑦。“关键中等强国”（Pivotal Middle Powers）是对中等强国概

① C. Efstathopoulos, “Global IR and 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exploring different paths to agency”, *Austral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Vol.77, No.2, p.217.

② E. Jordaan, “The emerging middle power concept: Time to say goodby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24, No.3, p.405.

③ J. de Bhal, “Rethinking ‘middle powers’ as a category of practice: stratification, ambiguity,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Theory*, 2023, Vol.15, No.3, pp.404-415.

④ A. F. Cooper,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E. H. Potter, “Niche Diplomacy a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6/1997, Vol.52, No.1, pp.25-38.

⑤ U. Aydin, “Emerging middle powers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Vol.97, No.5, pp.1381-1382.

⑥ R. S. Chase, E. B. Hill, P. Kennedy, “Pivotal States and U.S.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1996, Vol.75, No.1, pp.33-34.

⑦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念与关键国家概念的综合。相较于中等强国，关键中等强国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上的能力，关键中等强国是地区大国，它们占据了所在地区的中心地带。然而，关键中等强国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它们所在地区，它们的另一个特征是能够将地区和国际问题联系起来。^①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安全领域，尽管体系主导国至关重要，但关键中等强国在特定的地区安全复合体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一方面，关键中等强国可能发挥“桥接”作用，即通过引入更加有效的谈判策略和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促进地区性的安全困境的缓解；^②另一方面，关键中等强国也具有足够的实力与制度杠杆，且通常有意愿去使用这些杠杆，以此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特定地区的形势走向。

波兰作为地处中东欧战略十字路口的关键中等强国，占据中东欧中心地带，其敏感的地理位置也带来了显著的安全脆弱性挑战。为了化解这一困境，关于安全输出的考虑贯穿了波兰外交政策：依托欧盟与北约成员的身份，波兰主动向周边提供安全保障，塑造有利的安全环境，以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欧盟第六大经济体（按实际 GDP 计算），^③波兰更有能力凭借其桥接作用与制度杠杆，将地区与国际安全议程有效联结，在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的同时，引导地区秩序走向，成为沟通体系大国（如美国）与地区行为体（如欧盟）的关键枢纽，在欧洲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后冷战时代，随着北约与欧盟东扩并与俄罗斯激烈对抗，尤其是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波兰地处欧洲地缘十字路口的区位关键性与日俱增。波兰在近代史上作为“天主教之矛”的位置正在演变为当下欧盟与非欧盟国家分界线的前沿，北约与非北约国家分界线的前沿以及欧盟与俄罗斯边界的前沿。而波兰从融入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到重新成为对抗前沿，则进一步刺激了波兰基于历史经验形成的对安全议题的高度敏感：“波兰发现自己处在俄罗斯与西方竞争的中心……2014 年后，面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政策，波兰增加了国防开支，并更加积极地支持

① M. Özkan, “A New Approach to Global Security: Pivotal Middle Powers and Global Politics”,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Vol.11, Iss.1, p.81.

② J. B. Spero, “Great Power Security Dilemmas for Pivotal Middle Power Bridging”,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09, Vol.30, Iss.1, pp.152-153.

③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uropean Dept, *Republic of Poland: Selected Issues*, January 21, 2025.

加强北约东翼。”^①

（二）波兰安全追求的历史与现实

在后冷战时代波兰以安全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中，俄罗斯始终是最重要的他者与假想敌，这使得东方政策在波兰的外交政策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②当下，通过推动东方政策的欧盟化，波兰的关键中等强国地位得到集中体现。而波兰推动欧盟化东方政策的偏好，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欧洲安全格局。

嵌入波兰东方政策中的安全追求，有其深远的历史与叙事基础。波兰的东方政策可以追溯到雅盖隆王朝时期。从 14 世纪后半叶开始，波兰王国就不断向东欧和利沃尼亚（Livonia）扩张。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这段扩张历史不仅成为波兰东方政策的叙事根基，也成为波兰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在波兰贵族中比较流行的萨尔马提亚主义（Sarmatism）认为，波兰人是古典时代末期东欧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亚人的后裔，担负着征服其他东欧民族并使其文明化的使命。^③在宗教方面，波兰的政治边界与罗马天主教会的最东端相重合，波兰的东面是东正教，东南面是伊斯兰教，因此波兰人也将自己视为西方基督教的堡垒和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在东方肩负着重要的宗教使命。^④15 世纪之后，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波兰与俄罗斯的竞争开始加剧。两国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东欧近代早期历史的一条主线。这种竞争不仅涉及领土和地区主导权，还涉及宗教和对教徒的管辖问题，为此，两国曾多次爆发战争。^⑤

尽管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的《里加条约》划定了苏波边界，却未能浇灭波兰复兴东方政策的雄心。在约瑟夫·毕苏斯基（J. Piłsudski）统治时期，以整合中东欧地区、对抗俄国为核心安全战略的海间联邦构想（Intermarium）

① Foundation Pour L'Innovation Politique, "Poland's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strategies and prospects", September 2025, <https://www.fondapol.org/en/study/polands-security-in-the-21st-century-challenges-strategies-and-prospects>

② 宋黎磊：“俄乌冲突背景下波兰对俄外交战略溯源——‘雅盖隆思想’的复兴与波兰东方政策”，《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30-151 页。

③ J. Niedźwiedz, "Sarmatyzm, czyli tradycja wynaleziona", *Teksty Drugie*, 2015, Iss.1, pp.46-62.

④ H. Kowalska-Stus,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wo Cultures", *Politeja*, 2017, No.14, Vol.6, pp.55-78.

⑤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美]马克·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1 页。

和普罗米修斯计划（Prometheanism）构成了波兰东方政策的主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的地缘政治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东方政策也随之调整。这一时期，波兰成为苏东集团的重要成员，领土整体向西迁移，成为一个主体民族占比更高的国家。波兰的国家安全政策也转变为与苏联结盟，对抗西方集团。以皮亚斯特愿景（Piast Version）为基础的东方政策叙事取代了基于雅盖隆愿景（Jagiellonian Version）的政策叙事。^①但之后出现的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东方政策构想（以下简称“乌立白构想”）承继了雅盖隆愿景的传统，呼吁波兰将自身作为连接欧洲与东方的桥梁，而非欧洲的前沿堡垒，接受二战后波兰边界的变化，并建议波兰与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在独立国家的基础上建立密切的联系。^②值得指出的是，这项政策没有反俄理念，而是预设了与俄罗斯民族的和解。^③乌立白构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团结工会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波兰东方政策的先声。冷战结束后，波兰经历了深刻的国家转型。在此过程中，波兰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剧烈变化。乌立白构想奠定了波兰第三共和国东方政策的基调，但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反俄思潮在这一时期开始抬头。而在地缘上，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再次塑造了一个波兰与俄罗斯的中间地带，近代早期以宗教和神话为基础的波兰作为文明堡垒的地缘位置，在当代语境下发生了历史性转化。波兰不再扮演东西方文明分野的宗教前哨，而是转入一种与昔日地缘功能重叠、但内涵不同的位置——兼具前哨与边缘双重属性。波兰似乎再次承担了“神圣使命”，需要向东部邻国传播西方自由主义，并

① 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New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86

② 盖德罗埃茨路线（Giedroyc's line）、《文化》路线（Kultura's line）、盖德罗埃茨-米罗茨维奇路线（Giedroyc-Mieroszewski's line）指的都是乌立白构想。See A. Turkowski, "Polish Intelligentsia Totems in Elites' Struggles for Legitimization: The Case of Jerzy Giedroyc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2019, Vol.33, No.1, p.67.

③ C. Reeves, "The Jagiellonian Idea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 Historical Echoes in Today's Approach", *Politeja*, 2017, No.14, Vol.6, pp.7-12; T. Snyder, "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Polish Eastern Policy",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3, Vol.4, No.1, pp.115-117; P. Waingertner, "Jerzego Giedroycia idea ULB – geneza, założenia, próby realizacji. Zarys problematyki", *Studia z Historii Społeczno-Gospodarczej*, 2015, Vol.15, pp.143-159.

将其他后苏联空间国家从对俄罗斯的依附中“解救”出来，拉近它们与西方的距离。

从中古晚期到现代，连绵不绝的战争史塑造了波兰的东方政策，也使其整体外交始终对安全保持高度警觉。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的单极霸权在某种程度上为波兰提供了一个国家安全的黄金时代，曾担任波兰总统国际事务顾问的罗曼·库兹尼亚尔（R. Kuźniar）指出，“波兰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根据国家地缘政治形势的要求调整自己的安全政策。这并不总是政策的过错，有时只是地缘政治形势超出了波兰的能力范围。从这个角度看，1989年以后的时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波兰成功扭转了三个世纪以来深陷其中的地缘政治局势……其相关的制度表现就是北约和欧盟的扩大，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波兰的安全形势。当前，波兰等国的任务应该是加强这些变化和趋势”^①。就波兰和俄罗斯的关系而言，冷战结束的影响和意义则更为复杂。冷战的结束从两个方面根本改变了波俄关系：首先，它使波兰脱离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进而加入欧洲一体化组织；其次，它重新点燃了两国对中间地带的历史争夺。简言之，波兰从原苏联的“卫星国”转变为俄罗斯的地区对手。^②比照波俄两国在近代早期对东欧争夺的历史，也许冷战结束以来三十余年最大的不同在于：近代早期两国对中东欧地区的争夺主要体现为两个国家间的领土竞争，而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普世主义价值观竞争在波俄两国地区竞争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此外，两国的竞争也并非局限在国家层面，两国所参与或主导的国际组织在这场竞争中成为两国安全偏好的放大器。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实际上处于俄罗斯与北约对抗的前线，其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波兰认为，未来数年，欧洲人都要面对一个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因为俄乌冲突并非出于领土之争，而是俄罗斯想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其目标是控制整个乌克兰。波兰还认为，普京希望在北欧和中东欧建立一个缓冲区，并限制欧洲国家的主权，进而瓦解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安

^① R. Kuźniar, “Geopolitics an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 Iss.1, p.55.

^② 郭洁：“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190页。

全架构，为俄罗斯主导区域秩序和获取地缘政治红利铺平道路。这标志着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秩序的深刻变革。并且在波兰看来，短期内，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将继续对欧洲实施混合战争，并辅以军事压力，欧盟无法独自保卫自身。^①对于波兰和其他东翼国家而言，威慑和欧洲防御的重任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北约的职责。2025 年波兰曾计划更新其《国家安全战略》，但由于总统换届，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批准流程停滞，其内容也在新总统上任后进行了调整。更新后的《国家安全战略》预计在 2026 年发布。北约及其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仍然被视为波兰安全的基石，波兰还计划增加美国在波兰境内的军事存在，并改革军队管理和指挥体系。^②

二、从政策消费者到议程生产者：波兰的角色跃迁路径

自冷战结束以来，波兰推动欧盟出台东部睦邻政策，助力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对抗。在这一过程中，波兰逐渐从冷战结束初期欧洲安全政策的消费者，转变为欧洲安全议程的重要生产者，实质性地影响着当前的俄欧关系与欧洲安全。

（一）推动欧盟出台东部睦邻政策

冷战结束后，欧盟先后进行了三轮东扩，将欧盟范围拓展到中东欧地区。欧盟扩大不仅意味着地理范围的扩展，也对欧洲的安全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欧洲国家加入欧盟，这些国家有着被沙俄及苏联长期影响的历史记忆，因此将与之有关的生存性焦虑也带入了欧盟决策层。这种内部压力直接推动了欧盟安全政策转向。过去，欧盟安全政策以法国、德国为核心，与俄罗斯开展对话合作，后来，新成员国主张的威慑与防御逐渐占据更重要位置，欧盟原本聚焦西欧的防务视野也不得不向东

① J. Gotkowska, L. Maślanka, "A Strategy for Europe from National Perspectives: Poland", *Germ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1, 2025, <https://dgap.org/en/research/publications/strategy-europe-national-perspectives-poland>

② "Polska doczeka się niebawem nowej strategii bezpieczeństwa narodowego. Powstanie też specjalna konstytucja", February 25, 2026, <https://www.wnp.pl/bezpieczenstwo/polska-doczeka-sie-niebawem-nowej-strategii-bezpieczenstwa-narodowego-powstanie-tez-specjalna-konstytucja,1035838.html>

部倾斜。在加入欧盟后,波兰成为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的积极推动者。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由波兰和瑞典于2008年共同倡议,意在把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六国纳入欧盟经济轨道。波兰成为这些国家商品、服务与基础设施进入欧盟的中转与集散地,对东部邻国出口比重持续上升。波兰不仅因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获得大量欧盟资金、基础设施与市场红利,还借助政策平台提升了自身安全屏障和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作为波兰外交政策长期深耕的领域,波兰有意愿、有能力将自己追求国家安全的东方政策偏好上载到欧盟层面,并通过欧盟来进一步放大这一偏好。^①有评论指出,“无论执政精英的政治取向如何,波兰都非常倾向于制定欧盟对其东部邻国的政策”^②。

事实上,在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波兰就已经开始积极游说欧盟通过欧洲睦邻政策。加入欧盟后,波兰得以直接参与欧盟睦邻政策的制定。2006年,波兰发布了《欧洲睦邻政策:东方维度》(*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Eastern Dimension*)和《欧盟与乌克兰关系:波兰的建议》(*The EU-Ukraine Relations: Polish proposals*)。这两份文件指出,欧盟现有的东部睦邻政策并不令人满意,其主要问题在于,该政策框架未能区分东欧和北非,欧盟的东部邻国是欧洲国家,而南部邻国不是欧洲国家,因此,欧盟不应将二者置于同一政策框架之下,而应赋予东部政策更加特殊的地位。^③这两份文件成为波兰推动欧盟东部政策改革的认知基础,并在后续欧盟政策调整中产生了影响。

此外,波兰还就推动欧盟东部睦邻政策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议题联盟。这个议题联盟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核心。该集团由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组成。它成立之初的目的,是在冷战结束初期协调成员国在政治经济转轨和加入欧盟过程中的政策。最初参与方为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分立后,集团

① 赵艳霞、唐更田:“21世纪初波兰的东方政策及其制约因素”,《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4期,第51页。

② M. Klatt, “Europeanization and Poland: two-way flow?”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 2011, Vol.3-4, p.290.

③ T. Sydoruk, D. Tyshchenko, “The Eastern Dimension of The EU’s and Poland’s Policy”,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2016, Vol.52, p.212.

成员变为四国。四国在 2004 年一起加入了欧盟，在推动欧盟东扩的过程中拥有较多的共同利益。波兰将改革欧盟邻国政策纳入维谢格拉德集团峰会与主席国的议程中，并就此发布了多份文件和声明。^①第二个部分，寻求瑞典的支持。作为欧盟内重要的东北欧成员国，瑞典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推动欧盟东扩的利益诉求。从 2007 年开始，波兰与瑞典展开接洽，促使瑞典成为相关提案的正式共同起草方，使波兰的理念“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在任成员国与一个新成员国之间的联合倡议”。^②在此期间，波兰还注意到德国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支持态度。德国在 2007 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提出了增强版欧洲邻国政策的方案，旨在继续将俄罗斯视为战略伙伴的同时，更好地回应中东欧国家的关切。^③经过前期磋商，2008 年 5 月，波兰和瑞典在欧盟外交部长会议上共同提出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提案，并推动欧盟启动该计划。该计划成为新一阶段欧盟处理与东部邻国关系的核心政策。东部伙伴关系政策覆盖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国家，它强调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但并未明确这些国家未来加入欧盟的前景。^④

2011 年下半年，波兰首次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成为波兰在欧盟推动自己扩员偏好的重要机遇。在本次轮值期间，波兰提出的三则优先事项是：“欧洲一体化是增长之源”，“安全的欧洲：粮食、能源、国防”，“欧洲受益于开放”。^⑤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背景下，经济领域的事项具

① Visegrad Group, “2007/2008 Czech Presidency: Activities of the Czech Presidency of the Visegrad Group”, <https://www.visegradgroup.eu/home/documents/presidency-programs/2007-2008-czech-110412>; M. Dangerfiel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Visegrad Group to the European Union’s ‘Eastern Policy: Rhetoric or Reality?’” *Europe-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10, pp.1740-1746.

② N. Copsey, K. Pomorska, “The Influence of New Member Sta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ase of Poland and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Europe-Asia Studies*, 2014, Vol.66, No.3, p.425.

③ I. Kempe,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and Beyond the Priorities of the German EU Presidency”, *International Issues &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2007, Vol.16, No.1, pp.36-40.

④ 宋黎磊：“欧盟的东扩之路：和俄罗斯的较量”，《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1 年第 28 辑，第 155 页。

⑤ Biuro Wielkopolski w Brukseli, *The priorities of the Polish Presidency of the EU Council*, <https://wielkopolska.eu/news-mainmenuen-85/1208-the-priorities-of-the-polish-presidency-of-the-eu-council>

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安全也是波兰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核心关切。在波兰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于2011年9月在华沙举行,这是波兰轮值期间的一件大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代表,欧盟代表,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峰会标志着波兰在欧盟内部作为东部国家代言人的身份进一步加强。从成果看,这次峰会在欧盟与东部伙伴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一体化和多边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多项进展。^①

波兰从欧盟“局外人”转变为东部睦邻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在这一过程中,波兰通过塑造专家形象,寻找谈判伙伴,推动欧盟东部政策议程,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并成功推动欧盟睦邻政策更加聚焦东部邻国。

(二) 借助北约实现在欧盟安全决策中的角色跃迁

冷战后期,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政策指导下,主动进行战略收缩。1991年7月,华沙条约组织宣告解散,冷战时期欧洲紧张的对抗局势由此大幅缓解。在1991年12月的欧共体峰会上,各国达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中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被列为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时,欧洲安全框架也在不断发展。在1990年欧安会巴黎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了《新欧洲巴黎宪章》,该宪章为欧安会发挥谈判与对话平台作用提供了积极的制度框架。^②在1994年欧安会布达佩斯峰会上,成员国同意将欧安会调整为欧安组织,并让欧安组织作为“该地区预警、预防冲突和管理危机的主要工具”。^③冷战结束初期,欧洲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动向,体现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主要大国调整美欧安全关系的意愿,也反映了后冷战时代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初步尝试。不过,美国显然不愿意看到欧洲发展出独立的安全框架,也不希望欧安会的职能扩大。欧盟提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后,美国就公开发出了警告。在美国的阻挠与压力下,欧盟最终退而求其

①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Summit, Warsaw, 29-30 September 2011*, September 9, 201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1798/2011_eap_warsaw_summit_declaration_en.pdf

②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 November 19, 1990,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0/6/39516.pdf>

③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Budapest Summit Declaration: Towards a Genuine Partnership in a New Era*, December 6, 1994,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5/1/39554.pdf>

次，决定将西欧联盟作为连接欧盟与北约的工具和桥梁。^①20 世纪 90 年代，一方面，美国支持下的北约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渐进但却坚定的东扩举措”^②，另一方面，北约也试图安抚俄罗斯，例如，1997 年，北约与俄罗斯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

后冷战时代的波兰将北约以及同美国的双边安全合作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③例如，2003 年版《波兰共和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北约，以及我国同美国和其他主要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政治军事合作，是我国外部安全和稳定发展的最重要保障。我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也是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约是在我国安全和防卫准备范围内开展多边和双边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欧洲大陆政治-军事稳定的主要支柱。”^④2020 年版《波兰共和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二支柱是“国际安全体系中的波兰”。在这一部分，文件用超过一半的篇幅阐述如何加强与北约的合作。而关于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仅指出要“务实地参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制定……努力确保其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互补性”。在双边与区域合作的部分，“与美国发展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安全和国防领域（包括美国武装部队在波兰的持续存在）”被放在首要位置，欧安组织的排序明显靠后，只被简要界定为“欧洲合作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⑤

① 赵怀普：“论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4 期，第 28-31 页。

② 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和平与发展》，2020 年第 4 期，第 4 页。

③ 自冷战结束以来，波兰分别在 2000 年、2003 年、2007 年、2014 年和 2020 年发布过《波兰共和国国家安全战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并发布了 1990 年的《波兰共和国国防学说与波兰安全政策的假设》（*Defence Doctrin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nd Assumptions of the Polish Security Policy*）、1992 年的《波兰共和国安全政策与国防战略》（*Security Policy and Defence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2000 年和 2009 年的《波兰共和国国防战略》（*Defence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2013 年的《波兰共和国国家安全白皮书》（*White Book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等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文件。

④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03), <https://www.files.ethz.ch/isn/156794/Poland-2003.pdf>

⑤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20), https://www.bbn.gov.pl/ftp/dokumenty/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of_the_republic_of_Poland_2020.pdf

在政策层面, 20 世纪 90 年代, 对波兰来说最主要的国际安全目标是加入北约。当然, 波兰也进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1998 年, 时任波兰外交部长的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 (B. Geremek) 在波兰加入欧盟谈判开始时, 在关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立场声明中指出, “波兰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参与……将有助于欧盟加强对东部邻国的政策, 并为欧盟同扩大后仍位于其边界之外的国家建立开放而伙伴性的关系作出贡献”^①。1999 年 3 月, 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第一次东扩, 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吸纳为新成员, 预示了北约在欧洲最终的战略目标。1999 年 6 月, 欧洲理事会首次宣布了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内容。^②波兰对此的反应是冷淡的, 甚至是批评性的。^③波兰只是将参与该政策视为对北约欧洲支柱的支持, 并认为欧洲应该在北约内部发展安全与防御能力, 否则会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并削弱北约。2003 年版《波兰共和国国家安全战略》再次表明了波兰对欧盟发展独立军事能力的保留态度。^④波兰还在 2003 年参加了部分北约国家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并作为新欧洲的代表, 显著加强了与美国的紧密盟友关系。

波兰在 2004 年加入欧盟之后, 成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共同制定者。波兰参与了欧盟战斗群的创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⑤的民事能力建设以及欧洲防务局的工作, 也参加了欧盟开展的几次危机管理行动。不过, 总体来看, 波兰的参与程度并不高, 并且基本上将欧洲安全与防务合作视为北约的补充。波兰将欧盟内部的军事和民事应急能力视为“北约的欧洲支柱”, 因此, 波兰对欧盟的期待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提高政治凝聚力, 协调国防采购和军备市场, 增强欧盟与北约之间的互补关系和制度化合作。^⑥相比之

① B. Geremek, “Statement made by Bronislaw Geremek on the opening of the negotiations for Poland’s accession to the EU”, March 31, 1998, http://www.cvce.eu/obj/statement_made_by_bronislaw_geremek_on_the_opening_of_the_negotiations_for_poland_s_accession_to_the_eu_brussels_31_march_1998-en-6bf844c7-770d-4b11-b0fa-f9950c56eede.html

② “Cologne European Council June 3-4 1999. Conclusions of the Presidency”,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kol2_en.htm

③ M. Palczewska, “The security perceptio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Poland, 1989-2017”, *Defence&Security Analysis*, 2021, Vol.37, No.1, p. 90.

④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03)*, <https://www.files.ethz.ch/isn/156794/Poland-2003.pdf>

⑤ 2009 年, 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 (ESDP) 升级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CSDP)。

⑥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03)*, <https://www.files.ethz.ch/isn/156794/Poland-2003.pdf>

下，波兰参与北约事务的积极性明显更高。在加入北约之后，波兰一直是北约东扩的热心支持者，并积极参与了北约在阿富汗、科索沃等地的军事行动与演习。

2007—2008 年，国际社会关于北约东扩的争论达到顶峰。2007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集中阐述了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看法。^①2008 年 4 月，普京在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警告美国总统小布什，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刺激以俄罗斯族居民为主要居住构成的地区从乌克兰分离。^②然而北约在美国的压力下无视了这一警告，在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宣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未来将加入北约。^③2009—2010 年，在制定北约新战略概念的过程中，波兰主张，应围绕可能触发《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威胁，加强信息共享，并发展快速反应部队。同时，主张北约继续向后苏联空间扩展，首先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并将后勤设施和盟军部署扩展到新加入的中东欧国家。^④2008 年，欧洲安全框架发生重要转折。一方面，俄格战争加剧了欧洲对抗氛围，另一方面，北约、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也相继调整了安全政策。波兰的安全政策出现了所谓“科莫罗夫斯基主义”（Komorowski Doctrine）的转向，即在加强自身防御能力的同时，呼吁持续强化北约东翼。^⑤2008 年以后，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俄罗斯也逐渐开始采取遏制北约东扩的政策，并加强自身的军事能力。这一过渡过程一直延续到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

波兰当前已经深度嵌入北约体系，成为北约东翼最重要的支柱国家。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波兰作为北约东翼支点的地缘战略价值更加突出。

① “Speech and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at the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President of Russia*, February 10, 2007,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② L. Harding, J. Borger, A. Chrisafis, “Bush-Putin row grows as pact pushes east”, *The Guardian*, April 2,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apr/02/nato.georgia>

③ *Bucharest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8443.htm

④ B. Górka-Winter, M. Madej eds., *NATO Member States and the New Strategic Concept: An Overview*, May 2010, <https://www.nonproliferation.eu/wp-content/uploads/2018/09/editedbybeatagorkawinterandmarekmadej4ec528d2ad85f.pdf>

⑤ B. Komorowski, “Security is indivisible: The Komorowski Doctrine”, *The Warsaw Institute Review*, February 23, 2015, <https://warsawinstitute.org/security-indivisible-komorowski-doctrine>

2024 年 1 月，北约启动“坚定捍卫者 2024”军事演习。这是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①作为演习东道国之一，波兰主导了“Dragon-24”演习，该演习在对波兰、立陶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苏瓦乌基走廊举行。波兰政府称此次演习“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为了展示应对俄罗斯可能采取的侵略性政策和挑衅行为的能力”。^②2025 年，波兰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预估达到 4.7%，^③在北约国家中位居榜首，甚至超过美国。有评论认为，“波兰是欧洲重要的军事强国和防务议题的引领者”^④。除参与空中预警系统、地面监视系统和反导网络之外，波兰还常态化地参加“波罗的海空中警戒”、“积极努力”反恐等演习与任务，巩固北约东翼的集体防御。在三方合作层面，波兰于 2025 年 2 月牵头创设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并同步建设北约快反部队标准化物资储备仓库，通过制度化平台推动区域安全合作。^⑤在双边层面，波兰依托高额军费引进先进装备：已向韩国采购 K2 坦克、K9A1 自行榴弹炮，向美国采购 M1A2 “艾布拉姆斯”坦克、F-35A 战机及“爱国者-3”防空系统，并计划从英国引进护卫舰，从韩国采购潜艇，通过大规模军购加速本国及北约东翼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借助这些多边、三边与双边合作，波兰既强化了自身防务，又以“高贡献”换取了在北约议程中的更大话语权，从而稳固了自己作为北约东翼核心支点的地位。

在欧洲安全框架问题上，波兰虽然更倾向于将北约视为欧洲安全与国家

① “Steadfast Defender 24”, *NATO*, March 8,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222847.htm>

② “Dragon-24 – the most critical tactical exam”,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Republic of Poland*, January 23, 2024, <https://www.gov.pl/web/national-defence/dragon-24---the-most-critical-tactical-exam>

③ M. Oleksiejuk, “Sharing the burden: How Poland and Germany are shifting the dial on European defence expenditure”, *NATO*, April 14, 2025,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5/04/14/sharing-the-burden-how-poland-and-germany-are-shifting-the-dial-on-european-defence-expenditure/index.html>

④ K. Kvasha, “‘Security, Europe!’: Poland’s Rise as NATO’s Defense Spending Leader”, *Wilson Center*, March 6, 2025,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security-europe-polands-rise-natos-defense-spending-leader>

⑤ “NATO – Ukraine Joint Analysis, Training and Education Centre open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Republic of Poland*, February 17, 2025, <https://www.gov.pl/web/national-defence/nato--ukraine-joint-analysis-training-and-education-centre-opens>

安全的基石，但却无法阻止欧盟核心成员推进战略自主，于是，波兰转而采取迂回策略。一方面，波兰在战略上将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视为北约的附属物和补充，对其期待和参与也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军备采购和后勤支持等方面。另一方面，波兰积极强化对北约的参与，力图使北约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波兰超额完成北约占 GDP 比重 2% 的军费标准，购入美制 F-35 战机与“爱国者”反导系统，促成美国陆军第五军常驻波兰，将“永久结构性合作”与“战略指南针”框架下的有限资源与政治关注引向北约轨道。波兰在增强本国军备的同时，客观上压缩了欧盟独立建军所需的财政与政策余地，并由此进一步限制了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问题上的战略自主空间。总之，在 NATO 框架下，波兰凭借自己在俄乌冲突后日益关键的东翼地缘位置，不仅成为北约，尤其是美国，在欧洲部署军事资产的核心枢纽，^①更依托北约的军事实力，将军事领域的“硬实力”转化为欧盟安全决策中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实现了从边缘参与者到议程塑造者的角色跃迁。

（三）在乌克兰危机中坚定地反俄挺乌

波兰和部分中东欧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较为强硬，具有较强的对抗性。波兰认为，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波兰不应该成为前线国家，而应该安全地处于“西方”之中。^②因此，波兰对乌克兰的支持兼具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意义。支持乌克兰成为欧盟的未来成员国，既象征着波兰与其东部邻国的团结，也有助于改善波兰的安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波兰在乌克兰危机的前后两个阶段都采取了高度对抗性的政策，但由于欧洲整体政治局势与政治心态的不同，这种对抗性政策在两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的最初阶段，波兰强烈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并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采取军事应对措施，呼吁北约与欧盟对俄罗斯采取必要措施，波兰通过这些做法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③通过在欧盟

① M. Gizmajer, “Poland First on NATO’s Eastern Flank”, *Poland Weekly*, February 1, 2025, <https://polandweekly.com/2025/01/02/poland-first-on-natos-eastern-flank/>

② K. Brudzińska, “EU Enlargement and Reform (II): The Troubled Polish-Ukrainian Partnership. A View from Warsaw”, September 28, 2023, <https://ip-quarterly.com/en/eu-enlargement-and-reform-ii-troubled-polish-ukrainian-partnership-view-warsaw>

③ 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俄罗斯学刊》，2018 年第 4 期，第 31-35 页。

内部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波兰迫使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欧盟的主导国，对此作出回应。图斯克将乌克兰危机描述为波兰的“生存问题”。^①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之后，图斯克呼吁欧洲理性而坚定地采取行动，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不要虚伪。^②当欧盟内部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波兰持续呼吁欧盟不要放松对俄制裁，并以身作则，先于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在波兰的影响下，欧盟暂停了与俄罗斯的高级别会议，并冻结了所有关于签证制度和新的欧盟-俄罗斯协议的谈判。克里米亚危机后，欧盟制裁进一步升级，禁止欧盟企业在克里米亚开展商业活动，并批准了对俄罗斯金融、银行、石油和军事部门采取严格限制措施。短期内，波兰成功地将自己的安全偏好上传到欧盟层面，图斯克的能源联盟构想也赢得了支持。2014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波兰，表示支持能源联盟，并宣布了“欧洲再保证倡议”。^③但在此之后，波兰却被排除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进程之外。201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决定建立所谓“诺曼底模式”（Normandy Format），波兰没有被纳入其中。^④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德国四国领导人于2015年2月12日在明斯克就长期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综合性措施以及乌东部地区停火问题达成了协议。^⑤乌克兰危机暂时缓解，但欧盟与俄罗斯围绕制裁和反制裁的斗争仍在继续。^⑥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在俄乌冲突爆

① J. Zajackowski, “Trading solidarity for security? Poland and the Russian-Ukrainian crisis”, *The Ideology & Politics Journal*, 2017, Vol.1, No.7, p.187.

② Z. Simon, R. Tomek, P. Laca, “East Europe Leaders Decry EU ‘Hypocrisy’ in Russia Rift”, *Bloomberg*, May 15, 201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5-15/east-europe-leaders-decry-eu-hypocrisy-in-russia-rift>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Komorowski of Poland in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June 3,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6/03/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komorowski-poland-joint-press-conf>

④ 赵晨、黄颖、刘念：“‘诺曼底模式’：‘法德轴心’的作用及其条件性”，《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4期，第69-86页。

⑤ “俄乌法德领导人明斯克会谈达成乌东部停火协议”，新华网，2015年2月13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2/13/c_127490350.htm

⑥ G. Francesco, “The Redistributive Impact of Restrictive Measures on EU Members: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Imposing Sanctions on Russia”,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7, Vol.55, No.5, pp.1062-1080.

发初期,法国和德国仍然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①法德两国领导人还共同呼吁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直接且严肃的谈判”。^②但是,中东欧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普遍认为受到了明确的安全威胁。^③波兰强硬的对俄立场不仅得到了波罗的海国家的支持,也因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威胁感知的普遍增强,而获得了广泛认同。因此,相较于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波兰更为成功地将自己的对抗性主张上传到欧盟层面,并影响了欧盟对俄罗斯采取高强度的系列制裁。截至 2026 年 6 月,欧盟已经先后通过了二十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希望通过制裁俄罗斯系统重要性银行,禁止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冻结外汇储备,设置融资壁垒,封锁高新技术,制裁能源行业和能源禁运等方式,彻底压垮俄罗斯。^④在 2022 年以来欧盟的对俄制裁中,波兰发挥了“急先锋”与“规则加码者”的双重作用,推动欧盟与俄罗斯“全面脱钩”。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立法层面,波兰率先加码,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通过《应对乌克兰侵略和保护国家安全特别措施法》,该法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生效。它在欧盟制裁之外另设“波兰国家制裁名单”,对未被欧盟点名、但“直接或间接支持俄罗斯侵略”的个人与实体,追加冻结资产、断供资金、禁止公共采购等更严厉的措施,并授权政府可对相关实体实行临时托管或国库接管。^⑤第二,在政策倡议层面,在 2025 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波兰把“延长并扩大对俄制裁”列为重要议程,召集“制裁

① N. Wires, “Macron bucks Western trend by keeping dialogue open with Putin”, *France 24*, March 7, 2024,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20307-macron-bucks-western-trend-by-keeping-dialogue-open-with-putin>

② “Macron and Germany’s Scholz urge Putin to hold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Zelensky”, *France 24*, March 5, 2022,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20528-live-ukraine-says-everything-being-done-to-defend-donbas-from-russian-onslaught>

③ 宋黎磊、常晨:“俄乌冲突下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的角色变化及影响”,《俄罗斯学刊》,2024 年第 2 期,第 67-72 页。

④ 参见刘军梅:“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63-68 页;徐坡岭、聂志宏:“美欧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双重差分的两阶段对比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68-92 页。

⑤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Administration Republic of Poland, “The Sanctions Act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April 15, 2022, <https://www.gov.pl/web/mswia-en/the-sanctions-act-signed-by-the-president>

政策挑战”国际会议，与欧盟制裁事务特使戴维·奥沙利文（David O’ Sullivan）共议封堵规避路径，并公开呼吁将已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直接用于对乌克兰的援助。第三，在多边协调层面，依托布加勒斯特九国、卢布林三角等地区机制和双边网络，波兰系统性地将自身安全诉求带入欧盟议程，并带动波罗的海三国同步行动，结成强硬派联盟。该联盟多次公开指责法国、德国在能源禁运与资产处置问题上的犹豫，并推动欧盟在 2025 年 6 月将对俄经济制裁再延长六个月，同时推进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新制裁方案。

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和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波兰在对俄政策上始终比法德两大欧盟主导国更进一步。波兰不仅高调强调俄罗斯的威胁，以此凝聚反俄议程的联盟，还深度介入危机进程，成为乌克兰在欧盟内部的重要支持者。通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波兰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在欧盟俄罗斯议题和东方政策领域的权威性，也强化了自己在中东欧安全议题上的核心地位。

三、波兰实现角色跃迁的内外条件

冷战结束以来，波兰从原苏东集团国家转型成为欧盟的中坚力量，这不仅得益于波兰经济转型带来的综合国力提升与历史愿景复兴，欧洲安全格局的变化与乌克兰危机也为波兰提供了实现角色跃迁的关键机会。

（一）内部条件：波兰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战略传统的复兴

冷战一结束，“回到欧洲”成为波兰社会和政治精英的共识。通过经济转轨与政治改革，波兰逐步嵌入跨大西洋政治经济框架，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身份则在这一进程中提供了制度支撑。当前，波兰普遍被视为国际体系中重要的中等强国和中东欧的地区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波兰的政治传统与历史愿景也被重新激活，这成为波兰更加积极推进关键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

1. 持续经济增长与国防实力加强。在经济基础方面，自 1992 年起，波兰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记录。加入欧盟以来，得益于欧盟的结构性政策与单一市场，波兰经济快速增长。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波兰曾被纳

入推进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改革的二十二国集团和三十三国集团。^①波兰的入选表明，国际社会当时已开始将其视为中东欧地区的“门户国家”与“代表性力量”。这也说明，波兰的经济基础初步夯实，为其 20 年后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防投入，并进一步进行安全输出，奠定了物质基础。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波兰经济虽受到影响，但由于对外依存度不高，发展形势仍好于欧盟多数国家。凭借欧盟结构基金、市场准入与投资流入，波兰实现了中东欧地区最显著且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其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波兰的经济规模在欧盟中位居中上，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2024 年，波兰的 GDP 总量为 9147 亿美元，位居欧盟成员国第六位，全球排名第二十二位。^②

在冷战结束后国力持续累积的基础上，波兰将显著的经济成果转化为国防实力，并推动深度工业化。波兰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高居北约成员国首位，成为波兰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支柱。这一巨额投入具有清晰的双重战略意图。一是保障即时安全。通过采购先进武器装备，构建本土“东部盾牌”边境防御体系，快速提升了波兰应对东部前沿直接军事威胁的威慑与防御能力。2024 年 5 月，波兰宣布启动“东部盾牌”项目，该项目旨在全面融入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领导的波罗的海防线，大幅提升波兰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地区的国防基础设施，增强波兰抵御袭击和混合战争的能力。^③二是推动产业重塑。波兰以大规模需求为牵引，带动本国国防工业的现代化与技术升级。此外，波兰利用欧盟框架下的欧洲安全行动和欧洲国防工业计划等机制，倡导将资金优先用于中东欧地区的防务订单与产业合作，同步实现强化自身安全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2. “历史受害者”与“前线国家”双重记忆的复兴。在政治文化方面，

① “Poland’s Tusk urges stronger defences along EU borders with Russia”, *Reuters*,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polands-tusk-urges-stronger-defences-along-eu-borders-with-russia-2025-02-20>; P. Grudziński, “Poland in Search of a New Role”,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Iss.1, pp.83-87, 96; “A Guide to Committees, Groups, and Club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n/About/Factsheets/A-Guide-to-Committees-Groups-and-Clubs>

② “Republic of Poland: Country Data”, *IMF*,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POL#country-data>

③ Polish Armed Forces, “East Shield: National Deterrence and Defence Programme”, <https://tarczawschod.wp.mil.pl/en>

波兰曲折复杂的历史使其战略文化具有“小国的大国心态”特征。^①近代早期，经由卢布林联盟而最终形成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曾是中东欧最强盛的国家，其鼎盛时期领土涵盖如今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并拥有强劲的军事实力。尽管后来由于国内政治等原因，波兰不断衰落，并在经历邻国瓜分后一度在历史版图中消失，但历史上的辉煌仍深刻塑造了波兰人对自身的认知与波兰的战略传统。一方面，在自我认知上，波兰具有较为浓厚的大国情结。这种情结与波兰历史上的国家苦难，以及将自身视为“向东方传播文明”之堡垒的身份相互交叠，共同塑造了波兰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②另一方面，波兰东西两侧相邻的大国均多次参与瓜分波兰，这使得波兰形成了“两个敌人”的战略理论（Theory of Two Enemies），并长期将俄德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③其他欧洲列强对波兰悲惨遭遇的旁观，甚至趁火打劫，也成为波兰“疑欧主义”的重要根源。

波兰国内之所以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安全共识，根源可追溯到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地缘现实认知。历史上数次遭受瓜分以及冷战时期受苏联影响的创伤经历，又与波兰作为北约东翼屏障的地理位置相结合，深刻塑造了各党派精英及主流社会对安全威胁的集体感知。因此，波兰具备推动强势安全议程的国内政治基础，并由此形成了跨党派安全共识。

尽管国内政治光谱存在显著分歧，执政轮替时常伴随着激烈的政策辩论，但在关乎国家生存与主权核心的安全议题上，包括强化北约同盟，视俄罗斯为主要战略威胁，持续大幅提升国防开支，坚定支持乌克兰，波兰主流政治力量，从右翼的法律与公正党到中右翼的公民纲领党，均展现出高度的连续性立场。无论是前总统安杰伊·杜达，还是总理唐纳德·图斯克，都在欧盟峰会、北约会议及对美外交等关键国际场合，持续传递强化东翼防务、敦促盟友提高军费、支持乌克兰抗俄等强硬政策信号。^④新任波兰总统纳夫罗茨

① 刘明、徐晨光：“小国的大国心态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2-16页。

② H. Kowalsk-Stus,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wo Cultures”, *Politeja*, 2017, No.14, Vol.6, pp.55-78.

③ W. Łysek, J. Czekalski, “The Federal Idea in Poland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dealism or Pragmatism?” *Politeja*, 2017, No.51, Vol.6, pp.95-116.

④ A. Duda, “Wystąpienie Prezydenta RP z projektem nowelizacji konstytucji”, March 7, 2025, <https://www.prezydent.pl>.

基 (Karol Nawrocki) 也作出了类似表态。这为波兰推行连贯、主动且强硬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提供了重要的国内合法性保障与政策延续性保障。

3. 在国际实践方面, 波兰一直是国际与地区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冷战结束以来, 波兰外交的核心特征是主动塑造环境, 而非被动适应。波兰于 1999 年加入北约, 2004 年加入欧盟, 成为这两个国际组织的重要参与者。此外, 波兰还在维谢格拉德集团、魏玛三角等地区性国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2010 年以来, 随着国力增强, 波兰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中东欧地区一体化的进程,^①先后发起或与他国共同发起了布加勒斯特九国、三海倡议、卢布林三角等国际机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在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地区秩序和整体欧洲安全框架的设想上, 波兰和俄罗斯的愿景是相互冲突的。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俄罗斯就强调必须确保中东欧继续成为无集团区, 而波兰的主要目标则是摆脱欧洲安全的“无人区”和“灰色地带”处境。波兰在安全上明确将自己定位为“西方”的一部分, 即北约东翼的前沿国家。^②因此, 与美国、德国或法国等主要北约成员国相比, 波兰更不赞成北约与俄罗斯开展密切合作, 也明确排除了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③

基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后冷战时代波兰安全导向的东方政策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如前文所述, 在战略规划层面, 历史上三次被瓜分的集体记忆与持续震荡下行的俄波关系现实, 使波兰深感焦虑, 并促使其采取以美国和北约为主要依托的安全政策。在角色定位层面, 波兰长期将自己视为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的代言人, 并在安全政策方面积极发声。在安全取向方面, 波兰具有浓厚的大西洋主义色彩, 有学者指出, “波兰与美国的日益接近, 是跨大西洋关系中出现齟齬、欧洲政治现实、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和某种‘报恩’心态混合的产物”^④。具体到安全偏好上, 法德更希望兼顾

① 杨友孙: “波兰参与中东欧区域合作机制的策略与挑战”, 《俄罗斯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第 25-42 页。

② R. Lisiakiewicz, “Poland’s conception of European security and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2018, Vol.30, p.6.

③ R. Zięba,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roblems of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2020, p.74.

④ 熊昊: “入盟三年后的波兰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影响”, 《欧洲研究》, 2007 年第 4 期, 第 127 页。

北约和欧洲自主的防务与安全框架，波兰则将北约视为自身国家安全的基石，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在政策传导层面，波兰积极推动欧盟东扩，支持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并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对抗性政策。波兰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波兰的安全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即在华约四十年的战略无能之后，波兰建立战略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 21 世纪的前十年，即波兰通过参与北约和欧盟，适应联盟安全体系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当前，即波兰为应对一再爆发的欧洲安全危机，在国际体系中加强和扩大战略自主权的时期。^①这种阶段划分体现了波兰综合国力提升、历史愿景的复兴与外交政策能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外部条件：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格局的变化

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安全格局，逐渐从“和平红利”的想象回归到大国竞争与地缘对抗的现实。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一系列危机事件逐步驱动，最终集中体现为俄乌冲突的爆发。波兰安全观的形成及其议程生产者角色的实现，正是在深度嵌入并主动塑造这一外部环境变迁的过程中完成的。

首先，欧洲安全秩序的基石经历了从“合作安全”向“威慑防御”的根本性转折。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格局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调整窗口期，到安全形势螺旋下滑，再到最终爆发“二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地面冲突”^②的漫长过程。冷战结束后，欧洲一度致力于构建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泛欧安全共同体。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以及欧盟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等核心机制，均建立在通过对话、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融合来消弭威胁的假设之上。然而，2008 年俄格战争、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及顿巴斯冲突，连续冲击了这一合作框架。外部环境迫使欧盟及北约将战略重心从“危机管理”和“伙伴关系”，转向“前沿防御”、“力量威慑”和“能力建设”。作为中立国的瑞典和芬兰也先后加入北约。在这一背景下，长期以俄罗斯为潜在最大安全威胁的波兰获得了历史

① M. Palczewska, “The security perceptio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Poland, 1989-2017”,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21, Vol.37, No.1, p.81.

② Y. Sharma, “Why planned Trump-Putin talks collapsed, and what it means for Ukraine”, *AL Jazeera*, October 25,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10/22/why-planned-trump-putin-talks-collapsed-and-what-it-means-for-ukraine>

性机遇，基于安全输出的战略关切从边缘进入主流。波兰倡导的强化东翼、提升军备、对俄强硬等政策主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合法性。

其次，北约与欧盟的安全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发生深刻重组，呈现出“再北约化”与“防务欧洲”并行的特征。俄乌冲突前，欧盟内部，特别是以德为核心的国家，长期推动以“战略自主”为目标的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旨在降低对美国 and 北约的依赖。然而，冲突的现实表明，欧洲短期内难以脱离北约，尤其是难以脱离美国的核保护伞与常规军事体系。在此背景下，欧洲安全形成了一种混合模式。一方面，北约作为集体防御的核心支柱地位空前强化，其前沿部署、快速反应能力及对乌克兰的支持，成为欧洲安全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欧洲内部也因危机刺激而加速防务整合，试图弥补长期以来的能力赤字与工业碎片化问题。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大力推动的欧洲安全行动和欧洲国防工业计划，正是这一双重趋势的体现。波兰巧妙地利用这一环境，一方面坚定拥护北约，尤其是推动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提高至 5% 的目标，另一方面积极在欧盟框架内主导防务投资议程，从而在跨大西洋与欧洲内部两个层面同时提升自身影响力。

再次，跨大西洋关系的不确定性，为波兰在欧美之间扮演特殊桥梁角色提供了机会。美国对欧政策的波动，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释放的“美国优先”信号，包括质疑北约第五条，敦促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可能单方面调整对乌克兰政策与对俄关系等，深刻加剧了欧洲的战略焦虑。这种外部压力迫使欧洲国家不得不认真审视自身防务的独立性与可持续性。波兰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国家，对此感知最为敏锐。2025 年，波兰开展了密集的高层对美外交，其核心目标是在变动的美国政策中锚定安全承诺，确保美军持续存在，并试图影响美国对俄乌政策的走向。这种不确定性非但没有削弱波兰的作用，反而凸显了其作为“可靠盟友”和“危机沟通者”的价值，这使得波兰能够以“北约模范生”和“美国关键伙伴”的身份，在欧美之间扮演特殊桥梁角色，并进一步增强自己在欧洲内部谈判中的筹码。

最后，欧盟内部的安全共识与分期，为波兰使用制度性杠杆提供了空间。外部威胁的加剧并未自动带来欧盟内部铁板一块的团结，相反，它暴露并激化了成员国间因历史经验、地理区位和对威胁感知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安全文

化。由此，欧盟内部形成了复杂博弈：一是以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为代表的“东部前线”集团，二是以法德为代表的更关注战略自主与地缘政治调解的“核心欧洲”，三是部分对强化防务持谨慎态度的“南部欧洲”。这种内部分歧为波兰这样的中等强国提供了使用制度性杠杆的空间。波兰通过组建“乌克兰之友小组”，联合中东欧国家形成倡议联盟，利用轮值主席国议程设置权等方式，成功将东部成员国的安全关切上传到欧盟议程，并实质性地扭转了欧盟在对俄制裁、防务投资等方面的政策取向，阻断了法德等大国可能寻求的对俄缓和路径。

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国家安全架构偏好的分歧，导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确立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逐渐弱化。欧洲由此形成了两个地区安全复合体：一个以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为中心，另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①由此，波兰也必须面对不同安全框架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复杂格局。冷战结束初期，泛欧洲的欧安组织与跨大西洋的北约之间存在制度主导权之争。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问题演变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传统上由北约主导的安全领域寻求战略自主所带来的功能重叠与协调难题。2008 年的俄格战争和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成为欧洲安全格局的关键转折点。此后，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波兰也在此过程中更深入地嵌入北约和欧盟安全政策框架，并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与协调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后冷战时代波兰东方政策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逻辑，揭示了其以安全为核心诉求的战略定位对欧洲安全格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原因。一方面，波兰综合国力的提升赋予了波兰推行其安全诉求的基础条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后，波兰从后台走到前台，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积极塑造者，充分展现出关键中等强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格局的变化，是一个从合作幻想破灭到威慑现实回归，从依赖美国到焦虑性自主建

① 王义桅、段悯农：“欧洲安全秩序重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历史启示”，《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84-94 页。

设，从共识追求到内部分歧显性化的复杂过程。这一外部环境，恰恰成为波兰实现从政策消费者到议程生产者角色跃迁的舞台，也使这一关键中等强国得以深度重塑欧洲安全议程的方向。长期以来，人们对欧洲安全的关注更多聚焦在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欧盟、北约等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通过考察波兰在欧盟安全决策中的角色跃迁，我们得以发现观察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格局变迁的另一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我们看到，欧洲的中小国家，尤其是关键中等强国，并非只是欧盟及其主导国政策的接受者，它们也在积极影响和塑造欧盟对外政策，并由此影响欧洲的安全格局。波兰从政策消费者到议程生产者的跃迁，其一般意义在于系统性地展现了关键中等强国如何将地缘脆弱性转化为议题领导力，并利用制度平台放大自身声音，从而提醒研究者关注国际组织中基于议题与制度的权力资源。这一案例也考验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即在赋予中小国家能动性的同时，如何平衡效率、共识与战略统一。

波兰案例为理解中等强国在欧盟中的制度性杠杆运用提供了新视角，有力挑战了欧洲安全研究中的“大国中心论”。在决策权分散的制度化体系中，具备清晰战略愿景、议题专业性和联盟构建能力的中等强国，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将本国偏好转化为系统化的集体政策。就欧洲一体化而言，波兰案例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它推动了差异化一体化与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发展，增强了欧盟对不同地区关切的回应能力；另一方面，当一国安全议程与欧盟主要大国的长期战略发生根本性冲突时，强势的议程生产可能削弱欧盟的整体凝聚力与战略自主性。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自冷战结束以来，波兰东方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其角色跃迁产生了双重效应：在欧盟的东部边界，波兰成功引导欧盟安全重心东移，确立了“前沿防御”与支持伙伴国家主权的新政策基石；在欧盟内部，它也加剧了成员国在北约地位、对俄关系等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分化，凸显了欧盟在应对外部危机时达成共识所面临的深层张力。

从对欧洲安全格局的现实影响看，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标志着欧洲的安全秩序在经历了后冷战时代三十年的调整后，又进入了新的对抗轨道。俄乌冲突重新将常规战争带回欧洲大陆，宣布了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秩序的

瓦解。德国认为，俄乌冲突标志着欧洲大陆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转折，^①欧盟提出要打造地缘政治委员会，^②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指出，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脑死亡”的北约“复活”了。^③尽管冷战的结束提供了一个重新全面思考欧洲安全秩序的契机，但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欧盟及其领导国似乎更多是在规范性权力与对抗性逻辑之间徘徊。每当阶段性危机出现后，欧盟也往往只是“小修小补”。2022 年的俄乌冲突无疑标志着欧洲安全秩序在数次阶段性危机后，最终陷入迟到的全面危机。波兰智库东方研究中心的学者认为，世界已进入战略竞争加剧的时代，波兰当前面临更加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而乌克兰的未来关乎波兰和整个欧洲安全局势。^④如何更好发挥本国关键中等强国的作用，应对俄乌冲突延宕下的欧洲安全局势，并规划未来欧洲安全格局的前景，波兰的选择仍有待继续观察。

（责任编辑 杨 辉）

①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am 27. Februar 2022”, *Die Bundesregierung*,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regierungserklaerung-von-bundeskanzler-olaf-scholz-am-27-februar-2022-2008356>

② “The Working Methods of the von der Leyen Commission: Striving for more at home and in the world”,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4, 2019,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s/ip_19_6657

③ A. Nussbaum, “Macron Says Putin Revived ‘Brain-Dead’ NATO With Invasion”, *Bloomberg*, May 31,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5-31/macron-says-putin-brought-brain-dead-nato-back-with-electroshock>

④ J. Gotkowska, Ł. Maślanka, “A Strategy for Europe from National Perspectives: Poland”, *DGAP Memo*, March 11, 2025, <https://dgap.org/en/research/publications/strategy-europe-national-perspectives-poland>

观念、制度与实践： 苏联科学院体系下的海外问题研究*

伍雨荷 费海汀**

【内容提要】苏联科学院体系下的海外问题研究，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一条较少受到系统考察的学术发展路径。围绕观念、制度与实践三条分析轴线，可以对这一路径的知识根基、组织演变与知识生产过程进行整体性考察。在观念层面，海外问题研究的知识传统扎根于东方学与经济地理学两大学科，并沿着以对象界定领域、以方法统合领域两条路径展开。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外战略的系统性转向，将这一研究领域重新推向国家知识体系的核心地带。在制度层面，科学院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群体相继建立，创设路径主要包括：承旧复设，孵化独立，应需创设。由此，一个以“问题-区域”为轴心的分工格局逐渐形成，研究机构通过规划承接、内参呈报和人员流转渠道，深度参与国家决策。在实践层面，知识生产受到信息准入和知识转化的双重约束与筛选，研究机构据此发展出替代性信息获取策略与分层化的产出结构。整体而言，上述经验集中体现了建制化与学科化不对称发展所引发的持久张力：高度发达的组织建制，带来了资源集聚与快速响应能力；方法共识、学科认同的长期缺位，则使整个体系对外部指令形成了结构性依赖。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 社会科学理论 自主知识体系 苏联海外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3-0124(2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苏联区域国别研究重大成果的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5&ZD285）的阶段性成果。

** 伍雨荷，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费海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我国要着力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①。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讨论日益活跃，尤其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关学科的研究上，积累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其中，对欧美区域国别学发展路径的讨论相对集中和成熟，基本覆盖了 20 世纪以来该学科的演进过程，总结出多主体资助体制、跨学科知识生产等主要特征。^②关于俄苏区域国别学发展路径的讨论则相对分散：一部分聚焦 19 世纪至 20 世纪俄国的经济地理学传统，另一部分则探讨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沿革，对 20 世纪中后期相关领域情况的关注和呈现较少。^③

俄语语境的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国别学）和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区域学），与中文语境的区域国别学和英文语境的 area studies 所指的知识领域大致相同。国别学来源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地理学传统，以 страна（国家）为基本空间单元，以综合全景式描写为核心方法，以经济地理学为学科依托，通过对自然、人口与经济因素的综合分析，全面揭示所研究国家的特殊性。区域学在苏联时期主要指国内经济区划研究，苏联解体后逐步扩展至对海外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年，第 28 页。

② 李强从方法论角度梳理和分析了二战后区域国别学的演进和冷战驱动下美国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争论，并探讨了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建构路径。张杨、朱锋等在分析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性质与建设路径时，探讨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王昭晖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为案例，总结了 20 世纪以来英国区域国别学发展历程，并与美国和欧陆国家进行了对比。参见李强：“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欧洲研究》，2021 年第 12 期，第 37-54 页；张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研究——基于美国实践的省思”，《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1-18 页；朱锋：“中国区域国别学：比较、鉴别与创新”，《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1-21 页；王昭晖：“英国区域研究史及若干思考——基于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考察”，《国际政治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107-130 页。

③ 杨波等学者梳理了俄罗斯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来源、学科分化与主要类型，指出其兼具学科自主性与跨学科特征，讨论了其独立建制的可能与限度。邢广程则从历史惯性与现实路径出发考察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侧面反映出国内学界对苏联经验介引仍相对不足。参见杨波等：“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路径与国际视野”，《国际观察》，2023 年第 1 期，第 127-156 页；邢广程：“俄罗斯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惯性和现实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 年第 3 期，第 6-13 页。

区域的系统研究，以 регион（区域）为复合空间单元，强调对区域内部结构及区域间关系的分析。本文使用“海外问题研究”（изучение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描述俄语语境中的国别学与区域学研究。^①

20 世纪中后期，苏联海外问题研究形成了一种由国家指令驱动、以科学院系统为载体的知识生产模式。国家既是海外知识的主要需求方，也是关键出资者，通过议程设定、机构组织、人员配置，与学界共同框定研究的对象、方法与产出形态。这一模式有两个相互支撑的面向：第一，在组织架构上，这一模式依托既有的党政网络和信息渠道，形成了若干专门化的海外问题研究中心；第二，在功能定位上，这一模式深度嵌入国家政策制定过程，承担为外交、安全、经贸等部门建言献策的咨政功能。

考察俄苏海外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颇具张力的现象：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与学科化（disciplinarization）之间的失衡发展。^② 学科作为一种知识组织方式，其发展与成熟有着相对独立的内在规律。一个研究领域获得独立学科地位，未必意味着其方法论已经趋于统一；反之，即便尚未完成组织建制，也不妨碍该领域在研究范式上形成较强的内在一致性。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苏联科学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集中设立了一批以区域国别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配齐了人员编制、经费资源和课题体系，堪称同期世界范围内组织最为精密的研究机构群之一。然而，组织上的迅速扩张并未带来学科上的整合。直到 20 世纪末，这一领域既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专业序列，也缺乏跨地域通用的方法论共识；领域内的涉外知识并未获得统一的学科标签，而是以“方向”、“问题”、“对象”等更具弹性的标签，糅合在其他既有的学术共同体之中。为何苏联科学院能够迅速搭建

① See A. Kuznetsov, “The Crisis of Country Studies in Russia ami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Knowledge about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Outlines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Law*, 2021, Vol.14, No.6; Горбанёв В.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3. Т.127. №1. С.90-97;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Д., Григорьев 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научна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уризма в СПбГУ: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ауки о Земле*. 2015. №1. С.86-97.

② 此处学科化的关注重点是海外问题研究在方法与理论上的整合程度。See R. Whitley,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cien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87-89.

海外问题研究的组织体系，却长期未能将其整合为一门边界清晰、方法相对统一的独立学科？

为回答这一问题，可将科学院系统的组织演变作为考察主线，沿观念、制度与实践三条线索构建分析框架。从观念层面考察海外问题研究的知识传统和概念论争基础，即苏联学界“如何理解海外”；从制度层面分析相应机构的创生路径和分工格局，即这套知识“如何嵌入决策”；从实践层面尝试揭示学术生产各环节中的制度性约束，即研究成果“如何完成转化”。三条线索层层递进，有助于呈现俄苏海外问题研究及其相关学科发展的路径。

一、观念溯源：海外问题研究的知识传统与概念论争

（一）知识传统：东方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双重遗产

福柯指出，学科（disciplines）是一种划定知识领域、分配专业特权和组织资源竞争的政治制度。^①为一个知识领域命名，使其成为独立学科，并区别于其他知识领域，该过程被称为“划界工作”（boundary work）。^②学者围绕学科边界所展开的“划界工作”本身，也隐含着对权威、资源和合法性的争夺。

在俄苏学术传统中，海外问题研究长期缺乏统一、明确的学科标签，围绕这一领域展开的“划界工作”也因而显得格外复杂。20世纪50年代科学院机构群设立之前，俄苏海外问题研究就已经有相当的知识基础。18世纪以降，俄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其地理扩张的历史进程紧密交织，随着帝国向中亚、高加索、远东等区域持续拓展，边疆治理的实际需要催生了对周边人群、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等系统性的知识需求，形成了一套以“自我”与“他者”的空间关系为基本坐标的知识分类体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自我”与“他者”是政治秩序、宗教秩序、社会秩序的表达形式。^③这一分类

① [法]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12页。

② See T. F. Gieryn,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Vol.48, No.6, pp.781-795.

③ D.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Russian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Emig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24-240.

体系不仅为海外问题研究的对象划分、问题设定和知识谱系提供了前史，更在空间层级、文明冲突和地缘秩序等层面，塑造了当代俄罗斯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框架。^①

对海外区域国别的综合性描述，早在 17 世纪至 19 世纪就已经成为俄国知识实践的重要方向。然而，这些研究长期分散在东方学、地理学、历史学等框架之下，既无统一的方法规范，也无贯通的机构链条，大体上依赖于各自母学科的问题意识与资源安排。概而言之，可以将这一时期的知识组织逻辑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对象界定领域，其代表是以语文学、文献学为方法依托的东方学传统；另一类是以方法统合领域，其代表是以综合性描述为主要取向的经济地理学传统。

东方学是俄国开展海外问题研究最早的学科载体之一，以语文学与文献学为核心，兼及历史与文化，研究区域涵盖亚洲和部分非洲地区，其中包括俄国境内若干“东方”地区。^②概念框架方面，东方学高度重视“东方”区域的内在文化联系，将亚非各国视为具有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加以把握。学科属性方面，俄国东方学的重要源头包括 18 世纪传教士团和使团的涉外活动，而后东方学又服务于俄土战争的军事需要，其更深层的作用，是借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参照，帮助俄国厘清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该学科从一开始便兼具人文积累与战略服务的双重属性。从知识组织逻辑的角度，东方学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在于，它确立了以研究对象来划定学科边界的组织原则，一位东方学家的专业身份，首先取决于研究的区域对象，而非某种具有普适性的

① 戴维·福克斯 (M. David-Fox) 以跨国史与知识流动的视角，反思苏联研究中方法论民族国家框架的限度，提示应把制度、网络与跨境互动纳入对苏联学术生产的解释变量之中。托尔茨 (V. Tolz) 从俄罗斯东方学与身份政治切入，展示俄罗斯帝国时期、苏联早期的“东方学”在国家治理、学术权威与学科对象构造之间的复杂关系。See M. David-Fox, *Showcasing the Great Experiment: Cultural Diplomacy and Western Visitors to the Soviet Union, 1921-19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V. Tolz, *Russia's Own Orient: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Soviet Perio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在俄国历史文化语境中，“东方”更多是一种政治-文化范畴，而非纯粹的地理概念。它的形成与俄国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紧密联系。18 世纪塔季谢夫将乌拉尔山脉确立为亚欧分界线，把乌拉尔以东地区表述为帝国扩张和开发的对象，从而在象征意义上将俄国主体置于欧洲一侧，为其欧洲国家身份提供历史与地理依据。参见张冰、H. A. 沙莫伊洛夫：“俄罗斯东方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俄语教学》，2018 年第 3 期，第 85-96 页。

研究方法。

东方学传统不仅为海外问题研究提供了语言、文献积累，更是直接确立了以对象界定领域的知识组织逻辑。以喀山大学为例，19 世纪初喀山大学设立东方语文教研室，19 世纪 30 年代形成了布局完整的东方学中心，此后着重发展蒙古研究、突厥研究和汉学研究，围绕特定区域开展语言习得、文献整理与政策服务。随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建立，将分散于各地的学术力量整合为统一建制，按照对象区域配置学者梯队、教研机构与文献馆藏。以语言能力和一手文献为根基的长期积累，构成了俄苏海外问题研究最为鲜明的学科优势。正因如此，苏联科学院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大规模增设区域研究机构时，优先沿用的便是这套“以对象界定领域”的组织逻辑。

与东方学并行，经济地理学为俄苏海外问题研究提供了另一条路径。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以巴朗斯基（Н. Н. Баранский）为核心的经济地理学派在莫斯科大学占据了重要学术地位。^①巴朗斯基于 1929 年创建了经济地理学教研室，此后长期主持该教研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巴朗斯基学派主张经济地理学不应以单一要素作为描述的切入点，而应将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人口结构与对外联系纳入统一框架，综合考察。^②在这一纲领下，经济地理学逐步确立了以“地理综合分析”（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与东方学不同，研究人员的专业身份不取决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区域，而取决于他所掌握的分析方法。^③巴朗斯基本人也将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原则系统化，强调经济地理制图、统计资料分析与实地考察三者的结合，意在创设一套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工具箱。这种以经济为基础、向其他要素辐射的学科方法论，使经济地理学突破了地理方志描述的局限。在巴朗斯基看来，经济地理学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独特性以及世界经济中因而异的空间差异为研究对象，“地理分工”（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是

① 刘军、阳书平、柯研：“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巴朗斯基学派”，《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3-22 页。

② Баранский Н. 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артография. М.: Географгиз, 1956. С.7, С.80.

③ Музалёв А.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Ленинграде) в 1918-1925 гг.: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2020. Т.10. С.586-613.

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该学科与政治经济学联系最为紧密之处。^①1934 年莫斯科大学设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政治地理学教研室后，巴朗斯基学派又在多所高校中推动教研机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落地，取得了正式的制度位置。可以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正是苏联海外问题研究中“以方法统合领域”这一知识组织逻辑的代表性案例。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海外问题研究的主阵地转向苏联科学院，原有的两条知识组织线索发生了分流：以对象界定领域的传统成为科学院开展学科建设的主要依据，而以方法统合领域的取向则更多在高校已有的学科系统中得到延续。尽管巴朗斯基曾于 1933 年至 1938 年在瓦尔加（Е. С. Варга）主持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АН СССР）担任教授，但这一联系并未使其学派的方法论纲领在苏联科学院体系中扎根。巴朗斯基学派在高校中的持续发展恰恰表明，一种追求方法论整合的海外知识生产方式并非不可想象，它有过自己的制度土壤和学术共同体。

（二）战略转向：解冻时期的知识需求与合法性重构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科学院海外问题研究的大规模扩张有一段鲜有讨论的前史。20 世纪 40 年代末知识界的一系列思想运动，曾系统性地压缩海外知识的合法性空间。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对外战略的系统性调整，直接强化了党政机关对外部世界知识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远超既有机构承载能力的知识生产压力。海外问题研究重新进入国家知识生产的核心地带，成为许多苏联科学院相关机构集中创生的直接条件。

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日丹诺夫主义”（ждановщина）和之后的“反世界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苏联海外问题研究的制度环境趋于收紧，其议题设置与学术实践方面的限制与日俱增。^②1947 年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的裁撤是这一时期学术环境变化的一个典型案例。该研究所由匈牙利裔经济

① 方婷婷：“俄罗斯区域学研究述论”，《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9-37 页。

② See K. Azadovskii, B. Egorov, “From Anti-Westernism to Anti-Semitism: Stalin and the Impact of the ‘Anti-Cosmopolitan’ Campaigns on Soviet Cultur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2, Vol.4, No.1, pp.66-80.

学家瓦尔加主持，自 1925 年成立之后，长期承担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追踪分析与政策咨询职能，是当时苏联科学院体系中唯一专门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学术机构。1946 年，瓦尔加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变化》一书，提出战后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出现了新的稳定机制，殖民体系的性质也在向更加复杂、稳定的结构演化。批评者认为，这些判断偏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导致瓦尔加等人在 1947 年 5 月遭到大规模学术批判。^①1947 年 10 月，研究所被正式撤销，研究人员并入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АН СССР），由瓦尔加的主要批评者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К. В. Островитянов）出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新所长。有分析认为，应当将这一事件置于二战后苏联国内政治的框架中作整体性理解，意识形态、知识体系与机构竞争共同导致了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的裁撤。^②但无论裁撤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对海外经济政治进行实证分析的学术活动都明显处于低潮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对外战略的系统性调整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环境有所放松，为相关研究机构的复苏创设了条件。^③1953 年后，苏联党和国家在维持既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启动了对外路线和理论立场的双重调整。在战略层面，苏共二十大确立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取代了此前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④在认识论层面，以此为契机重申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科学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新独立国家的具体现实，持续地以实证方法追踪其内部的运行机制。^⑤1955 年万隆会议后，苏共领导层愈发意识到，缺乏对亚

① See K. D. Roh, *Stalin's Economic Advisors: The Varga Institute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London: I. B. Tauris, 2018.

② See J. Hessler, “review of Stalin's Economic Advisors (K. D. Ro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20, Vol.125, No.1, pp.336-337.

③ A. Gerasimov, “The Rise of Sovie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1950s-1960s)” *The Russia Program Online Papers*, No.17,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25, https://therussiaprogram.org/onlinepaper_17

④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可以共存，还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走向合作。” См. Хрущев Н. С.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XX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14 февраля 1956 г.

⑤ R. D.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00-207.

非国家政治结构、社会运动和经济潜力的系统分析，将直接制约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战略布局。随之而来的是，1956 年，苏联设立了半官方性质的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Сове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стран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专门负责联系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新独立国家。1960 年，以培养第三世界学生为使命的人民友谊大学正式成立。^①这些制度举措表明，海外问题研究已重新成为国家积极投入的战略领域，议题选择、资料利用与学术交流的环境都逐渐放松，恢复和新设海外问题研究机构的条件也逐渐成熟。

在上述背景下，党政机关通过一系列指令性安排，将自身的战略关切转化为科学院的组织议程。1956 年 2 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А. А. Микоян）在苏共二十大上指出，当前苏联科学院缺乏系统性、实证性的涉外研究，对国外资料的掌握明显不足，难以为决策层提供国际形势的综合分析。^②会后，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教授扎哈连科（С. М. Захаренко）等人提出倡议，在科学院体系内增设若干专门研究东西方国家的科研机构，以回应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工作的需求。^③此后十余年间，科学院密集增设了一批涉外研究机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1956 年）、非洲研究所（1959 年）、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 年）、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1967 年）相继成立。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文件进一步从计划体制层面对科研机构提出要求。报告明确指示，科研机构应根据国民经济与文化发展计划协调研究工作，殖民体系瓦解与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当时的时代趋势，理应进入科研机构的分析议程。^④由此，经由二十大到二十二大的指令链条，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将自身的战略关切，直接转化为科学院系统内部具体的组织安排。

从 1947 年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遭到裁撤，到 1956 年前后一批新

① C. Katsakioris, “The Lumumba University in Moscow: Higher Education for a Soviet-Third World Alliance, 1960-91”,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9, Vol.14, No.2, pp.281-300.

② 米高扬在二十大发言中对东方学研究所的批评尤为尖锐，称“东方已经醒来了，而东方学研究所还在沉睡”。See J. Hennings, “200 Years Oriental Studies in Russia: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ussian History”, *The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2018, No.81.

③ Черкасов П. П. Институт Арзумяна (1956-1965)//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2. №11. С.94.

④ Программ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XXII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7-31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Т. III.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С.229-335.

的研究机构集中设立，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海外问题研究重新获得高层需要和认可的过程，更在于知识组织逻辑由此发生的改变。在这一轮重构过程中，海外问题研究的议程并非产生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长期酝酿，而是由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基于对外战略需要直接推动形成。因此，知识需求首先以区域和国别为单位展开：国家急需的是“关于非洲的知识”或“关于拉丁美洲的知识”，而不是一套适用于不同区域的普遍分析方法。与此同时，20世纪40年代末学术批判运动产生的影响仍未消退，苏联科学院自主设定研究议程的空间较为有限，研究的重心因此停留在材料积累与政策应用环节，难以进入“实践-理论-再实践”的正向循环。此外，相关机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成型，客观上压缩了方法论层面积累与争论的空间。最终，既有学科传统延续的认知惯性和国家战略转向带来的政策驱动，二者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这一制度安排背后的观念基础。

二、制度展开：苏联科学院体系的组织架构与运行逻辑

（一）机构创设：制度资源约束下的三条建所路径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苏联科学院陆续设立了一批专门开展海外问题研究的机构。这一扩张进程受既有制度资源的深刻影响，大体分为三条组织路径：一是承旧复设，即重建此前遭到裁撤的机构；二是孵化独立，即在既有机构内部先设置分支部门，条件成熟后部门整体析出、独立建所；三是应需创设，在并无前身机构可资依托的情况下，由外事需求直接催生新机构。三条路径在资源整合效率、组织连续性与初始研究积累上各有差异，但无论是哪条路径，推动机构落地的直接动力始终来自苏联时期党和国家对特定区域知识的现实需要。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АН СССР，下文简称“世经国关所”）的设立过程可以被视为承旧复设的典型体现。^①世经国关所的前身是1947年遭到裁撤的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

^① 2015年，该机构以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Е. М. Примаков）命名。

所，裁撤之后，其部分职能转入经济研究所等其他部门，并未在苏联科学院体系中完全消失。1955 年 9 月，苏共中央书记处责成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在一个月内提交设立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方案。^①1956 年 4 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以“现有机构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研究未达预期”为由，决定在莫斯科组建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将其归入经济、哲学和法律科学学部。^②决议明确提出，世经国关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及其发展规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的现象，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新角色，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工人阶级状况、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国际组织活动等”^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机构的学科归属，世经国关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总体原则之下，以海外区域和国家为案例开展专门研究。至此，因 1947 年裁撤而中断的海外经济与政治研究，在苏联科学院体系中重新获得了稳定的组织依托。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АН СССР）与中国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的设立历程，是孵化独立路径的代表。^④此类路径表现为，先在既有机构中下设分支机构，承接新兴研究领域的任务需求，之后随着党政决策的推进，分支机构整体升格为专门的研究院所。以非洲研究为例，1955 年科学院主席团讨论了非洲研究的分工情况，指示东方学研究所承担北非的历史、经济、语言与文学研究，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СССР）则负责开展中非、南非区域的相关研究。^⑤1956 年，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关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的决议》，批评东方学研究所对亚非国家“当代状况、经济和民族解

① Летопис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ом VIII (1954-1959). М.: Архив РАН, 2023. С.206.

② Черкасов П. П. Институт Арзуманяна (1956-1965)//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2. №11. С.75-76.

③ Летопис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ом VIII (1954-1959). М.: Архив РАН, 2023. С.280.

④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成立于 1956 年，于 1960 年并入当时新成立的亚洲民族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Н СССР）。

⑤ Летопис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ом VIII (1954-1959). М.: Архив РАН, 2023. С.200-201.

放运动”的研究不足，要求加强对亚非国家当代经济结构、政治发展和解放运动动态的分析。^①1956年，东方学研究所根据决议要求增设了非洲事务处，有针对性地承担涉非研究工作。1959年7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在科学院设立非洲研究机构的决定，非洲研究所于1959年10月正式成立。1960年，该研究所全盘接收了原东方学研究所的非洲部门人员。^②中国学研究的案例亦遵循相似的发展逻辑。中国学研究长期作为东方学研究所的下级部门运作，1956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组建专门的研究所，全面移交当时东方学研究所的人员编制和文献材料，在此基础上增设65个研究岗位。^③在这两个案例中，发生变化的是各研究机构负责的区域范围，而始终未变的则是以区域划分作为组织边界的基本原则。每一次机构变化实际上都是建制体系在研究对象层面的进一步细分，研究人员的职业身份也在这一过程中与特定区域进一步绑定。

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АН СССР）、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США и Канады АН СССР）等机构的设立，则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建所逻辑。^④在这两个案例中，既缺乏独立建制的历史基础，也缺乏深厚的学术积累，建所动力直接来自外事活动的现实需求。以拉丁美洲研究所为例，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后，拉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构，苏联科学院急需对拉美国家的社会结构、发展程度及革命潜力展开系统评估。1960年2月米高扬以苏共高层身份访问古巴后，苏古关系迅速升温，拉丁美洲被进一步带入苏联最高决策层的战略视野。1961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О работ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20 июля 1956 г.

② С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Африки в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2 июля 1959 г. <https://www.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509039-postanovlenie-prezidiuma-tsk-kpss-locale-nil-ob-organizatsii-instituta-afriki-v-akademii-nauk-sssr-locale-nil-2-iyulya-1959-g>; Давидсон А. Б. Институту Африки – 60 лет.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его ранней истории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20. №6. С.196-200.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АН СССР от 26 октября 1956 г.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и его задачах».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40265-postanovlenie-prezidiuma-akademii-nauk-sssr-ot-26-oktyabrya-1956-goda-ob-organizatsii-instituta-kitaevedeniya-an-sssr-i-ego-zadachah>; Летопис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ом VIII (1954-1959). М.: Архив РАН, 2023. С.336.

④ 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系1974年改称，其前身为1967年成立的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США АН СССР）。

年 4 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设立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决议，首任所长由长期驻拉丁美洲的资深外交官米哈伊洛夫（С. С. Михайлов）出任，筹建阶段干部调集工作由苏共中央国际部协助完成。^①1964 年起，继任所长沃尔斯基（В. В. Вольский）主导确立了研究所的学术方向与国际联络网络，逐渐将其发展为汇聚苏联拉美学界的重要学术平台。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设立亦遵循相近逻辑。1967 年苏美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已在学界积累相当声望的阿尔巴托夫（Г. А. Арба́тов），着力促成了政治局通过成立美国研究所的决定，该所于 1967 年成立，1974 年改称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②从外部驱动到机构落地，两个案例的时间间隔都极短，留给学术共同体围绕研究议程和方法论共识自主酝酿的空间相对有限。建所初期的核心人员大多来自外交系统或党务部门，带来的是实务性的区域专长，而非学科性的方法论训练，进一步固化了机构以对象专精而非方法论自觉为导向的禀赋。

综观上述三条路径，苏联时期党和国家对特定区域知识的现实需要，始终是机构落地的直接动力，既有制度资源的厚薄决定了这一需要通过何种组织形式来实现。三条路径之间的差异在于相应领域历史积累的深浅：积累深厚者（如世经国关所、非洲研究所）的建所过程呈现出较强的内生连续性；积累薄弱者（如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则几乎完全依赖外部指令的直接推动。然而，历史积累的深度只影响了建制化的节奏，却没有改变建制化的方向。即使在历史积累相当深厚的情况下，被继承和调动的依然是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组织传统，跨区域的方法论框架始终未进入这一继承过程。随着建制化的持续推进，对象维度不断获得制度化表达，但跨区域的方法论整合却始终缺乏相应的组织空间。

（二）内外互动：院内分工格局与政策嵌入机制

机构建成之后的运行格局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在苏联科学院内部，各研究所围绕研究对象形成了分工协作关系，世经国关所在其中占据枢纽位置。在苏联科学院外部，研究机构通过规划承接、文本呈送与人员流动等制

① Дабагян Э. С. ИЛ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первые шаги. Из личны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ветерана// Латинская Америка. 2021. №5. С.5-18.

② S. M. Rogov, "Russian-Chinese Partnership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A & Canada: Economics, Politics, Culture*, 2023, No.7, pp.5-22.

度化渠道将知识生产嵌入党政决策过程。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建制化体系日常运转的制度骨架，也在各自的运行逻辑中持续强化着按对象组织知识生产的基本方向。其中，世经国关所因建所较早，且运作机制在现有文献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记录，可以作为考察上述格局的主要窗口。

在苏联科学院内部的制度布局中，世经国关所被明确定位为统筹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问题的核心枢纽，它与历史、哲学、经济以及各类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分工协作，共同构建起以“问题-区域”为轴心的知识生产网络。根据科学院主席团相关决议，历史、哲学、法律、东方学等研究所，应当显著提升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水平，在相关问题上同世经国关所加强协作。经济研究所专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性观察职能由世经国关所集中承担。^①东方学研究所、地理学研究所等传统学科型研究所，依托各自的语言学、文献学与历史地理基础，在特定区域研究中为综合分析提供一手材料支撑。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相继设立的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则进一步细化了原本集中在世经国关所内部的区域部门功能，使区域国别研究的组织重心从一个综合性研究所扩展至若干专门化机构。^②由此形成的格局是，世经国关所承担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宏观分析与框架建构，各区域研究所负责对象区域的专门化研究和深度跟踪，世经国关所与各区域研究所之间在知识功能上呈互补关系。在这一网络中，每个节点的位置都由其所对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АН СССР от 13 апреля 1956 г.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АН СССР». <https://www.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40110-postanovlenie-locale-nil-155-prezidiuma-akademii-nauk-ssr-ot-13-aprelya-1956-g-locale-nil-ob-organizatsii-instituta-mirovoy-ekonomiki-i-mezhdunar-odnyh-otnosheniy-akademii-nauk-sssr-locale-nil#mode/inspect/page/2/zoom/4>

②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下设十二个研究部门，这些部门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综合性问题的部门，围绕帝国主义发展规律、工人阶级处境及其斗争、国际关系和农业等议题展开研究，承担着对资本主义制度、阶级结构和国际体系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第二类是按区域国别研究划分的部门，包括美国、西欧、东南亚与远东、非洲与中近东以及拉丁美洲等，既覆盖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也包括亚非拉世界。第三类是市场与经济状况部门和信息部门，前者负责跟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后者则为全所提供文献和情报支持。研究所的日常学术生活依托“部门会议-所级讨论”的两级机制展开，既讨论特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局势，也围绕一般性的理论问题进行争论与统筹，将具体经验材料纳入到宏观理论框架之中。

应的研究对象来界定，而不是由某种共享的方法论立场来划分，分工体系本身即是按对象组织知识生产这一逻辑在组织层面的制度化表达。

世经国关所的枢纽地位，经由一系列跨研究所的集体编纂工程得到了具体落实。世经国关所主导或深度参与的多卷本与年鉴类出版物，为不同研究所和专家搭建了一个以“问题-区域”为单元的集体写作平台，逐步编织起一张覆盖苏联对外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网络。例如，1960 年，经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研究所着手编纂三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旨在从苏联视角重构战后国际秩序的结构与变迁。^①这一工程带有将国际关系从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交叉地带析出、使之成为独立研究方向的意图，将所内国际关系研究部与其他涉外研究机构纳入同一写作链条，不同部门的区域史、政策史写作者分别承担分卷、分章的撰写工作。^②又如，自 1958 年起连续出版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年鉴》，同样具有跨所协作性质，编委会成员来自所内的不同部门及研究领域。通过这类跨所编委会、合著机制等学术工程，苏联科学院体系能够将分散在不同机构和学科之间的区域知识、专题成果重新组织到以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为核心的问题结构之内。

在苏联科学院与外部的互动关系方面，区域研究机构在制度上被嵌入一条清晰的行政层级链条之中：顶层是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等指令机构，中层是负责资源统筹与组织协调的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执行层则是承担具体涉外研究任务的苏联科学院研究机构。^③对党政权力中枢的制度化知识供给义务，在实践中通常通过三类渠道落实：承接委托课题，呈报政策内参，组织人员流转。

1. 承接委托课题。党政指令机构向研究所委托专项课题，通过计划审批程序介入其议题设置，将政策关切直接转化为研究所的工作议程。1965 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在讨论改进非洲研究所工作时，明确要求将研究力量集

①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世经国关所主持了若干大型多卷本著作的编写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国际关系与苏联外交政策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См. Черкасов П.П. ИМЭМО.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6. С.176.

② С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ежегодник: политик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М.: ИМЭМО АН СССР, 1958.

③ Филь М.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правовой аспект//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укой: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2024. Т.6. №1. С.101-126.

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苏联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主要思潮及帝国主义新扩张形式等方向，实际上是将政策关切细分为可直接落实的课题。^①例如，在 1959 年至 1965 年的“七年计划”的编制过程中，世经国关所动员了上百名科研人员与国家计划委员会（Госплан）合作，分析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等指标如何影响苏美两国的经济竞争态势，深度参与了国家中长期规划的知识准备工作。^②1960 年世经国关所美国部门改组后，新部门与部长会议下属的科学经济委员会合作，设立了专门研究苏美经济竞赛问题的单位，就两大阵营的经济竞赛问题展开持续跟踪研究。

2. 呈报政策内参。研究所负责写作和编辑政策简报、学术刊物和内部参考材料（записка），以此满足涉外机关短期内较为紧迫的知识需求。切尔卡索夫（П. П. Черкасов）在有关苏联科学院历史的研究中指出，寄送至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外交部等部门的“信息-分析报告”（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构成了研究所日常工作中最核心、却最少进入公开出版体系的组成部分。^③档案显示，1959 年世经国关所向党政领导机关呈递了 46 份深度内部参考，其中包括对北约经济活动的侧面推断、美国垄断资本的海外石油开采、英国保守党在大选前的政治策略等内容。至 1960 年，此类内部参考材料达 102 份，收件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Ф. Р. Козлов）、库西宁（О. В. Куусинен）、国家计委主席柯西金（А. Н. Косыгин）以及外交部多名高级官员。^④

3. 组织人员流转。研究所中的高级研究人员往往作为国际问题专家（международники），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高级顾问，抑或通过政学旋转门机制进入外事部门任职。^⑤例如，雅科夫列夫（А. Н. Яковлев）在 1983 年

① См. Патриар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и В. Г. Солодовников. 100 лет//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Африки РАН. 2018. Т.42. №1. С.3-10. <https://africajournal.ru/wp-content/uploads/2024/10/Zapiski-1-2018-от-редакции.pdf>

② Черкасов П. П. Институт Арзуманяна (1956-1965)//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2. №11. С.156.

③ Там же, С.90-105.

④ Черкасов П. П. ИМЭМО.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6. С.154.

⑤ 例如，拉丁美洲研究所首任所长米哈伊洛夫后出任驻巴西大使，非洲研究所首任所长索洛多夫尼科夫后来任驻赞比亚大使，兼管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络，此外，美国研究所首任所长阿尔巴托夫、世经国关所原所长伊诺泽姆采夫（Н. Н. Иноземцев）等人亦长期工作在学术与政治领域。

出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后，很快将该所打造成“新思维”的重镇，1985 年，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6 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和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书记。1985 年，普里马科夫接替雅科夫列夫，出任世经国关所所长，延续了由研究所直接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提交政策分析报告的机制，在研究所与决策层之间形成了持续的人事与信息双向流动。^①查克尔（J. I. Checkel）的研究表明，苏联科学院体系中酝酿的“新思维”理念之所以能够在 20 世纪 80 年代转化为国家政策，关键在于雅科夫列夫和普里马科夫等“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与最高决策者之间建立了比 20 世纪 60 年代更为紧密的个人联系。^②

上述三类渠道共同构成了苏联科学院与国家权力中枢之间稳定的制度接口，而它们所传递的激励信号具有高度一致的方向性。规划性渠道按区域和国别下达课题，文本性渠道按对象国分类编写内部参考资料，人事性渠道中研究人员的职业流动同样以对象国为依据。在这套激励结构下，深耕对象国知识能够带来稳定的制度性回报，而跨区域的方法论反思等议题，则因无法带来对等的资源激励，长期处于研究领域的边缘地带。与院内分工格局相似，苏联科学院与外部权力机关之间的联系，在资源调配上展现出较高的组织效率；但其按对象分类传导需求、以政策相关性评估产出的运作方式，却从另一个方向进一步压缩了学科化所需的制度空间。

三、实践运转：知识生产的日常流程与制度约束

（一）信息准入：对外封闭，对内分级与替代性获取渠道

观念传统与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海外问题研究的结构条件，但这些条件最终需要在具体的知识生产活动中得到落实和再生产。就苏联科学院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日常运作而言，研究议程的确定是知识生产链条的起点，一个学术问题能否获得立项支持，首先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具备开展研究的基

① R. D.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01-207.

② J. T. Checkel, “Ideas, Institutions, and the Gorbachev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s*, 1993, Vol.45, No.2, pp.271-300.

本信息获取条件。这一门槛之所以能发挥强有力的筛选作用，根源在于苏联研究人员在信息获取上面临双重约束：对外封闭与对内分级。

对外封闭指的是，苏联研究人员对多数研究对象国缺乏稳定的一手信息来源。普通研究人员很少有机会获得出国经费开展田野调查。苏联科学院系统确有组织赴外学术考察，但受配额和审批的严格制约，能够成行的比例不高。^①长期领导非洲研究所的索洛多夫尼科夫（В. Г. Солодовников）曾坦言，当时非洲研究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缺乏“只有身处非洲社会之中才能获得的具体知识”。^②上述状况并非非洲研究独有。杰里·霍夫（Jerry Hough）在考察苏联国际问题研究的整体状况后亦指出，苏联学者长期依赖对西方公开出版物和国际组织数据的搜集与再加工，这意味着苏联海外问题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采的一手资料，其基础往往建立在转引的二手材料上。^③相应地，那些能够借助西方媒体报道、国际组织统计开展研究的议题，较易满足资料条件，从而获得立项支持；而那些缺乏外部数据支撑，甚至苏联驻外使馆也没有相关情报积累的议题，往往在资料评估阶段即被搁置。^④

对内分级则进一步收窄了资料可获得性的边界。即便西方的公开出版物已经被引入苏联图书馆体系，查阅权限仍然受到保密制度的限制。^⑤苏联的主要研究性图书馆普遍设有特藏库（спецхран），不同读者的权限等级也有所区别，唯有具备相应保密级别的研究人员才可以查阅“敏感”参考资料。大量的外文出版物在入库之时就被归入“限制使用类”，加盖“六棱章”标识，研究人员需由所在研究所出具正式“通行函”才能长期调用。^⑥这意味

① R. F. Byrnes, *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 1958-197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31-55.

② V. Shubin, *The Hot "Cold War": The USSR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8; A. Gerasimov, "The Rise of Sovie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1950s-1960s)" *The Russia Program*, July 1, 2025, <https://therussiaprogram.org/onlinepaper-17>

③ K. A. Kolar, "Perestroika in the Stacks: Independent Library Associations in Moscow and Leningrad", *Libraries: 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2019, Vol.3, No.2, pp.199-222.

④ E. K. Valkeni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An Economic Bind*, New York: Praeger, 1983, pp.22-26.

⑤ S. I. Zhuk, *Soviet American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n and Ukrainian Americanists*, London: I. B. Tauris, 2013, pp.58-62.

⑥ Y. Gorkizki, O. V.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68-70.

着，一个研究人员能查阅多少材料，能就什么问题立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行政等级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同一个主题，高级别研究人员与初级研究人员所能接触到的材料和研究基础可能截然不同，相应的选题空间也大相径庭。

对于苏联的区域国别研究人员而言，田野调查能否展开，以何种形式展开，并不单纯是方法论选择的问题，而是体制条件与冷战格局共同塑造的结果。在持续、开放的深度田野调查难以稳定推进的情况下，各研究所发展出了一套多渠道并行的信息获取策略。

第一类渠道是出国访问与对外学术接触。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随着科学院对外学术交往渐次展开，苏联学者获得了出国访问的机会。此类出访并非个人行为，出访者行前须接受保密培训，取得安全部门的批准，并预先报备行程中的主要节点。^①在苏联科学院的档案中，可以见到数以百计的赴美考察报告和与外国人的谈话记录，其中既包括研究人员在美国的会见记录，也包括外国人来苏访问时的会谈纪要。^②这些报告以标准化格式归档，构成了研究所信息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为例，该所在苏美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通过学术交换项目获得了一些直接接触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的会，这些接触所产生的报告材料，在所内被视为仅次于公开出版物的重要信息来源。^③

第二类渠道是从人员流动中获得一手信息。在难以持续进行深度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各研究所开始高度依赖苏联自身对第三世界的援助与教育项目所带来的人员流动。1957 年后，苏联对第三世界学生开放奖学金，大量非洲学生进入人民友谊大学等高校。^④研究所的研究员将这些留学生视为在国内可以接触的一手信息来源，通过座谈会、论文指导或非正式访谈，获取关

① S. I. Zhuk, *Soviet American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n and Ukrainian Americanists*, London: I. B. Tauris, 2013, pp.102-115.

② S. I. Zhuk, "The 'KGB People,' Soviet Americanists and 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 1958-1985",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2017, Vol.44, No.2, pp.133-167.

③ R. F. Byrnes, *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 1958-197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89-112.

④ C. Katsakioris, "The Lumumba University in Moscow: Higher Education for a Soviet-Third World Alliance, 1960-91",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9, Vol.14, No.2, pp.281-300.

于非洲社会族群关系、等级结构、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口述材料，以弥补书面文献中语境信息的缺失。^①这种做法在方法论上当然存在局限，但在制度约束的背景下，它构成了一种可操作的信息补充方式。

第三类渠道是外交-学术旋转门。研究所的高层领导有时通过党政安排进入外交系统任职，从而在学术机构与外交渠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信息通道。典型案例是非洲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索洛多夫尼科夫，他于1976年出任苏联驻赞比亚大使兼驻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特使。这种从学者到外交官的身份转换，使研究所获得了通过外交渠道获取一线政治信息的能力。驻外使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涉外知识与政策信息的前方观测站，相关谈话记录与局势观察以内部信件的形式回流至决策中枢，从而形成了“外交接触即制度化田野调查”的特殊形态。^②

上述替代机制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均依托体制内的组织资源和行政安排获取经验信息，研究人员自身的学科训练在其中几乎没有施展空间。信息准入的边界由研究人员在制度等级中的位置所决定，于是，苏联海外问题研究的信息基础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与迟滞性，能研究什么，何时研究，往往取决于行政层级，而非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

（二）知识转化：理论范式、信息加工与产品分层

从信息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到知识产品的最终产出仍有相当的距离。通过资料可得性门槛后，选题还须满足第二项要求，即研究成果能否被既有学术生产体系和政策咨询渠道吸纳。这一筛选机制主要从两个维度发挥作用。

一是理论范式维度。苏联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形成了若干相对稳定的理论框架，只有在这些框架之中的研究议题，才有机会通过学术论证。以非洲研究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苏联的非洲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理论模板。社会形态演进、阶级结构分析、民族问题、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批判以及新独立国家发展道路论争，构成了课题论证反复援引的理论范式。伊丽莎白·瓦尔凯尼尔（E. Valkenier）的研究表明，尽

① M. Matusevich, "Journeys of Hope: African Diaspora and the Soviet Society", *African Diaspora*, 2008, Vol.1, No.1-2, pp.53-85.

② V. Shubin, *The Hot "Cold War": The USSR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p.15-22.

管这一时期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从正统分析框架向更加注重经验事实转变,但这一调整始终在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范式边界内进行。^①那些难以被纳入上述理论范畴的议题,即便拥有一定的资料基础,也很难在立项环节获得支持。^②

二是体裁适配维度。苏联科学院体系在长期出版实践中形成了高度标准化的产品序列,包括国别手册、科学信息汇编、会议论文集和系列专题文集等若干形式。这些标准化体裁既适配上述理论范式所界定的问题域,也有利于向政策部门稳定地输送知识产品。^③科学院出版社(Найка)对专著选题的遴选兼顾理论深度与体系完整性,过于零散或无法上升到宏观框架的经验议题难以通过选题论证。^④换言之,选题在立项时往往已经预设了结项时所产出的成果形态,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需要判断,自己的问题能否装进既有的范式框架和体裁模板之中。

理论范式和标准化体裁构成了知识转化的“模具”,而信息的加工过程本身也高度组织化。各研究所的信息工作部门发挥了关键的技术与组织作用。以世经国关所为例,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其信息工作持续为党政领导机关编制分析材料,仅 1963 年就处理期刊 10754 册、报纸 10942 份和图书 2012 本,编制文献索引多达 43712 条,在规模和密度上构成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信息加工流水线。^⑤经过加工的信息通过标有“供公务使用”的信息公报,输送给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将学术研究迅速转化为政策可用的知识。尽管这些公报在实践中也为苏联科学院其他的研究所提供了数据资源和分析框架,但从制度逻辑上看,它们首先服务于苏联党政领导层的决策需要,再这样的情况下,世经国关所实际上处于半学术、半行政的结构性位

① E. K. Valkeni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An Economic Bind*, New York: Praeger, 1983, pp.42-58.

② I. O. Abramova et al., “African Studies in Russia: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tate”, *Outlines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Law*, 2022, Vol.15, No.2, pp.6-31.

③ R. B. Remnek ed., *Social Scientists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USSR*, New York: Praeger, 1979, pp.6-8.

④ B. Hammarfelt, J. Dahlin, “Abstracting It All: The Soviet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VINITI) and the Promise of Centralisation, 1952-1977”, *Minerva*, 2024, Vol.63, pp.115-133.

⑤ Черкасов П. П. Институт Арзумяна (1956-1965)//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2. №11. С.176.

置。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наукам АН СССР）自 1968 年设立以来，在国内文献、国外文献两类分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面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持续性文摘-信息产品体系，使境外材料以“内部译文”、“内部综述”等形式进入党政高层的信息流。^①在这条加工链中，具备外语能力的研究人员扮演了独特的中介角色：他们深度参与外文材料的筛选、翻译与评注工作，因而更容易在“专家-顾问”的职业阶梯中获得晋升。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首任所长阿尔巴托夫（Г. А. Арбатов）在其回忆录中谈及，他在学术生涯早期，通过评阅英语、德语的政治经济类材料积累学术资本，进而逐步进入核心政策咨询层。^②这一群体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在体制内承担境外信息筛选、翻译和解释职能的特殊地位。

通过上述加工流程后，知识产品进入最终的输出阶段。综合各主要研究所的出版实践，这些输出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面向决策层的内部报告与政策咨询产品。此类产品主要包括定期呈报相关部门的政策备忘录和信息公报，应上级机关专项需求编制的分析报告，是最具时效性、信息敏感度最高但流通范围最小的产出形式。^③第二类是学术出版物，包括专著、论文集和期刊论文。这是面向学术共同体的公开产品，也是研究所学术声誉的主要载体。这类产品在理论框架上必须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科学范式保持一致，在具体表述上受到较为严格的规约。^④第三类是基础性参考工具，包括国别手册、百科词条和翻译文献。国别手册（справочник）是苏联区域国别研究最具标识性的产品形态之一，通常系统地介绍某一区域国别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状况与对外关系，兼具汇

① См. Кузнецов А. В., Юрченкова Л. В.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НИОН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в России: от первы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д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цифровой эпохи// *Контурь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20. Т.13. №2. С.92-111.

② G. A. Arbatov,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pp.53-67.

③ Черкасов П. П. ИМЭМО.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М.: Весь Мир, 2016. С.428.

④ 《苏联与第三世界：一种经济纽带》一书的第三章至第五章系统讨论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苏联发展中国家研究中的理论修正。See E. K. Valkeni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An Economic Bind*, New York: Praeger, 1983.

编资料 and 提供分析框架的功能。此外，各研究所还承担着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等工具书撰写词条、翻译出版重要外文学学术著作等工作。

上述三类产品构成了一个分层化的知识输出结构：从内部报告到公开学术出版物，信息敏感度逐步降低，意识形态约束逐步增强，受众范围扩大而反馈机制趋于松散。内部报告可以引用外交情报、内部评估和未经验证的初步判断，学术出版物则只能使用经过审核的、有公开来源的或“脱敏”后的信息。这意味着，同一研究团队基于同一原始材料形成的认识，在不同输出渠道中的信息含量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从内部产品到公开产品，意识形态框架对论述的规约力度逐渐增强，以满足学术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审查的双重要求。^①内部产品的受众范围极为有限，但可能直接获得决策层的反馈或后续指示，从而形成相对紧密的信息回路。公开学术产品的受众范围较广，但反馈机制更为松散和间接。这种差异意味着，不同层级的输出产品对研究所后续研究方向的影响力是不均等的，来自决策层的直接反馈可能具有更强的议程设定效力。

综合来看，从信息准入到知识转化，苏联科学院从事海外问题研究的相关机构，其知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建制化逻辑的深度渗透之中。在准入端，研究人员可及的信息边界由其所在保密等级体系和行政层级中的位置划定，学科训练所赋予的自主调查能力缺少施展空间。在转化端，理论范式和标准化体裁构成了知识产品的制度模板，信息加工的组织化流程进一步将材料归入既定的分类与输送轨道。而输出产品的分层结构及其反馈机制，又将决策层的偏好反向传导至研究的起点，使整个知识生产链条呈现为一个建制化逻辑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之中，学科化要求的方法论自主、理论创新与对研究对象的深度把握，始终缺少独立的制度化表达渠道。

四、余 论

系统考察苏联科学院体系下的海外问题研究，可以看到一条有别于欧美

^① See M. Lagutina, A. Sergunin, N. Tsvetkov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Rus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23; N. Malcolm, *The Soviet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7, 26-31.

经验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路径。当代俄罗斯海外问题研究的制度形态是三个历史层次叠加的产物：俄罗斯帝国时期奠定了以“自我-他者”空间关系为坐标、为国家认同服务的认知框架；苏联时期，在意识形态、计划体制与两极格局的约束下，这一认知框架被固化为苏联科学院的机构设置与课题布局。当代俄罗斯既延续了相关制度与思想传统，也保留了以经济和政治为核心的问题意识，但如何处理俄罗斯帝国传统与苏联传统之间的张力，仍是其面临的重要课题。

上述路径的影响不局限于组织层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在提供资源集聚优势的同时，也塑造了俄苏海外问题研究最突出的结构性特征——建制化进程与学科化进程之间的长期脱节。建制化一端，苏联科学院体系为海外问题研究提供了完备的组织条件：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稳定的编制序列，分层化的产出渠道以及与决策层之间的制度化联络通道。学科化一端，苏联海外问题研究领域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方法论规范和独立的学位序列，学术共同体也缺少对研究成果的自主评价机制。建制化与学科化的不对称发展产生了结构性后果：建制化超前发展，苏联科学院体系得以在短期内实现组织扩张，大规模地生产知识产品。但学科化长期滞后，知识生产的方向、标准与评价逻辑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指令规定，学术共同体自身缺少足以影响这些环节的方法论共识。这使得体系虽然能够快速响应外部需求，但却难以在外部指令减弱时依靠自身的知识积累维持运转。

并且，建制化与学科化之间的张力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在当代俄罗斯围绕学科命名展开的论争中延续。2000年，俄罗斯教育部批准了新版高等教育国家标准，将区域学确立为独立专业，旨在对具体区域、国家群或国家开展综合研究。^①在此之后修订的海外区域学（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学科标准延续了同一逻辑，将国家与区域视为同一分类框架下的两个层级。^②这种以对象为优先的分类逻辑，在后续的

①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тандарт высшег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0.

② См.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3.2000 № 686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стандартов высшег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学术论争中也没有受到根本挑战。例如，马卡连科（В. В. Макаренко）在 2019 年撰写文章，主张将区域学的最高层次研究对象从国家或国家群扩大至“世界体系”（мир-система）。^①戈尔巴尼奥夫（В. А. Горбанёв）2023 年撰文反驳了这一主张。他援引巴朗斯基等人的经典论述，主张回归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国家、地区等多层对象之间开展综合分析的传统。^②从巴朗斯基 1946 年的综合地理分析，到马卡连科 2019 年的“世界体系”，争论的焦点仍然是“研究对象应以何种空间尺度来组织”。至于应当使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些对象，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讨论议题。建制化与学科化之间的张力在当代俄罗斯的延续表明，这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并非特定历史阶段的偶然产物，而是根植于俄苏知识传统对外部世界进行分类的底层逻辑之中。

俄苏海外问题研究的历史表明，制度力量在资源配置和组织动员上确有优势，但知识生产的质量最终取决于研究人员对特定区域的深入理解。这种能力的养成，依赖扎实的语言训练、持续的田野调查和在历史文化脉络之中的长期浸润，无法被组织化的流程设计替代。俄苏实践的教训在于，在基础研究的能力尚未成熟之时，跨部门协作和标准化的信息处理流程即使能够维持知识产品的持续供给，也难以弥补研究深度上的不足。知识生产的长期生命力，需要方法论共识的凝聚，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学术共同体对知识标准的自主把控，需要建制化与学科化的相互协调。

（责任编辑 童 珊）

① Макаренко В. В. Об объектно-предметном пол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его месте в ряду других нау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9. Т.10. №4. С.12-33.

② Горбанёв В. А.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3. Т.127. №1. С.90-97.

Аннотации

Глобальные перемены столетия и подход Китая к управлению

Гао Фэй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мир переживает глубокие перемены, невиданные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олети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ардин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баланс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л,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и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Остр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между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м, а также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ь между процессами углублён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 нарастающей фрагментации определяют вектор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а. Эт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ся тремя видами «войн».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перерос в систем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расколовшее глобальный консенсус. Война 2026 года с участием США, Израиля и Ирана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ла крупнейший в истории сбой в энергоснабжении, переросший в системный кризис, который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инфляцие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ростом во всём мире. Тем временем глобальная торговая война, развязанная США под лозунгом введения «взаимных тарифов», нанесла серьёзный ущерб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ой системе и усилил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В ответ на эти вызовы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Китай выдвинул комплексную систему инициатив: «Инициативу по глоба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для устранения дефицита развития, «Инициативу по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нициативу глобаль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для поощрения взаимного обогащения культур и «Инициативу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для перехода к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и инклюзивной модел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ем самым Китай вносит вклад в виде своей мудрост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благ в развитие мира, находящего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глубоких перемен.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еремены века, глоб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Влияние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Россию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и

Сунь Чжуанчжи

【Аннотация】 Будучи крупной миров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ержав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обладающей влиянием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роводит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ую, прагматич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с Ираном. Вспышка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оздаёт для России – уже находящейся под санкциями США и Запада из-за конфликта в Украине – как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йти из слож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так и ряд серьёзных, реальных вызовов. На этом фоне Россия осуждает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США и Израил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тремясь к диалогу с США н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чтобы добиться исключений из санкций на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и совершить важны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прорыв. Конфликт с участием США, Израиля и Ирана выгоде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за счёт роста доходов от экспорт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в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м плане Россия также может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случаем, чтобы сыграть уникальную роль. Однако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способна ещё больше сузи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оссии, подорвать её статус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ержавы, ухудшить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условия, а также усилить инфляцию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во-первых,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кризи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званный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м конфликтом,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править ситуацию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в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е русло. Во-вторых, ей следует укрепля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 партнёрами по БРИКС и странам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Наконец,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прагматичные меры для закрепления своего особого статуса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итуация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о-ир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я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амещение ил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наложение

Ли Чжунхай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претерпевает глубо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Россия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Анализ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моделей поведения и реального влиян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Россия не стремится к полному демонтажу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системы.

Напротив,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стремлением к равноправному партнёрству, Россия ведёт работу по созданию нового,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ог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используя та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как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валют, создани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платформ, политизац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ресурсов и усилия по преодолению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х санкционн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В основе эт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лежат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в пяти ключевых сферах: масштабы экономики, незаменимость ресурсов,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формата «БРИКС+», финансов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ридоры. Хотя 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имею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их пок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мени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в котором доминирует Запад.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амещени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наслоение, конкурентный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й подход,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ег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Цзэн Сянхун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растущим давлением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которо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ецируется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орядки, включая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Сущно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составляют стабильные и предсказуемые модел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акторами,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быть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ы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четырёх измерений: структуры власти, правил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лючевой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и поведен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изошли та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как ослаблен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власти, усиление давления на правил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и обострение внешнег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Хотя эт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у дл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ни пока не привели к потере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ситуацией в регионе. Доминирую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есколько ослабло, однако она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ё влияние в ключевых сферах. Вне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акторы стали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дел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 их вовлечённость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в

конкретных областях, таких как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обыча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и энергетика.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я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продвигать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ую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координацию, стремясь избежать втягивания в блоков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В цело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сложившиеся модели «молчалив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 «разнесённой во времен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Текущее базов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жно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ть как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сохраняющуюся под давлением».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зависит как от того, останется ли внешне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 управляемых и адаптивных рамках, так и от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амих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ый баланс.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ная европеизация: колебания и поис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Тянь Дэвэнь, Го Шаша

【 Аннотация 】 Отношения трё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Южного Кавказа – Армении, Грузии 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 с Европой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состоянием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й европеизации», при котором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остаётся незавершённой, однако притягательная сила норм и рынков ЕС неизбежна. Это состояние включает три измер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ос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инструментальность. Опираясь на гео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и выстраива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ую модель, включающую «дезорганизацию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макроуровн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на мезоуровне 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е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на микроуровне», да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фрагмент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интеграци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создал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вакуум.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и взаимное уравнива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внешних сил усилили центробеж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отдаляющие эти три страны от России,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различия в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ом

потенциале, структур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ресурсной базе ограничили 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ыбо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этих трё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й европеизации закрепились в качестве устойчивой, самовоспроизводящейся структур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выявляет различные формы такой приостановки: «пассивная приостановка» для Арм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приостановка» для Грузии и «активная приостановка» дл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внешние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определяют общие черты эт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тогда как внутренняя субъектность формирует его конкретные проявления. Преодоление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требует от д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ыхода за рамки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зависимостей путё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условий развития для глубо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создания стоимости и системы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асширять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е и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используя такие платформы, как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и тем самы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автономное и устойчи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в условиях открыт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едложенна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также служи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ой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дилемм европеизации на Западных Балканах и процессов интеграции стран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в мир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ная европеизация,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расширение ЕС на восто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Эволюция роли Польши в принятии решен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ЕС

Сун Лилэй, Вань Чжигао

【Аннотация】 Будучи ключевой «средней державо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Польша своей акт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бросила вызо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модели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которой доминировали ведущ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ЕС. Анализ эволюц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льш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постепенно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го на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одвигая инициативу ЕС «Восточн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укрепляя роль НАТО как опоры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занима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ую позицию в ход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Польша успешно перешла от статуса прост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ЕС к роли «формирователя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Польша не только интегрировала задачи сво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о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ЕС, но и изменил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ектор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оюза, а также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ей и ЕС. Такая смена роли обусловлена ростом совокупн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щи Польши 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м её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этот пример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лючевых средних держав определять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в кризисных ситуациях,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обнажая внутренн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из-за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интерес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в рамка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ЕС. Изучен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ли Польши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ЕС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овый кейс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того, как ключевые средние державы, на примере Польши, используют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рычаги влиян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это имее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ересмотра подхода, ставящего во главу угла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Европы «великие державы», а также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действий суб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акторов в системе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ЕС.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редняя держава», поль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роецирова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осточн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систем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деи, институты и практика: изучение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в систем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У Юйхэ, Фэй Хайтин

【 Аннотация 】 Изучение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в систем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ауч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торое до сих пор остаётся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изученным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сциплины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трёх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измерений – идей, институтов и практик – позволяет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целост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ег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фундамент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эволюции и механизмах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знаний. На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опиралась н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географию,

развиваясь по дву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редметной области через тематик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унификация сферы на основе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Кардинальный сдвиг во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ССР в 1950-х годах вернул дан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центр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научного знания. В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м плане под эгидой Академии была создана сеть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занимавшихся изучением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процесс 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ключал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ран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структур, выделе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и создание нов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для решения конкретных задач. Итогом стало выстраи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разделения труд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на связку «проблема – регион», и глубо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процессы приня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осуществляемая через выполн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заказов, подготовку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записок для органов власти и ротацию кадр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актики, процесс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знаний был ограничен двойным фильтром, касавшимся доступа к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ответ на это науч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сбора данных и формировали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выпускаем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В целом этот опыт иллюстрирует устойчив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порождаемое неравномерным развитием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и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оформленности: если развит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наделяла систему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аккумулировать ресурсы и оператив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запросы, то длитель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нсенсуса и чёткой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буславливало глубокую структурную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директив «сверху».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тео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автономная система знаний, изучение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СССР

Abstracts

Global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China's Proposal for Global Governance

Gao Fei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order,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are experiencing profound shifts. The two trends of un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re colliding intensely, while the world moves forward amid the tension between deepening integration and growing fragmentation. These changes are accompanied by three different forms of “wa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evolved into a systemic conflict which has fractured global consensus. The U.S.-Israel-Iran war that broke out in 2026 caused the largest energy supply disruption in history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to a systemic crisis affecting global inf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global trade war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ame of “reciprocal tariffs”, has severely damage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intensified uncertainty in global economy. In response to global challenges,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systematically: us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o address the development deficit,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o respond to security dilemmas,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to promote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to adv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ward a more just, inclusive model of “multipolar co-governance”. In doing so, China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public goods to a world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 Chinese Initiatives,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Impact of the Middle East War on Russia and Russia's Strategic Choices

Sun Zhuangzhi

【Abstract】 Russia is a major global energy power with traditional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It pursues a balanced and pragmatic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has establishe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Iran.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has brought Russia both opportunities and severe practical challenges, especially as it remains under U.S. and Western sanctions due to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gainst this backdrop, Russia has, on the one hand, condemned the aggressive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nd, on the other hand, actively sought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an effort to secure exemptions from sanctions on its oil exports and achieve a major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The positiv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onflict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Iran on Russia is mainly reflected in increased energy export revenues. Diplomatically, Russia may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a distinctive role.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as the prospects of the war remain uncertain, Russia's strategic space may be further compressed, its energy position may be shaken, its domestic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may deteriorate, and domestic inflation may intensify further. Therefore, Russia's immediate priority is to leverage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risis, triggered by the Middle East war, to reshape the trajectory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its favor. Second, it needs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interaction with BRICS partners and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it should adopt pragmatic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its special position in Eurasia.

【Key Words】 Middle East Situation, Russian Diplomacy, Russia-U.S. Relations, U.S.-Iran Relations, U.S.-Israel Relations, Energy Game

Russi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stitutional Substitution or Institutional Layering

Li Zhonghai

【Abstrac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Russ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By analyzing Russia's strategic objectives, capability base,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actual influenc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Russia does not seek to completely overthrow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stead, guided by the pursuit of an equal partner status, Russia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order characterized by institutional layering through currency diversification, the building of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the politicization of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short-term sanction circumvention. This

strategy is supported by Russia's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in five areas, namely, economic scale,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its resources,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f "BRICS+", financial autonomy, and geopolitical corridors. Russia's actions have already produced substantial effects, but they are still insufficient to fully replace the Western-l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stitutional Substitution, Institutional Layering, Competitive Multilateralism, Russian Economy

Central Asian Order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Shadow of World Disorder

Zeng Xiangh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orld order has come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of disorder, and this trend is being transmitted to regions such as Central Asia. Stable and predictabl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among actors constitute the co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can be analyzed from four dimensions: power structure, rules of interaction, major issue areas, and behavioral strategies.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entral Asia has witnessed changes such as the loosening of its power structure, pressure on rules of interaction, diversification of issue areas, and intensified external competition. Although these changes have exerted pressure on the stability of regional order in Central Asia, they have not led to a loss of control. Russia's dominant position in Central Asia has weakened to some extent, but it still retains influence in key areas. Extra-regional actors have become more active in Central Asian affairs, yet their involvement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pecific fields such as trade, minerals, and energy. Meanwhile, the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have continued to pursue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diplomacy as well as regional coordination, seeking to avoid being drawn into bloc confrontation. Overall, the long-standing regional pattern of "tacit coordination" and "asymmetric competition" in Central Asia remains in place. The basic state of the current Central Asian order can be summarized as "continuity under pressure". Whether this order can remain stable in the long term depends not only on whether external competition can continue to be confined within an adjustable range, but also on the ability of Central Asian states to maintain diversified balanc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Regional Order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Diplomacy, Russia-Ukraine Conflict, Great-power Competition

Suspended Europeanization: Hesit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caucasia States

Tian Dwen, Guo Shasha

【Abstract】The relations of Armenia, Georgia, and Azerbaijan with Europe reveal a structural condition in which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remains incomplete, while the three countries are nevertheless unable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normative and market pull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condi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suspended Europeaniza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political embeddedness,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strategic instrumen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acro-level integration disorder, meso-level great-power rivalry and micro-level path dependence”. It argues tha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space in the Transcaucasia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alternativ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led to an institutional vacuum in the region. The competitive involvement and mutual constraints of multiple external power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three countries’ centrifugal tendencies vis-à-vis Russia. Meanwhile, differences in governance capacity, identity structures,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have limited the policy choices available to the three transcaucasia states.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se three mechanisms have gradually consolidated the suspended Europeanization into a stable structure with self-reproducing capacity. A comparative study shows that Armenia, Georgia, and Azerbaijan respectively represent forms of “passive suspension”, “strategic suspension”, and “active suspension”. External structural constraints determine the common features of suspension, while domestic agency shapes its differentiated forms. To break the deadlock of suspension, the South Caucasus states need to proceed from their ow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break through single-track geopolitical dependence, embed themselves deeply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s, and expand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platform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reby achieving autonom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based on openness.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can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uropeanization dilemmas of the Western Balka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into the world system.

【 Key Words 】 Suspended Europeanization, Transcaucasia, EU

Enlargement, Economic Sovereignt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oland's Role Transformation in EU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Song Lilei, Wan Zhigao

【Abstract】 As a key middle powe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oland has demonstrated strong policy agency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EU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dominated by major powers.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Poland's Eastern policy shows that Polan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strategic orientation centered on security export. By promoting the EU's Eastern Partnership, strengthening the NATO's pillar role in European security, and adopting a confront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Ukraine crisis, Poland has achieved a role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licy consumer" to an "agenda producer" in EU security affairs. In this process, Poland has not only successfully embedded its national security agenda into the EU's foreign policy, but also reshaped the geopolitical focus of the EU's Eastern policy and undermined the possibility of co-constructing a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by both the EU and Russia. This role transformation stems both from the growth of Poland'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revival of its strategic cultur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agenda-setting capacity of key middle powers in times of crisis, while exposing the internal tensions of preference competition among member states within the EU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alyzing Poland's role transformation in EU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provides a new case for understanding how key middle powers such as Poland exercise "institutional leverage" with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t is also theoretically significant for revising the great-power-centered view of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ubregional actors in the EU's system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Key Words】 Key Middle Powers, Polish Diplomacy, Security Export, Eastern Policy,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 Research on Overseas Issues under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System

Wu Yuhe, Fei Haiting

【Abstract】 Research on overseas issues under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system represents a relatively underexamined lin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cess along three analytical axes: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 At the ideational level,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research on overseas issues was rooted in two major disciplines: oriental studie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It developed along two trajectories: defining the field by its object of study and integrating the field through methodology. In the 1950s, the systematic shift in Soviet foreign-policy strategy brought this research field back to the core of the national knowledge system.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Academy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a cluster of institutes engaged in research on overseas issues. Their paths of creation mainly included restoring previously abolished institutions, internally incubating and then spinning off new units, and establishing new institutes to meet specific needs. This produced a division of labor organized around the “issue–region” axis. Through channels such as undertaking state planning tasks, submitting internal reference reports, and rotation of personnel, these institutions becam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stat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knowledge production was subject to a dual filter, namely,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In respon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develope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a stratified structure of outputs. Overall, this experience reflects the enduring tension caused by the asymmetric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isciplinarization: the high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endowed the system with the capacity for resource concentration and rapid response, yet the long-term absence of methodological consensus and disciplinary identity made it structurally dependent on directives from above.

【Key Words】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Social Science Theory,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Soviet Research on Overseas Issues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6年第3期(总第259期)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 刘 军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 021-62232113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 <http://ru.ecnu.edu.cn/>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 中国知网

网址: 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 30.00 元